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6年第7期 总第11期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6 年第 7 期 • 总第 11 期)

顾问: 叶兴国

主编: 罗玉英

副主编: 谢丹迎 王群

编辑: 田文夫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胡灏

艺术设计: 庞海峰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一、经贸动态

10 月热点透视.....	1
10 月国际观察.....	3
[专稿]我国利用外资形势分析.....	5
[专稿]我国“双顺差”问题的分析.....	14

二、金融动态

外资银行为进中国“全开银门”摩拳擦掌	19
厘清巨额外汇储备五大关键问题	21
信贷风险保护新工具	24
我国金融稳定面临三大挑战	27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重要观点摘录	29
巴曙松: 银行业全面开放后的竞争格局	29
易宪容: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31
劳合社主席: 中国保险需求将急剧增长	32
金融改革将临重大转折 9 大调研预热全国金融会议	33

三、商务英语动态

A Case for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35
Using Poster Presentations with ESL Students	51

四、法学动态

银监会: 认真履行新职能 保银行业稳健运行	54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银行业全面对外资开放	56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公布后有关问题的公告	57
中国需要世贸组织的一场官司	58
国际公法对 WTO 的作用	60
哈佛对厦大: 针尖对麦芒	66
美国刑事诉讼一审程序	68
世界知识论坛: 对话“当代福尔摩斯”李昌钰	70

五、高教动态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切实促进教育公平	75
大学生就业难: 是观念陈旧还是制度缺失?	79
西北民大首推学业预警制度 不合格将被警示三次	80
就业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81
10 所高校来了千余“洪战辉”	83
把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	84
江西高校首现“菜单式给予”素质教学	85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历史流变	86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本期要目

- 10 月热点透视
- 10 月国际观察
- [专稿]我国利用外资形势分析
- [专稿]我国“双顺差”问题的分析

2006 年 12 月

第 7 期[总第十一期]

2006 年 10 月热点透视

反不正当出口新规近期有望出台

备受关注的《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调查和处罚规定(暂行)》有望于近期出台。该规定今年 5 月开始在商务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按照《规定》，被调查产品以低于该产品单位平均生产成本与平均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总和价格的对外出口的行为，被认为是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而低价出口价格平均水平低于调查期内产品加权平均成本的差额小于 2% 的，不认定为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

新《规定》中提出，一旦企业被认定存在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不仅将对企业处以 3 万元以下人民币罚款，对企业法人处以 3 万元以下人民币罚款，被调查产品还将被处以 12 个月内不得出口的惩罚。

点评：业内人士认为，《规定》的出台有望大大减少“不正当低价出口”行为，对于坚持走高端路线的大企业而言是一个利好消息。对于纺织品、汽车这两大在低价竞争的困境中挣扎的行业来说，新《规定》也有利于其走出低价竞争的困局。然而，在操作层面上，《规定》具体实施起来很难操作，对不正当低价行为很难界定。所以，《规定》只能阻止一些最明显的、最拙劣的企业低价出口行为，而这些行为目前已不多见。

经济运行仍存在四大不稳定因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0 月 26 日发布的前三季度我国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宏观调控在前三季度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制约我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运行中仍存在四大不稳定因素。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仍然较大。煤炭市场今年供需基本平衡，但部分地区与企业仍在大量扩大产能，目前全国煤矿在建项目规模为 7 亿吨至 8 亿吨，远远超过规划目标。受有色金属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刺激，铜、铅锌冶炼能力扩张很快。

节能降耗和环保形势严峻。当前，部分地区电力出现富余，可能引发高耗能行业反弹，进一步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一些高耗能企业在产品价格回升、需求转旺的驱动下，片面追求短期利益，原本应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不但没有退出，还有所增加。

局部地区冬季能源供需形势趋紧。冬季是煤电油气需求旺季，在能源形势总体趋缓的大背景下，部分地区供应偏紧，个别地区供求矛盾将比较突出。成品油供需将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

部分行业出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前三季度，我国机械、电子、纺织、轻工行业出口交货值增幅同比分别回落。受欧美重新设限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纺织品服装对欧盟、美国出口增长乏力。欧盟自 10 月 7 日起对我国出口皮鞋征收 16.5% 的为期两年的反倾销关税。机电、钢铁产品面临的反倾销案件也呈日益增多之势。





我国就业矛盾或将长期存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后几年,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都将超过24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个以上,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的城市,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在农村,现有劳动力4.97亿人,除去已经转移就业的两亿多人以及农村需要务农的1.8亿人,尚有一亿左右的富余劳动力。如此之大的就业岗位缺口,将使就业压力长期存在,也对大学生就业有相当大的影响。

除了当前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比较集中外,今年以来,我国就业结构的矛盾十分突出,表现为招工难与就业难现象的并存。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就业难,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就业岗位的不充分。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部分高学历人才感觉无用武之地,同时许多地方和部分行业又反映技能型劳动者严重短缺。

点评: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近年来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在涉及到生产过剩等问题上,宏观调控的效果已开始逐步显现。这无疑会给某些过热领域带来新的失业,使本已紧缺的就业岗位变得更加稀缺。总结我国低就业率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部分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带来新的失业,特别是这些行业大多是劳动密集的或就业容量大的民营企业;二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就业增长。但工资水平如果增长过高,企业成本攀升太快,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企业竞争力,从而也会影响就业增长;三是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也可能使一些以美元结算的出口企业减少生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都会对我国的就业形势产生较大影响。

外储连续四月小于贸易顺差+FDI

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6月份开始,外汇储备单月增长已经连续4个月低于当月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

在今年6月份外汇储备单月增长第一次低于当月贸易顺差和FDI流入时,世界银行就在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表示,6月份数据意味着资本流入出现逆转,一部分金融资本的确流出了国门。

之前外汇储备增长大幅高于贸易顺差和FDI流入的时候,市场一直将此认为是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流入。

点评:外汇储备连续4个月低增长,可以看出之前外汇局等部门采取的措施,对控制热钱流入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对外资投资房地产等政策的出台。同时,个人用汇政策改革、QDII等政策的推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的流出。

我国三大经济圈合力加强跨区域合作

18日,来自长江三角洲、泛珠三角区域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区域合作组织共同签署了《关于区域合作组织间开展交流与合作的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三个区域协调组织将发挥对企业投资的组织、引导和推动作用,当好企业的“资讯公司”。这是中国三大经济圈首次签署“组织间合作协议”,三个组织之间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三大区域在联动互动和合作交流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按照协议的规定,这三个区域合作组织将每年开展一次互访,交流工作思路、考察重点合作项目、借鉴工作经验,由各合作组织的轮值方和常设办公机构组织实施。三个区域组织一方的年度全体会议,邀请另外两方的常设机构负责人列席;一方区域组织牵头组织的有关活动,邀请另外两方的代表参加。

点评:此举有利于加强三大经济圈之间的跨区域合作,三个组织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并形成整体合力,形成群体优势,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建设。由于三大经济圈的地理条件、产业结构、发展道路存在差异,进一步加强联系、互相学习,是经济圈发展的必然趋势。

台商投资由南向北转移

台沪交流协会秘书长李蜀冈在10月21日举行的“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振兴东北高峰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台商选择在珠三角、长三角投资兴业,扎根落户。但随着大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成功的台湾企业家将目光瞄向了东北地区,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台资北上的趋势日益明显。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认为,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给予振兴东北的特殊政策、国有企业改革等都是投资东北的优势条件。他认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农业和装备制造业是台商投资的切入领域,可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和双赢。

来源:国研网《宏观经济》

2006年10月国际观察

欧盟增加对地中海沿岸自由贸易区的财政支持

欧盟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希腊罗得岛召开的,题为“欧盟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企业面对全球化挑战”第6届研讨会消息,欧盟将建立新的财政扶持政策,帮助该地区企业对创新项目的投资。

欧盟将从2007年起建立一个新的财政机制。与从前的条约相比,欧盟与邻国合作伙伴条约(Ievp)增加了赠与预算,即在现在的预算基础上又增加了32%左右。目的是加强对该地区企业投资和合作项目的支持,重点将支持对创新项目的投资。主管工业和企业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宣布,从2007年起,凡是参加“企业精神和创新”(Pic)项目的地中海沿岸合作伙伴企业,将优先获得欧盟的财政支持。

纺织服装行业仍然是会议的重点。欧盟纺织服装工业联合会(Euratex)透露,自2005年以来,欧盟地中海沿岸国家纺织服装生产大幅下降,正是由于对中国重新设置了临时配额,才恢复了该地区原有的进口。此外,还因为人民币的微弱升值促使中国增加了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但是,该地区的制造业仍然很脆弱,有可能再次退缩。该联合会在解释欧盟新的财政政策时还说,中国的现行政策也是鼓励对高附加值纺织品生产的研究项目。

欧委会1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清洁能源

欧洲委员会近期表示将提供1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采纳节能技术以及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从而应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为了启动这项基金,欧委会将在未来的4年中将投入1亿美元,它期待来自其它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将至少让基金增加至1.25亿美元。





这个基金还将帮助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北非和未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建立地区性的子基金。这些子基金将被设计成满足各地区的需要，并着眼于被商业投资者忽略的更小型的项目。

中亚八国部长联合签署区域经济合作综合行动计划

10月20日，出席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部长会议的中亚八国部长们批准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综合行动计划》，并宣布，自2006年起的3年内，多边机构对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计划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将增加一倍多，总额达约23亿美元。

宣言勾勒出了行动计划的四大支柱：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将把各国和多边组织对交通走廊、能源市场及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纳入 CAREC 各国及各多边机构合作伙伴的战略规划；综合各国和多边机构合作伙伴的研究能力，从而极大地增强中亚地区进行政策对话，以及设计并执行各种区域互利合作倡议的能力；改善中亚投资环境，为工商企业与本地区和全球市场对接提供综合框架；拓宽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解决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自然灾害预防和传染病防控等跨国界问题。

南部非洲商讨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措施

10月23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特别峰会。这是南部非洲14国领导人在今年8月莱索托峰会之后的第二次聚会，主题是商讨加快“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经济一体化”步伐的进一步措施。南共体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三大具体目标是：2008年建立自由贸易区，2010年建立关税同盟，2015年建立共同市场。

此次峰会的重点是审议各成员国在落实自由贸易区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以确保成员国在2010年之前落实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两个目标。此外，峰会还讨论了成员国多重身份问题、加快一体化决策程序的问题、南共体秘书处的人力资源需求问题，以及建立地区发展基金问题。此间观察家认为，南共体在此次特别峰会中加大了内部机制的协调与整合。

点评：南共体迄今尚未建立基金来协调和支持南部非洲的地区发展项目。目前，南部非洲地区项目的61%由国际合作伙伴提供资金，39%由成员国提供资金。建立发展基金，不仅可以确保成员国对地区发展项目所承担的义务，而且可以资助成员国用自有资金，如退休保险基金等，启动发展项目。

中美日印韩携手抗衡欧佩克

从23日起至本月26日，美、日、印、韩四国能源部长将汇集北京，与国家发改委官员共同参加“能源消费国大会”，五国之间将有望首次签署一项“共同努力”稳定油价的方案。

国家发改委参与此次会议的相关人士还透露，会议中五国将讨论包括能源合作在内的稳定国际油价的各种途径，将就稳定油价发布五国联合宣言，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开发协议、“团购”原油的协议，并就与欧佩克争夺话语权展开讨论。

点评：一直以来，欧佩克都以供给者的身份主导着国际原油的价格趋势，而作为需求方，却没有达成一致联盟。这一次，五大石油消费国的联合策划反击，将对谋求石油定价权与欧佩克形成博弈。

全球外包热降温 或引发印度等国担忧

据一份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称，过去数年间席卷全球经济的外包热潮正显现出减弱的迹象，原因是跨国公司选择期限更短、额度更小的交易。





尽管企业所购买的服务范围似乎更加宽泛，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但他们更倾向于进行期限更短的交易，这加剧了外包集团之间的竞争。外包合同的平均期限从不久前的10年左右，降至目前的4年。

“在某些行业中，尤其是信息技术行业，企业认为服务已经‘平价商品化’，这使得他们决定选择期限更短、总价更低的合同。”TPI公司合伙人彼得·艾伦称。

这一趋势可能引发印度等国，以及IBM、埃森哲和Electronic Data Systems等外包服务集团的担忧，它们都在全球外包潮的最大受益者之列。

与此同时，如果向发展中国家和海外服务供应商转移就业岗位和企业部门的速度减缓，美国和欧洲政客们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呼声可能会有所平息。

来源：国研网《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

我国利用外资形势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不断发展，外国资本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本源泉，与我国经济周期变化具有明显的同步性，但我国利用外资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利用外资政策存在着盲目性和“逆向歧视”等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势必导致经济停滞和阻碍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本文通过分析，提出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注重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目标相协调等政策建议。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初步预计数据，200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总量出现了大规模增长，达到了8967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9%。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达到5762亿美元，增长38%；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达到2735亿美元，增长13%。英国FDI居世界第一，美国排名第二，我国位居第三，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列第一。

一、我国利用外资的历史与现状

1. 利用外资的经济理论依据

在宏观经济学中，为了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投资和储蓄之间的差额（储蓄差额）同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差额（外汇差额）必须保持平衡。而两缺口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钱纳利（H.Chenery）和斯特劳特（A.Strout）提出来的，从理论上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必要性。利用外资可以同时弥补两个缺口，既可以满足投资需要，又可以减轻支付进口费用的压力，从而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很明显，我国政府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利用了该理论，引进大量的外资。

表1：1979～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概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总计	对外借款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其他投资
1979～1984	181.87	130.41	41.04	10.42
1985	47.60	25.06	19.56	2.98
1989	100.60	62.86	33.93	3.81





1990	102.89	65.34	34.87	2.68
1995	481.33	103.27	375.21	2.85
1996	548.05	126.69	417.26	4.10
1997	644.08	120.21	452.57	71.30
1998	585.57	110.00	454.63	20.94
1999	526.59	102.12	403.19	21.28
2000	593.56	100.00	407.15	86.41
2001	496.72		468.78	27.94
2002	550.11		527.43	22.68
2003	561.40		535.05	26.35
2004	640.72		606.30	34.42
2005	638.05		603.25	34.80
1979~2005	8091.50		6224.29	395.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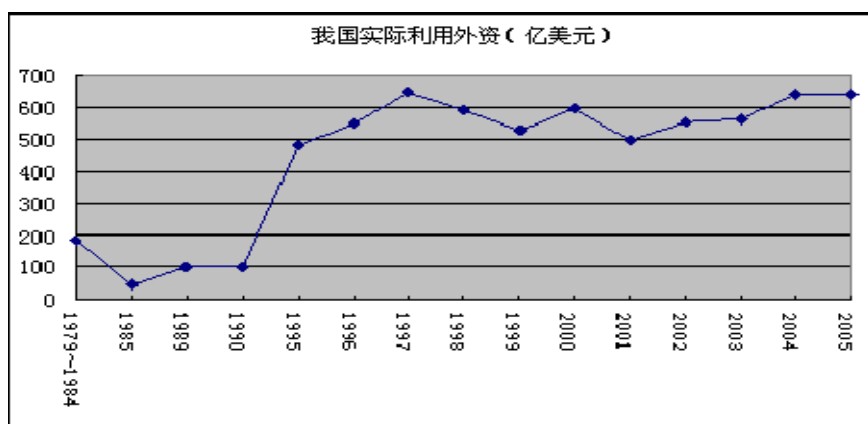
2. 我国利用外资总体上有所增长，但也呈周期性变化

除了1998~2001年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金融管制的加强和国内宏观紧缩政策的影响略有波动外，我国利用外资额有所增长。1979~1984年间的利用外资规模较小，六年共利用181.87亿美元。1997年我国利用外资额达到最高，2004年我国利用外资达到另一高点，受到国内央行紧缩调控及加强外汇管理的影响，2005年利用外资略有下降，但影响不大。2005年全国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4001家，合同利用外资额1925.93亿美元，分别比2004年增长0.77%、23.19%，表明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1979~2005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8091.5亿美元，2005年底较1984年底累计利用外资增加7906.63亿美元，年均增长19.81%。

但近10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上每年的利用规模都在400~600亿美元的区间内波动，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连续4年保持快速增长，1997年达到644.08亿美元，是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年份；此后，实际利用外资除了在2000年出现反弹之外，到2001年回落到谷底，然后又有回升。



图：1979~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走势图



3. 我国利用外资结构问题分析

(1) 我国利用外资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

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新的特点,外国直接投资(FDI)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二战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14年,国际资本流动中90%是以国际间接投资形式出现的,而到了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中75%左右都是外国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趋势。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呈急剧增长的势头。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我国适时地制定相应的战略与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改变了我国以吸收间接投资为主的状况。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发挥着资本效应,是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许多外部效应,包括技术外溢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制度变迁效应等。

我国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上成绩显著。1985至2005年二十年间,流入我国的FDI以平均每年18.7%的增长率上升(除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负增长外),1985年吸收FDI仅为19.56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则为603.25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已从1984年的41.04亿美元上升至6224.29亿美元,如加上香港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已跃居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排行榜第二位。

(2) 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以亚洲为中心,但趋向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亚洲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的资金来源重点地区,所占比重6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过70%;其次是北美洲和欧洲,所占比重接近10%。亚洲地区的资金主要来自香港,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超过40%;美地区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所占比重超过8%。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603.25亿美元,其中,亚洲357.19亿美元,所占比重为59.21%,较去年比重有所下降;欧洲56.4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9.35%,较去年上升1.4个百分点;北美洲37.30亿美元,所占比重为6.18%;大洋洲19.99亿美元,所占比重为3.31%。2005年,我国利用国外直接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前10位(如表3)分别是香港、维尔京群岛(拉美洲)、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开曼群岛(拉美洲)、德国及萨摩亚(大洋洲),他们对华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0%以上。外资来源过度集中于亚洲,这使我国经济过分依赖于少数国家及地区。欧洲对我国投资的比重明显偏低,不利于利用外资持续增长。

这种投资来源的不平衡性和集中性至少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由于港、台的资本主要是以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小规模的劳动



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逐步增强,从而使我国经济安全的系数有所下降,风险也将随之增大。香港地区是全球最开放和自由的经济体,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将会通过香港地区影响到中国内地的经济金融稳定。

表:按来源地统计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 单位:万美元

国别(地区)	2004 年		2005 年	
	外商直接投资	比重 (%)	外商直接投资	比重 (%)
总计	6062998	100	6032459	100
亚洲	3761986	62.05	3571889	59.21
非洲	77568	1.28	107086	1.78
欧洲	479830	7.91	564310	9.35
拉丁美洲	904353	14.92	1129333	18.72
北美洲	497759	8.21	372996	6.18
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	197437	3.26	199898	3.31
其他	144065	2.37	86947	1.4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外商其他投资的“其他”项中含当年对外发行股票额。表:按主要国别(地区)统计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 单位:万美元

国别(地区)	2004 年		2005 年	
	外商直接投资	比重 (%)	外商直接投资	比重 (%)
总计	6062998	100	6032459	100
中国香港	1899830	31.33	1794879	29.75
维尔京群岛	673030	11.10	902167	14.96
日本	545157	8.99	652977	10.82
韩国	624786	10.30	516834	8.57





美国	394095	6.50	306123	5.07
新加坡	200814	3.31	220432	3.65
中国台湾	311749	5.14	215171	3.57
开曼群岛	204258	3.37	194754	3.23
德国	105848	1.75	153004	2.54
萨摩亚	112885	1.86	135187	2.24
荷兰	81056	1.34	104358	1.73
毛里求斯	60232	0.99	90777	1.50
英国	79282	1.31	96475	1.60
法国	65674	1.08	61506	1.02
加拿大	61387	1.01	45413	0.75
澳大利亚	66263	1.09	40093	0.66
意大利	28082	0.46	32201	0.53
瑞士	20312	0.34	20588	0.34
俄罗斯	12638	0.21	8199	0.14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

（3）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失衡

多年来，我国吸引的 FDI 在中低端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绝大多数，高科技比重偏低，绝大多数 FDI 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外资大量涌入制造业，为中国解决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提高劳动力素质，创造外汇和外贸出口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该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在利用中国资源的同时却没有将关键核心的技术转入中国，其结果只能是在低水平上重复，也造成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同时，抑制了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开发。而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新技术行业 and 资金短缺行业，外资并没能给予积极的资金补充。2005 年，外商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仍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 70.37%（见表 4），较 2003 年的 70.03% 有所上升；位居其次的是房地产业，实际使用金额为 541807 万元，占 8.98%。而对交通运输、电信通讯、科技服务、教育文化和农业等行业的投资金额较少，对农业的投资金额只占 1.19%。虽然我国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外商对我国高新技术行业 and 资金短缺行业，并没能给予积极的资金补充，使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现象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





表：2005年按行业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

行业	合同项目	合同金额	实际使用金额
	(个)	(万美元)	(万美元)
总 计	44001	18906454	6032469
农、林、牧、渔业	1058	383729	71826
采矿业	252	101632	35495
制造业	28928	12735725	4245291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90	350216	139437
建筑业	457	256677	4902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34	522404	18123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493	451206	101454
批发和零售业	2602	434404	103854
住宿和餐饮业	1207	273670	56017
金融业	40	55144	21969
房地产业	2120	1940029	54180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81	858005	37450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926	175503	3404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39	92130	13906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329	136616	26001
教育	51	15974	1775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22	16459	3926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72	106931	3054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

（4）东部地区投资过于集中，中部较少，西部更少

近年来国家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并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但进入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仍然较少。2003年，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59.21亿美元和12.14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1.07%和2.27%。而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458.05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61%，东部地区的外资也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较发达的沿海省市。外资在我国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外资的这一流向，将加剧我国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可能引发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4. 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存在着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平

1994年税制改革统一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对内资企业贯彻了中性、公平的原则，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所得税种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但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则设一个单独的税种，并分别由《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另外为了更进一步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许多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在税收、土地使用、企业经营管理 and 外汇信贷等方面给予种种优待，对内资企业存在严重的“逆向歧视”，使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这增强了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使我国在利用外资的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我国自1993年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我国制定外资优惠的政策初衷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还带来一些问题。一是从总体上看，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先进技术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偏低，我们以远比日韩高的成本利用外资，但却未能像日韩那样较快地培育出自主创新能力。这虽有西方发达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对向我转让先进技术实施严格限制的客观原因，但我们的外资政策在这方面不够有力也是重要因素。我们曾寄希望于市场换技术，但总体成效不大。二是外资与内资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不高，外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与我国的期望有相当差距。相当多的外资企业都形成了产业“闭环”，外资产业成为独立的循环系统，内资企业无法进入外资的产业链。还有，进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环保产业的外资数量有限、质量偏低。三是外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大。

5. 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协调

发达国家都是既吸收外资，又大规模对外投资。而我国的“走出去”相对滞后，削弱了我国对外资的平衡能力，不利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导致利用外资与国内发展的脱节，不利于利用外资的健康发展，而且会严重损害国内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畸形化，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埋下长期的隐患。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226117万美元，只占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20.32%。

表：按主要国别（地区）统计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非金融类）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	2004年净额	2005年净额	至2005年累计净额
合计	549799	1226117	5720562





亚洲	300027	437464	4062904
香港	262839	341970	3650708
韩国	4023	58882	88222
泰国	2343	477	21918
越南	1685	2077	22918
非洲	31742	39168	159525
苏丹	14670	9113	35153
欧洲	17092	50502	159819
英国	2939	2478	10797
德国	2750	12874	26835
法国	1031	609	3382
俄罗斯	7731	20333	46557
拉丁美洲	176272	646616	1146962
开曼群岛	128613	516275	893559
英属维尔京群岛	38552	122608	198358
北美洲	12649	32084	126324
加拿大	512	3244	10329
美国	11993	23182	82268
大洋洲	12015	20283	65028
澳大利亚	12495	19307	58746
新西兰	-490	347	3518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势展望与政策调整





2006年及今后一两年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内外因素不会出现很大变化。预计2006年全球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短期和中期(2005~2008)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乐观,中国仍然是全球对外资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从国内因素来看,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一些制约外商投资的短期因素将有所缓解。但是2006年开始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后过渡期,我国将对外资开放服务业,外资进入服务业已经有了尝试性的投资和充分的准备,加上中国银行业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和三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相继上市,外资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可能出现较快增长。

随着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逐渐由以前那种单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为目的的投资目标,转而把着眼点放在它本身的核心能力上面。所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政策上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才能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1. 促进利用外资的多元化, 加强国际资本出入境的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

外资战略规划对象要从外商直接投资转向全口径的国际投资,把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和国际其他投资放到重要位置。外资政策的战略重点要从单纯的“利用”转为兴利除弊并重。按照国际收支口径,外资有三类形式,即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证券投资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其他投资主要包括商业贷款和贸易信贷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一直高达70%左右。今后应适当提高利用国际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比重,促进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协调发展。

利用国际证券投资改革我国的一些垄断行业,可减少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遏止外商直接投资的“独资化”倾向。而且,增加利用外资方式也是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健康发展的需要。从长期看,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可能逐步减少,直接投资可能随产业周期的波动而起伏不定。因此,外资投资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保持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从而有利于维持币值的稳定。当然,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也会增大金融风险。为了防范短期资本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根据宏观经济的稳定状况来对国际资本流动实行相机管理,建立一整套防范风险、防范引发金融危机特别是货币危机的制度和政策。

2. 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

从目前来看,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目标应该进行重新定位,即基本立足点从“数量引资”走向“质量引资”,引进外资以弥补资金缺口为重点转向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取外资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重点。激励和鼓励外资在我国设立更多高质量的研发机构。可采取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而不是对所有的外商企业,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通过加速折旧鼓励外资企业使用更复杂的技术,对提供新产品、新工艺的外资项目提供政府采购合同。应借鉴新加坡的强制性人力资源政策,要求外资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加快外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并实现技术转让步伐。

针对目前利用外商投资促进技术进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国利用外资的重点应该是消化吸收外商投资中的技术含量,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最终实现自主发展。要适应技术转让的客观规律,把立足点放到培育我们自己自主研发能力上。高技术产业的特点是R&D投资强度高,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产品与工艺老化快,资本投入风险大,R&D成果的生产和贸易具有高度的国际竞争性,跨国公司不可能冒着技术外溢的巨大风险,把关键技术转移给我国的子公司。因此,我国要在关键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某些领域率先实现技术超越。国家投入于科研开发的经费绝对额是增加的,但比例并无提高。目前,一般采取由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承接科研项目的渠道投入资金,效果未必很好,





也要考虑改革措施。可以把一部分科研开发经费作为吸引外资研发机构的种子基金,由外资研发机构与中方合作伙伴共同申请,条件是研发机构必须在中国,技术应用首先在中国境内,但知识产权可以由投资者和研发机构共享。用这种办法吸引跨国公司把研发机构进一步转移到中国,增强科研服务能力,同时提高我们自己的科研投资效率。

根据我国产业政策和外资产业指导目录,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外资项目。对国内有生产能力的项目,加快实现对内开放,鼓励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国内资本进入。沿海发达地区要严格把握土地使用政策,通过提高外商投资程度等方式促使外商引入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的项目。

3. 采取差别性地区政策,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一些外商准备将新增投资向外转移。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外商投资的产业梯度转移的区域,但是同时这些地区也面临着来自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应该积极鼓励外资从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一是明确中西部等地区对外资减免税等政策将长期保持,以增加外商长期投资的信心;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扩大允许外商独资的产业范围;三是继续加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投资的软硬件环境。

4. 注重吸引外资进入生态农业和服务业

这是未来利用外资的增长点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产业扩张的主要方向,如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将来的一大趋势,在我国有很大潜力,这些领域外资流入的少,主要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障碍,也与对外开放程度有关。

5. 高度重视竞争政策的作用,反对垄断保护竞争

从国际经验看,竞争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约束、规范大型跨国公司在本国市场的竞争行为。要借鉴国外利用竞争法约束跨国公司行为的经验,抓紧制定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健全规范竞争秩序的法律体系,对各个领域的竞争秩序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制定各种预防措施反对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企业通过种种途径限制和妨碍竞争,监督大企业滥用经济力,控制大企业的合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关联交易的审计,对可能导致垄断经营的行为,例如并购行为进行严格审查,约束跨国公司可能产生的垄断行为和其他不正当行为。

6. 注重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目标的相互协调

现在已经明确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并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前三个目标属于内部均衡,后一个目标属于外部均衡。四个方面的目标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只有实现四个目标的协调统一,才能实现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的动态平衡,促进生产力的持续高速发展。

来源: 国研网

[国研专稿]我国“双顺差”问题的分析

2006-11-2

摘要: 10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结合前三季度的外贸和国际收支数据,我国“双顺差”问题更加严重地凸现在我们面前。本文在陈述“双顺差”具体规模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危害。由此,在治标和治本两个层面上提出了解决“双顺差”问题的思路。

一、“双顺差”的现实情况

国家外汇管理局10月6日公布的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指出:当前,国际收





支特别是货物贸易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双顺差”态势。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 916 亿美元,其中货物项目顺差 800 亿美元;上半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 389 亿美元。

下半年的形势依然严峻,7月外贸顺差创下新高 146 亿美元,8月再次刷新记录达到 188 亿美元,虽然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9月外贸顺差回落到 153 亿美元,但仍然是今年单月第二高水平,并且较去年同期顺差额翻了一番多。报告预测,下半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尤其是货物贸易将保持较大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将维持一定顺差。因此,2006 年全年国际收支仍将保持大规模顺差。

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继续飙升。到 9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 9879 亿美元,距离万亿美元大关只差 121 亿美元。前九个月,外汇储备增加 1690 亿美元。年内,外汇储备突破一万亿美元几乎已成定局。

二、“双顺差”的成因分析

1. 经常项目顺差成因

首先,政府鼓励出口的政策是经常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地方政府习惯性地追求各种经济指标,进出口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在追求政绩冲动的作用下,进出口被各个拥有海港贸易和边境贸易的地区的地方政府当作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来抓,出口由此得到了充分地发展。

另一方面,出口退税政策也是政府鼓励出口的重要方式。出口退税本来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但在中国却对推动出口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这种推动作用不仅反映在出口退税的正常使用上,还反映在出口退税的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上。对高资源、能源消耗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反映了出口退税的过度使用;许多公司仅仅是为了获得出口退税而出口,与此相关的诈骗活动也十分猖獗等现象反映了出口退税的不当使用。

此外,在改革开放早期,为了避免由于过度借贷和持续贸易赤字导致国际支付危机,政府要求外国投资者保证重要的外国投资项目做到外汇自求平衡。换句话说,国际直接投资必须是出口导向的。这使得,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大幅提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次,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

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低廉构成了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越来越深入的现代社会,跨国公司运营过程中的生产环节自然而然流动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符合经济学的普遍规律。这种流动使得加工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在不具备其他比较优势的情况下,鼓励加工贸易的政策成为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加工者或者组装者的角色。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价值链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是创造贸易顺差的贸易。并且,中国加工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不大可能在近期发生重要改变。

随着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上升,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必然持续增长。2005 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 1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70%。同时,在中国 7600 亿美元的总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到 54.8%,其中外商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份额占到 80%多。在 1020 亿美元贸易盈余中,570 亿美元是外商企业创造的,1400 亿美元是加工贸易创造的。

最后,长期高投资增长形成的巨大产能是经常项目顺差的客观基础。

投资对经济的作用表现在对当期产品的消耗,这构成了当期的需求,也表现在后续各期生产能力的提升,这构成了后续各期的供给。我国长期以来投资都保持高速增长,由此积累了巨大的产能,甚至有些行业出现了产能的过剩。这巨大的产能在国内消费增长长期低于投资增长的情况下,必然寻找产品的销售宣泄通道,国外市场自然是唯一的





出路。这样,长期的高投资增长速度,最终必然导致出口的高增长。

总之,以上三点和其他一些因素共同组成了我国巨大贸易顺差的原因。而这三点都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巨大贸易顺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以有根本的改变。

2. 资本项目顺差成因

首先,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高增长意味着高的投资回报率和相对低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很多行业还相对落后,显现出来的发展空间巨大,资本投入有所作为的潜力巨大。因此,经济的高增长始终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地方政府的追求政绩的内在冲动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与前文论述经常性贸易顺差的作用一样,地方政府行为对于资本项目顺差的作用也同样巨大。引进国际直接投资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一条重要标准。各级政府的各级官员都被分配了招商引资指标。这就使得内外资长期以来受到的待遇是不对等的,对外资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是普遍的做法。时至今日,在国内资本并不稀缺的情况下,大量的国内资本得不到充分利用,外资却仍然大量融入中国,就是地方政府对外资有所偏好的一个证据。

最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动力。

资本本身并不能完成生产,资本必须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与优质低廉的要素结合进行生产,对于资本持有者来说才是最经济的。因此,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由各种外资优惠政策形成的廉价土地资源等等,对外资构成巨大的吸引力。

三、“双顺差”对经济的影响

1. 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风险

首先,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容易引发贸易摩擦,由于“出口至上”战略导致的外贸顺

差持续扩大,中国已经连续十几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出口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攻击的目标,这包括美国、欧盟,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等。贸易摩擦等问题组成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增加了维系经济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难度,也给了贸易伙伴反倾销、要求人民币升值等的诸多借口。

9月28日,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后的说服之下,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放弃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7.5%关税的议案。不过,他们仍声称明年将采取一项范围更广的举措,促使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

其次,如果真的引发贸易战,或者遭到相关制裁,将会对我国大量出口导向型企业造成巨大打击,进而影响就业。大幅顺差导致的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会引发银行贷款冲动,带来坏账隐患。

2. 巨大外汇储备给经济带来的风险

“双顺差”的直接结果是外汇储备的迅速扩大。在199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此后五年,储备上升相对平稳。2001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迅速推动了储备的飙升。到2003年储备的年度增量首度突破了1000亿美元,达到1368亿美元;到2004年储备的年度增量迅速突破了2000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增长达到2067亿美元。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单年储备增量超过2000亿美元。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势头有增无减。按照同样的速度,简单的推断是,在2008年第二季度外汇储备将超过1.5万亿美元,在2010年底则将突破2万亿美元。

首先,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形成了流动性过剩。

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基础货币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大幅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使得央行不得不投放基础货币,造成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多,使经济存在过热风险。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外汇储备不利于流动性过剩





的治理。外汇储备的进一步扩大是紧缩性政策的抵消因素,从而增大本外币政策协调难度,影响宏观调控效果。

其次,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

在目前的状况下,央行必须同时应对外汇储备扩大、汇率相对平稳和流动性过剩等几个目标。由于这些目标之间互相制约,不具有兼容性,因此,单一的货币政策已经难以同时实现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缺失。

再次,央行针对流动性过剩对冲的风险增大。

为了控制由于外汇储备扩张造成的基础货币的增长,1996年以来,央行通过出售政府债券实施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2002年以后的几年间,为了冲销外汇储备增长造成的货币扩张效应而实施的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使得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券消耗完毕。2005年开始,央行开始发行央行票据吸收流动性,由于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央行发行的票据发行规模迅速扩张,就达到了3万亿元。一方面,由于收益率低,对商业银行发行的大量央行票据使其盈利能力受到限制,长期下来,会增加银行体系的风险。另一方面,央行票据发行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央行支付的利息迅速增大,在央行票据不能无限扩张的前提下,这些利息的偿还势必带来日后的流动性增加,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风险。

最后,为了取得投资回报,外国投资者最终要把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汇出国外,现在的巨大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将来巨大资本汇出的压力。



3. 外汇储备作为国家持有的一种资产面临着损失

如果把我国看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个投资者的话,那么我国的外汇储备就是作为投资者的我国拥有的一项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前的形势下,作为资产的外汇储备显然不是一种优良的投资品。

首先,人民币升值使外汇储备承受着损失。

人民币长期以来面临着升值压力,人民币的汇率走势也显示出平稳升值的形态。这样,外汇储备以人民币计价的价值在缩小,外汇储备的扩大显然加剧了这种损失的绝对数量。

其次,外汇储备作为一项资产,其成本大于收益。

经常项目顺差很多情况下是在人为压低成本的情况下取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低定价对于国外消费者购买我国出口商品是一种补贴;环境污染的几乎零代价对于国外消费者购买我国出口商品也是一种补贴;更重要的是习惯于价格战的中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劳动力成本难以提高,更是对国外消费者购买我国出口商品的一种补贴。

资本项目顺差的取得付出了很多政策优惠的代价,加上可以在中国取得相对高的投资回报率,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取得的收益丰厚。这是我国资本项目顺差的成本。

而由此换回的外汇储备却大部分投资于回报率比较低的国外政府债券。

这样,从金融学角度来讲,外汇储备作为国家持有的一项资产,其成本和收益的异化十分明显。

“双顺差”带来的问题还有很多,与当前经济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渗透到很多领域。

四、“双顺差”的解决思路

“双顺差”的治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治本,一个治标。治本的思路,针对的是引起“双顺差”的根源因素;治标的思路,是从减少双顺差的数字本身出发来考虑的。

1. “双顺差”的治本思路

“双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和原有的政策有所偏向。因此,治本应该从这些领域入手。

首先,加大力度增加国内消费。

增加国内消费对于缓解“双顺差”的贡献在于增加国内的最终需求,如前文论述,与消费相比,投资并不构成最终需求。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面临着国内长期高速





增长的投资形成的产能,国内消费是唯一的消化途径。更重要的是,从GDP的几个组成成分来说,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是解决我国经济失衡的最根本的途径,也是解决“双顺差”最根本的途径。

增加国内消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增加国内消费的根本保障。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从而为居民增加消费消除和缓解后顾之忧。

缩小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因为低收入阶层具有相对高的消费倾向。

其次,减少盲目的、不加区别的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今后的优惠政策更加针对出口商品的结构和引进外资的筛选。

以往的优惠政策更多的是不加筛选的,这导致了良莠不齐的外资融入,各类产品的出口。在我国外资和贸易顺差已经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应该对外资有所选择,更加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应该对出口产品有所侧重,适度增加国内产能过剩产品的出口,适度减少高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成本的产品的出口。这要求对我国以往的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优惠政策的调整。

再次,积极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资源和能源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其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稀缺性。

由于我国资源和能源价格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双顺差”数字的背后,成本和代价被人为的隐性化了。价格体制的改革可以引导企业行为,使“双顺差”的成本充分显现出来,从而减少“双顺差”中不经济的部分。

最后,还应该努力改变地方政府追求投资增长、引进外资增长和出口增长的政绩观。

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各种干预和影响仍然十分明显,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转将对“双顺差”问题的缓解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应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功能,使国内外资金之间成为名副其实的替代品。目前的状态是虽然国内储蓄余额持续攀升,但国内融资渠道不畅阻碍了储蓄转变为投资。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将有助于内资对外资替代作用的发挥。

2. “双顺差”的治标思路

“双顺差”治标的思路是指在不触及我国经济其他方面的情况下,缩减“双顺差”本身和减少外汇储备。

首先,增加进口我国急需的资源类和能源类产品。

针对目前我国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的情况,可以通过增加进口力度缩减贸易顺差。因此,可以加大进口资源类产品和能源类产品,这样一来缩小了贸易顺差,二来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可靠的资源和能源的储备,增加了我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人民币汇率浮动应当更侧重于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使人民币的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目前人民币升值趋势下,可以减小国际热钱流入的动力,也可以缓解央行为了追求汇率相对稳定而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问题。

最后,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相当于一个投资者手中的货币资本,这要求一定要考虑这笔资本的收益率和风险规避。因此,一方面应该改变主要持有美元资产的现状,相对分散外汇储备持有资产的构成,用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还可以参股和购买国外企业,增加实物资产的持有比例,如增加黄金储备和石油储备等,这样不仅可以分散风险,还可以取得高于国外政府债券的收益。

总之,治标措施的作用快,治本措施的作用慢;治标措施的效果短暂,治本措施的效果稳固。两者只有配合使用,才是解决我国“双顺差”问题的正确途径。

作者:国研网来源:国研网《宏观经济》



SIF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金融动态

JIN RONG DONG TAI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6 年 12 月

第 7 期 [总第十一期]

- 外资银行为进中国“全开银门”摩拳擦掌
- 厘清巨额外汇储备五大关键问题
- 信贷风险保护新工具
- 我国金融稳定面临三大挑战
-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重要观点摘录
- 巴曙松：银行业全面开放后的竞争格局
- 易宪容：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 劳合社主席：中国保险需求将急剧增长
- 金融改革将临重大转折 9 大调研预热全国金融会议

金融观察

外资银行为进中国“全开银门”摩拳擦掌

派驻广州的新加坡公司职员李先生说，每次到中资银行办理事务都是非常痛苦的事：“一个窗口经营‘公办’；一个窗口只招待高存款户；剩下一个窗口办理所有其他客户的事。”

他每次去银行，就算只是办一件小小的事务，都要排队等候数十分钟。因此，他非常渴望中国进一步开放银行业务予外资银行，当外资银行的分行布点增加时，他会第一时间“转户”。

不过，在东莞经营针织厂的港人陈先生，就坚持将来仍会使用中资银行。

他说：“大陆银行的分行多，在全国都有，办汇兑比较方便。”

今年 12 月 11 日，中国政府将履行五年前加入世贸时的承诺，全面开放银行市场。香港的外资、港资银行纷纷表示，将在第一时间呈交申请表，成为中国的注册银行，而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在中国的注册可在三个月内获得批准。

市场分析，长线而言，外资银行由于在风险管理、产品设计等方面具优势，发展起来将全面影响所有中资银行的业务前景。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仅 1.7%，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

若具体分析，可发现开放政策将首先对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外的全国或地区商业银行，影响较大。

星展银行高级投资策略顾问陈宝明认为，外银

首先将发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于业务同样集中在有关城市的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影响较大。他说：“外资在内地发展银行产品，相信是以信用卡相关、或汽车贷款、及楼宇按揭贷款等业务为主，这与招行、交行存在正面的竞争。”

相反，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由于分支行覆盖各省市县乡，客源基础稳固，未来数年受到的竞争影响轻微。

京华山一香港研究部副主管尤浩然指出，新政策在短期内，将为外资银行提供发展机会，外资银行为免依赖同业高息拆借，进入中国市场时，势将积极扩大存款基础，长远加剧与从事高档客户业务的中资银行竞争。

他说：“根据条例细则，外国银行的分行在中国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限制每笔定期存款不少于 100 万元，兼且分行网络较少，因此，将积极拓展高档客户业务。”

于是，预料将对同样以服务富人客户业务为重心的中资银行，如招商银行（其 0.7% 存款客户占总零售存款 44%）等，造成不利影响。

中银国际的研究报告则指出，细则规定外资银行对同一借款人的借款额，不能超过银行资本余额比例的 10% 要求，目的是防止外资对大型企业提供贷款，预期外资银行将重点发展信用卡及理财业务。

事实上，市场消息也指出，本月访华的美国财





长保尔森，也将争取北京开放中国的信用卡市场业务。

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管理条例细则》，外商独资银行及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发展业务，要达到国际存贷比率 75% 的限制，但有五年宽限期，即比原先预期的三至四年长，有利外资银行的部署。有关政策将限制银行对单一客户的贷款额，不得超过总资本的一成。

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曾景璇认为，虽然宽限期延长，但要达标仍存压力。渣打希望在未来一年半内，将在中国的网点倍增至 40 个；也将于未来 18 个月，将分行数目增加一倍，而柜员机（ATM）数量由 20 台增至 40 台，同时研究入股中国的银行。

在新开放政策下，香港作为比中国更透明和拥有法治的国际金融中心，正积极为外资银行扮演进军中国市场的跳板角色。

据悉，不少国际金融公司，近一年来纷纷加强在香港的布局，其中，好几位新加坡金融专才就被调派到香港的办事处，参与这场中国银行业“大饼”的争夺战。

港资希望借 CEPA 降低进中国市场门槛

身为“主人家”的港资银行，也同时作出部署，希望借更紧密关系安排（CEPA）降低港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也要“以小搏大”。

有 58 年历史的廖创兴银行，就刚在股东特别大会上通过易名为“创兴银行有限公司”。该行解释，希望借 CEPA 的优惠政策，进军中国市场，不希望发展受到家族色彩所牵绊。

“廖创兴银行的创办人廖宝珊，也搞了一家创兴书院，早已贯彻‘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不以一家一姓为念’的宗旨。”该行认为，毋须再冠以“廖”氏。

分析员认为，廖创兴的改名，除了可以更准确反映该行为港交所的上市公众公司外，最重要是摆脱银行“老化”、“潮洲人银行”等形象，有利企业形象年轻化，以吸引中国的年轻一代。

廖银财务部及业务发展协调部总经理陈凯杰表示，该行已经符合 CEPA 框架下香港银行进入中国门槛要求，正计划在中国开设分行，至于会否在中国注册，则仍需研究有关法规。

根据 CEPA 框架的有关规定，香港银行资产规模只需达 60 亿美元（约 92 新元），就可进军中国市

场，比其他外资银行要求低。廖银在广东汕头已有分行，正在申请人民币业务牌照。

陈凯杰指出：“在内地发展，最大的困难是中国幅员广大，要了解客路，从而决定据点所在，并不容易。”他透露，廖银的中国发展策略，首先主要是配合香港客户的需要。

中银的研究报告作出总结：外资银行要从事无限制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需转型为中外合资银行或外商独资银行，从业务范围上，正鼓励外资银行在华正式注册。但是，由于获取人民币零售业务的许可，仍需接受银行监管部门审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而对中资银行的影响，将会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系列之银行篇

开放后中资外资银行优缺点比较

外国银行分行：

优点：

1. 可经营人民币零售及企业业务
2. 可发短期、中期及长期贷款
3. 办理国内外结算
4. 提供资讯调查及咨询服务
5. 可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外币有价证券
6. 代理保险业务
7. 纵使存款及贷款比率要达 75%，但有 5 年宽限期

缺点：

1. 人民币业务范围，限制于每笔定期存款不少于 100 万元
2. 不能从事银行卡业务
3. 提出申请人民币零售业务，需在中国营业 3 年以上。
4. 提出申请人民币零售业务前，需要 2 年连续盈利
5. 不能发行金融债券
6. 不能代理发行、代理兑付及承销政府债券

外商独资银行（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及中外合资银行：



**优点：**

1. 可享有上述外国银行分行在中国所有优点
2. 可从事银行卡业务
3. 人民币零售业务范围金额无限制
4. 存款及贷款比率需达 75%
但有 5 年宽限期

缺点：

1. 提出申请人民币零售业务，需在中国营业 3 年以上
2. 提出申请人民币零售业务前，需要 2 年连续盈利
3. 不能发行金融债券
4. 不能代理发行、代理兑付及承销政府债券
5. 与中国商业银行看齐，需执行中国资产负债比例规定、贷款分类及提存准备金、关联交易规定

中国商业银行：**优点：**

1. 可享有上述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所有优点
2. 可从事银行卡业务
3. 可发行金融债券
4. 可代理发行、代理兑付及承销政府债券

缺点：

1. 须面临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的竞争
2. 外资银行达到存贷比率 75% 的宽限期为 5 年，较市场预期长，面临外商竞争将会加剧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12-06，《联合早报》
驻香港特派员：易锐民

厘清巨额外汇储备五大关键问题

作者：陈道富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货币政策、金融改革

●减少外汇储备的根本之道，在于维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在于协调我国投资储蓄的比例，在于扩大国内消费，从流量上减少外汇储备增长。但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在继续加强有关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藏汇于民”的有关措施的基础上，有必要采取一些较为直接的政策，从存量和流量上，降低官方外汇储备的规模。

●当前可考虑在维持外汇管理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借鉴国际上外汇储备通行的管理模式，由财政部与央行共同使用外汇储备。具体而言，可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在国内筹集人民币资金后，向人民银行购买外汇，取得的外汇主要用于解决国内战略性问题。

●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实现币种的多元化。但对于外汇储备是否可用于解决中国发展中关键领域资金缺乏问题，存在较多的争议。为此，我们应尽可能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市场，

减少在国内使用的规模。外汇储备的海外使用，尤其是海外购买实物资产，可以增加我国商品等的供给，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目前已接近 1 万亿美元规模，我国也已成为国际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已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个大家都比较认可，也普遍认为目前外汇储备规模确实超过了合理的程度。但在如何应对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如何使用外汇储备等问题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争论主要集中在外汇储备是什么，能不能用，有无必要用，如何用，用在哪里等问题。

一、外汇储备本质上是国家的对外债权

外汇储备在本质上是国家持有的对外债权，属于国家资产。外汇储备来源于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



盈余和资本流入。经常账户盈余反映国内储蓄大于投资,而资本流入,则反映居民通过股权、债务等方式,向非居民融资。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反映我国一方面以提供商品、服务等方式,向非居民储蓄,另一方面又通过股权、债权等方式,主要是FDI的方式,向非居民融入资金。从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具体情况分析,外汇储备一方面是由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换取的,属于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央行又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收回货币(用期限较长的债务,替代即期债务),如果忽略中间过程,可认为近期外汇储备是央行发行央行票据(国家债务)换取的。

总之,外汇储备都是一国政府通过本币债务的方式融资,并将取得的资金转化为外币资产的结果。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外汇储备是国外援助或者中央政府直接向外借款形成的,在我国规模很小,可忽略。我国外汇储备的本质,仍是国家的对外债权,但在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增加了货币发行的因素,属于铸币税收入的一种。

二、使用外汇储备比仅仅用于防范金融风险作用更大

这个争论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有没有权力使用外汇储备?二是外汇储备使用会不会危及金融安全?

应该说,外汇储备属于国家财富,国家自然能够使用。目前,由于结构性原因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失衡较长期存在,引起外汇储备增长具有长期性。相应的,这部分外汇储备的使用,不能仅仅满足一般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需求,还应从恢复经济的结构均衡,促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出发,战略性使用。

但在我国当前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这种国家财富的产生,是由国家发行货币换取的,即属于国家的铸币税收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即,除非由人民银行对外汇储备进行运用,否则,其他部门要想直接使用外汇储备,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当然,人民银行还是可以根据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要求,灵活使用,既可以投

资于海外的金融资产,也可以投资于国内的金融股权,如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外汇储备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注资国有银行,就是央行利用外汇储备进行国内股权投资的案例。

总之,在本质上,外汇储备属于国家的财富,可以根据国家的需要使用,但由于我国特有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使其又是铸币税收入的一种,其使用受到人民银行法的约束,存在一定的法律与操作上的障碍。

与外汇储备能不能使用这一问题相联系的,还存在外汇储备战略性使用后,会不会导致金融安全问题。我们认为,将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战略性使用,并不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相反可以提高我国整体的金融安全水平。

一是当前我国外汇占款达7.5万亿元,超过6.4万亿元的储备货币。这意味着我国发行在外的基础货币,拥有百分之百的外汇准备,货币的安全性甚至超过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

二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央行票据,在一定程度上可等同于国债。目前,即使将各种国债加上央行发行的央行票据,其余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很低,远低于国际安全线。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在于各种隐性财政负债。

三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当一国真正发生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时,即使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相对于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国际游资,也是杯水车薪。不能将危机防范完全寄托于持有高额外汇储备上。外汇储备的作用,主要在于调整暂时性的国际收支失衡。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结构性失衡,以至于可能产生金融、货币危机时,外汇储备的作用,仅仅在于为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政策赢得时间。在防范金融风险上,稳健的金融体系,有效的宏观调控、金融监管,比外汇储备的作用更大。如果外汇储备的使用,能有效提高一国经济的竞争力,提高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那么,使用外汇储备将比仅仅持有以防范风险更安全。

三、减少外汇储备的根本之道是要协调投资与储蓄比例、扩大内需

应该指出的是,首先,减少外汇储备的根本之道,在于维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在于协调我国



投资储蓄的比例,在于扩大国内消费,从流量上减少外汇储备增长。但应该看到,短期内实现我国投资与储蓄的平衡,从而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不太现实。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国际产业分工模式变化的结果,反映着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这种失衡状态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为此,在继续加强有关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藏汇于民”的有关措施的基础上,有必要采取一些较为直接的政策,从存量和流量上,降低官方外汇储备的规模。

其次,存量外汇储备的使用,如果处理得好,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潜力,从而使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缓解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势头,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规模较高的问题。

进一步看,当前我国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并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三农领域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隐性财政缺口巨大。导致资金相对过剩,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则与金融市场的功能缺失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超过适度的外汇储备,而不用于解决经济结构失衡,提高金融市场功能,是巨大的浪费,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与经济安全。

四、使用外汇储备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其投资收益

在当前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一方面,以较低收益形式持有高额的外汇储备,又是巨大浪费,超过维护金融安全需要的外汇储备应该且必须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由央行进行外汇储备的战略使用,提高其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法律、操作问题,且与央行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职能有一定的冲突。目前环境下,也给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央行不得不发行巨额中央银行票据,对冲外汇储备增长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国际经验也表明,当一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一定规模后,往往开始重视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实现其战略意义,如新加坡、韩国等。

为此,当前可考虑在维持外汇管理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借鉴国际上外汇储备通行的管理模式,由财政部与央行共同使用外汇储备。

具体而言,可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在国内筹集人民币资金后,向人民银行购买外汇,取得的外汇主要用于解决国内战略性问题。即在利率较低的时期,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将部分外汇储备从央行手中转移到财政部账上。战略性问题的确定,可由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等部委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协商确定。近期可重点解决政府公共服务不足问题,包括医疗、养老、教育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以及帮助解决金融机构的增资扩股、不良贷款处置等问题。

外汇对冲,外汇储备的流动性管理等相关事宜,仍以人民银行为主进行。

此外,可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将外汇储备进一步划分为流动性管理与收益性管理两部分。其中,流动性管理部分可仍由外管局直接管理;收益性管理部分,可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或(和)委托现有的金融机构对外投资,提高投资收益,克服政府直接投资的局限。其资金来源,可部分来源于人行直接管理的外汇储备,部分来源于财政部管理的外汇储备,专职实现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

这种管理体制,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财政部与央行的政策能力,共同实现外汇储备的对冲,减轻央行对冲压力。二是有利于培养财政部外汇管理的能力,进行必要的积累,为进一步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三是克服了央行外汇储备使用领域的法律限制,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较容易实现经济战略目标。四是在人民币汇率敏感时期,避免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根本性变动,可能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这种管理模式,可能有人会担心引发一定的财政赤字。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财政部运用外汇进行投资部分,并不会产生赤字问题。产生赤字的,主要是消费掉的部分,规模并不大,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时期,并不会产生大问题。其次,我国当前处于低利率时期,国内流动性充裕,通过财政发债并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解决制约我国长期发展的历史痼疾、瓶颈问题,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国民财富,最终降低财政赤字发生的可能。

五、外汇储备使用应尽量以海外市场为主

大部分人都认可,应进一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





资收益,实现币种的多元化。但对于外汇储备是否可用于解决中国发展中关键领域资金缺乏问题,存在较多的争议。

除了对外汇储备能否用于战略目的质疑外,首先是外汇储备能否在国内使用的问题。在现有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国内使用,面临二次换汇问题。即央行发行基础货币换取外汇,形成外汇储备,又通过国内使用,再次向人民银行要求换取基础货币。也就是一笔外币资产,将在国内产生两次基础货币的投放,加剧目前国内流动性过剩,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对此,一方面应尽可能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市场,减少在国内使用的规模。外汇储备的海外使用,尤其是海外购买实物资产,可以增加我国商品等的供给,缓解通货膨胀压力。

另一方面,要辩证分析二次换汇问题。如果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换取外汇,并将外汇在国内使用,并不会产生二次换汇问题。当然,这种方式等价于财政部直接发行国债使用,并不能协助央行实现对冲目的,可能在本质上没有意义。但如果这部分外汇并不需要,或者并不需要马上换成本币使用,则这种方式就有意义。中国大量的资金需求,并不是当期的资金需求,更多的是一种或有负债,或者是一种资本金需求,如社保资金的缺口,其真正的需求在未来,又如各类金融机构的增资扩股,是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些资金在当期并不需要马上转化为人民币使用。实际上,央行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础货币投放问题,只是将这个问题在时间上往后延,等到需要额外投放基础货币的时期,自发解决。这些机构的

资金需求,也实现了将当期的流动性问题在时间上重新配置的效果。

因此,可以通过将外汇注资国内的机构(金融机构和实体机构),并由这些机构将这部分外汇资金用于海外市场,既解决了这些机构的历史问题,又提高了机构的稳健性,使其可在国内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其次,用于海外的外汇储备,涉及到海外市场的容量以及可能引发对中国崛起的担心问题,如对世界原材料、能源市场价格的影响,引发能源安全讨论等。

对此,一是中国对世界原材料、能源的影响,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因素。不论外汇储备如何使用,在长期上并不能改变这一影响。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外界对我们的指责,就放弃自己的利益。

二是外汇储备的使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一矛盾。对此,一方面,将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原材料、能源是发展方向,不必避讳,但在具体操作上,应把握时机与方式,减轻集中购买对国际市场造成的影响。同时,应注意借用外汇储备的使用,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另一方面,当前应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促进我国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这可以从根本上减少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这一矛盾。操作上仍可通过入股国内的机构,或设立各类基金实现。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6.11.17

信贷风险保护新工具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名为“信贷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s)的新型信用风险管理工具。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出台了一份旨在促进信贷衍生工具交易的标准合同。从那以后,市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2000年时,未到期的票面本金总额大概为8,000亿美元,而今天,估计已经超过了5万亿美元。

信贷衍生工具使企业可以像交易汇率或利率风险那样交易信贷风险。以前,银行一旦放出贷款,就只能束手以待,祈祷万事平安。而现在,它可以主动管理自己的信贷风险组合。银行可以选择保留一些风险,并为其它风险购买保护。它还可以接手一家公司的信贷风险(并为此收费),而无需向该公司贷款或与其签署任何合同。这就给了银行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多元化的信贷风险。



信贷违约掉期

最简单的一类信贷衍生工具叫做信贷违约掉期 (Credit Default Swap, 简称 CDS)。图 1 中给出了一个例子。假设票面本金是 1,000 万美元, 合约存续期 5 年。违约保护的买方每年向保护的卖方支付 90 个基点 (即 9 万美元), 以购买针对参考主体五年内发生违约的保险。该参考主体通常是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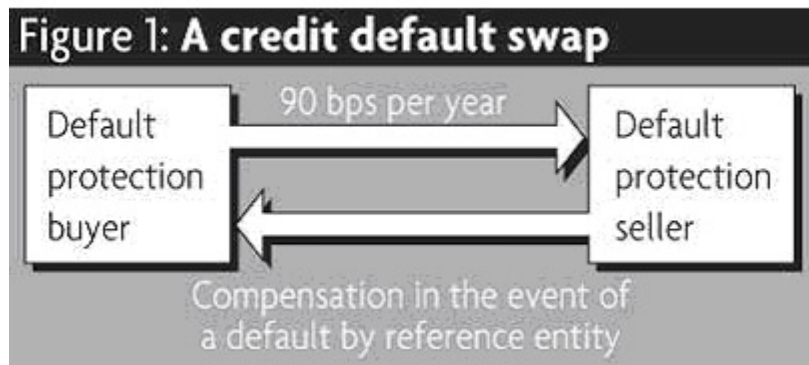


图 1

违约保护的卖方每年支付的基点叫做“CDS 息差”。如果参考主体是一家 AAA-评级的公司, CDS 息差可能会很低 (大概每年 20 个基点)。随着参考主体的信贷质量下滑, CDS 息差便会上涨。在极端的案例中, 可以上涨到几千个基点。

如果参考主体没有发生违约, 那么保护的买方需支付五年的 CDS 息差, 而卖方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如果在五年中发生违约, 那么保护的买方停止向卖方付款, 并且卖方要向买方支付 1,000 万美元, 换得参考主体发行的票面价值为 1,000 万美元的债券。一般来说, 在违约以后, 一家公司的债券会比其票面价值缩水很多。所以, 公司违约会让保护的卖方损失惨重。有时候, 交易被设计为保护的卖方向买方支付等值的现金, 而不是把债券转手。需要注意的是, 在 CDS 开始的时候, 保护的买方不需要持有参考主体发行的债券。

假设参考主体发行的 5 年期债券收益率是 5%, 信贷违约掉期息差是 90 个基点, 如图 1。通过购买债券和违约保护, 一个投资者收入 5%, 并支付 0.9%, 实际纯收益为 4.1%。这个收益几乎是无风险的。如果没有套汇, 那么 4.1% 就是 5 年期无风险收益率。这表明, 信贷违约息差应该大致等于参考主体债券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差额,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参考主体的 5 年期债券收益率与 5 年期掉期利率之差, 非常接近于 5 年期信贷违约掉期息差。

信贷衍生工具改变了经济体系中承担风险的主体类型。银行成为违约保护的净买方, 而保险公司成为净卖方。结果, 承担一笔贷款信贷风险的金融机构, 往往不再是那个当初做信用调查的机构了。这是否有利于金融系统的整体健康仍有待观察。

投资组合信贷风险

在最基本的标准信贷违约掉期之上, 还有很多变体, 不过在最近信贷衍生工具市场上风头最劲的, 还是那些基于投资组合而非单一参考实体的信贷风险工具。使用这些工具的贸易商把经济体系中的违约水平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现在我们假设有一家银行, 它放出了多笔不同类型的贷款。此时, 如果它购买了此类多元化贷款组合的违约保护, 那么就能避免市场中的高违约率给它带来的损失。

为了方便交易, 人们开发了一系列的标准投资组合。CDX IG 投资组合包括北美 125 家发行投资等级债

券的公司。类似的 iTraxx 投资组合包括欧洲 125 家发行投资等级债券的公司。这些投资组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 如果 iTraxx 投资组合中的一家公司被调至非投资等级, 或者逾期违约, 那么就会有另一家投资等级的公司顶替它的位置。投资组合会涉及到一些指数。当 5 年期 iTraxx 指数为 45 的时候, 这意味着在一次交易中, 可以按照每家公司 45 个基点的价格指数, 购买 125 家公司的 5 年期信贷违约掉期。与 CDS 一样, 买方不必持有任何受保护的债券。

担保债务契约 (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 简称 CDO) 是一项广受欢迎的产品。利用它可以从一揽子债券中创造出具有各种不同信贷风险属性的证券。图 2 展示了一个现金 CDO 的例子。它是由 100 种票面价值为 100 万美元的债券组合而成。因组合中债券逾期违约造成的损失被分摊到份额里。份额 1 本金为 500 万美元, 承担组合中第一个 5% 的损失; 份额 2 本金为 1,000 万美元, 承担另外 10% 的损失; 份额 3 本金为 1,000 万美元, 承担下一个 10% 的损失; 份额 4 本金为 7,500 万美元, 承担余下的所有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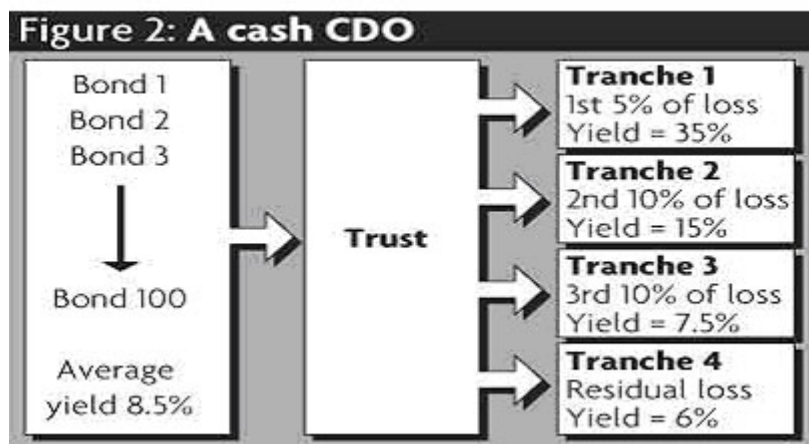


图 2

图 2 中的收益为支付给份额持有人的利率。这部分利率是根据各份额中本金扣除损失后的余额来支付的。以份额 1 为例。本来应以 500 万美元为基础支付 35% 的利息, 但在扣除了 100 万美元的损失以后, 只是以 400 百万美元为基础计算。份额 1 的风险相当高, 在 5 年期的交易内可能血本无归。它一般都是由 CDO 的发行者持有。相比之下, 份额 4 通常都被评为 AAA 级, 基本上是不会遭受任何损失的。

一旦图 2 中的构架搭建完成, 市场参与者就会发现他们并不需要购买债券来发行 CDO。他们只需要发售一揽子信贷违约掉期即可。出售掉期所获得的收入将分配给各份额持有人, 然后根据类似图 2 中的规则来决定每部分损失由哪个份额承担。以这种方法设立的架构叫做合成 CDO。

CDX IG 和 iTraxx 投资组合用于定义标准的 CDO 份额。以 CDX IG 为例, 第一个标准份额, 也就是权益份额, 承担 0 到 3% 之间的损失。第二个份额, 又叫做中间份额, 承担 3% 到 7% 之间的损失。剩下的各份额分别承担 7% 到 10%、10% 到 15% 以及 15% 到 30% 的损失。

目前, 单份额交易的市场比较活跃。在这种市场中, CDO 不是通过购买债券或者出售信用违约掉期来发行,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 即一方同意购买组合中一个份额的保护 (通常是 CDX IG 或者 iTraxx 的一个标准份额), 另一方同意提供保护。现金流则按照合成 CDO 已建立的情况进行计算。

CDO 和类似产品的交易有时被称为相关性交易, 因为一个份额的价值取决于违约的相关程度。以图 2 中的结构为例。如果违约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那么违约在时间轴上就会分布得非常均匀。在这个案例中, 份额 1 风险极大, 因为在 5 年期内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违约。但是份额 3 和份额 4 就基本上不会承受任何损失。随着违约相关性的增强, 违约情况可能会成群出现。这样一来, 份额 3 和份额 4 的风险系数就增加了,

而有意思的是, 份额 1 的风险反而会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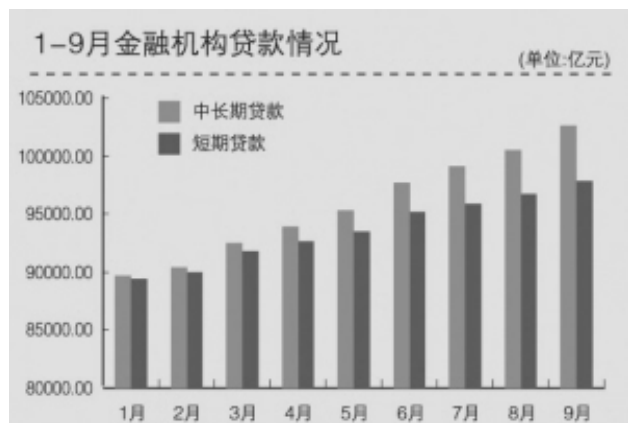
这个市场从来不乏创新活力。如今的交易市场上, 一种叫做平方 CDO 的产品十分活跃, 它是由一揽子 CDO 份额构成的。一些银行甚至已经开始进行立方 CDO (由一揽子平方 CDO 构成) 的交易。眼下, 只要某项交易的收益与多重组合引起的损失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不管该函数多么复杂, 这种交易也可能会有市场。

这当中也不乏讽刺意味。当银行创造信贷衍生工具市场时, 它们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管理信贷风险的方法。但是, 现在他们交易的产品已经演变得如此复杂, 以至于信贷风险管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棘手了。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 约翰·赫尔(John Hull)、艾伦·怀特(Alan White); 2006 年 12 月 7 日

我国金融稳定面临三大挑战

央行认为, 投资与消费失衡、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过多, 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经历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后, 我国金融稳定的程度可以打多少分?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 2006《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给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中国金融总体稳定”的评价。

然而, 乐观的背后,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投资与消费失衡、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过多等, 正在成为困扰金融稳定的三大难题。

系统性风险几率不大

我国近年来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为金融稳定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去年开始的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 如汇改、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股权分置改革等也为金融稳定

“加”了不少分。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 经过几年的金融改革, 我国的金融稳定性和安全性都有所提高。这几年, 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逐步健全了金融法律法规, 完善了监管体系; 对不良资产进行了剥离, 通过注资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等等, 这些工作起到了相当的成效, 以前集中的风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化解, 消除了大量的不稳定因素。他认为, 在目前分业监管的制度框架下,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这种框架本身就使得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集中性得以降低。

在赵锡军看来, 目前维护金融稳定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两个: 首先, 分业监管和综合经营之间如何衔接。他说, 目前, 金融机构都有跨市场、跨行业经营的冲动, 而目前的监管可能对综合经营缺乏统一协调的监管, 甚至可能存在监管真空。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产生金融风险和不稳定性。其次就是市场风险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以前, 利率、汇率都是固定的, 因此, 金融机构风险主要集中在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上, 随着利率市场化以及汇率弹性的加大, 市场风险可能会越来越突出。

三大难题挑战金融稳定

不过, 对央行而言, 目前金融稳定面临的更紧迫问题, 来自于宏观层面。

报告提出,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失衡、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过多, 是彼此相互



影响、同时又切实增加金融风险的三大问题。

投资与消费失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协调平稳发展的突出矛盾。央行报告称,一方面,消费率过低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使得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转变;另一方面,当消费率不断下降以至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时,必然形成贸易顺差。而且,这一问题还存在内在的自我放大机制。低消费率在导致高投资率、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同时,造成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因此只能通过出口和顺差来消化,而顺差的大量增加又会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多,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降低消费率,抑制服务产业的发展,形成不断偏离均衡状态的自我循环和问题的自我积累,从多方面加大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难度。

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过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方式和后果主要体现在:首先,导致利率风险上升,过多的流动性流向货币市场导致货币市场利率走低,流动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长短期利率倒挂,造成银行经营收益水平下降、银行利润受到侵蚀。其次,导致信贷扩张和信贷风险上升过多的流动性使商业银行的资金营运压力加大,银行发放贷款意愿增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受到影响,增大信贷风险。再次,导致过度投资。过多的流动性加剧产能过剩,带来通货紧缩压力,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而产能的集中释放会引起部分行业利润下滑,影响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最后,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压力,流动性过多将增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推升房地产价格,导致经济过热和投资效率下降,潜在金融风险增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宏观经济问题对金融稳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商业银行身上,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商业银行集中了主要金融风险。而且,如果宏观经济不平衡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特别是加剧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造成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再度盲目扩张,从而增加银行不良贷款,加大金融风险,使刚刚宽松的煤电运形势发生逆转,资源环境约束矛盾进一步加大,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使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这样将加大经济波动的风险,随着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上述问题将给银行业和金融稳

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冲击。

货币汇率政策仍需出手

解铃还需系铃人。面对宏观问题给金融稳定带来的挑战,央行开出了六剂药方,认为需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

采取措施切实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继续努力促进消费、增加进口、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措施,缓解经济总量和结构矛盾,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节流动性水平;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公共财政转型力度,增加社会发展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的支出份额,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监测人民币汇率灵活性逐渐增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继续培养和提高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等市场主体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确保储备流动性、对外支付能力、储备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立更加市场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加强对跨境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的监测和管理,重点监测房地产领域、个人外汇交易领域、跨境关联交易和离岸账户的资金流动情况,建立和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的相关监测预警体系。

对此,赵锡军则认为,要解决这几个影响金融稳定的问题,不能单从金融上做文章。首先要明确,目前我国发展的重点是实体经济,增加物质供给、增加收入是经济发展的重点。

他说,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如何更好的实现金融的功能。比如说,不可能因为外汇储备太多,就把出口停下来。应该认识到,目前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金融资源,但是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储备、存款等这些金融原材料的优势发挥出来,提高金融服务能力。

来源:中国证券报,2006.10.31;作者:郭凤琳,周明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重要观点摘录

●国民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投资增长过快、部门行业产能过剩、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等,宏观经济因素与当前金融体制历史遗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银行业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加大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

●加快推进农业银行改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金融改革总体规划,进一步研究论证农业银行改革方案。

●要结合新形势,对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行转型调整和改革。改变依靠财政补贴的传统政策性银行定位,转变成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财务上可持续的、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积极研究三家政策性银行下一步的改革方案。

●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瓶颈,但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其他条件也随之完善。因此仍需充分重视其他深层次

问题,如上市公司结构不合理、定价机制不完善、中介机构缺乏诚信、监管体制不健全等,要全面推进资本市场综合改革。

●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 WTO 以后,我国证券业开放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对外开放水平仍然偏低,明显滞后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在维持我国民族证券机构主导地位的同时,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证券公司。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作者:徐以升;2006.10.31

如需《2006 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全文,
请至“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下载

(<http://www.pbc.gov.cn/detail.asp?col=641&ID=27>)

专家视点

巴曙松:银行业全面开放后的竞争格局

在新的竞争格局下,应该逐步允许国内银行从“分业经营”向“多元化经营”的转变,同时逐步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

2006 年 11 月 16 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发布了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11 月 28 日,银监会发布了新《条例》的实施细则。12 月 11 日,在度过了 5 年的过渡期之后,中国银行业将履行 WTO 承诺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新的银行业竞争大幕正在拉开。

理财业务和银行卡业务将是外资银行发展重点

新《条例》施行后,外资银行以法人银行和分行模式经营的业务重点,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分野。就法人银行而言,将在人民币零售业务方面大有作为;就分行而言,可能仍将比较侧重批发业务和贸易融资。

理财业务和银行卡业务将是外资银行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发展重点。数据显示,2006 年一季度有 3 家外资银行推出 7 款理财产品,二季度有 5 家外资银行推出 13 款理财产品,三季度共有 7 家外资银行向市场推出 23 款理财产品,按季度呈递增趋势。同时,自 2006 年年初以来,上海市外资银行的场外金融衍生合约的名义价值总额也在放量增长。这些都为外资银行日后开展人民币理财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客户基础。目前外资银行中已有汇丰银行、东亚银行和花旗银行获得了代客境外理财的业务资格。

高端客户仍将是外资银行理财业务的主要目标客户。2006 年 3 月,花旗银行在沪设立首家私人银行,集中力量建立私人银行品牌、识别目标客户、组织市场研究并厘定业务策略,为人民币理财业务的发展铺平道路。

此外著名的国际私人银行瑞士友邦银行也在去



年设立了代表处,最快将于 2007 年开展私人银行业务。

银行卡业务也将成为外资银行发展的重点。成熟市场上经营良好的国外发卡行,其银行卡业务已经普遍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银行卡业务收入占本行总收入的比例,处于 20%~40%之间;银行卡业务及其关联业务产生的纯利润约占全行利润的 30%左右。

此外,也不排除一些特色外资银行对中国的金融空白地带做出补充,例如荷兰合作银行与天津和辽宁农村合作社的谈判,荷兰合作银行表示其在中国的发展重点将是农村金融。

中外资银行竞争重点在发达城市

从在华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区域分布来看,外资银行欲争夺的正是中国金融资源最丰富的发达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时间最长,因此上海的中外资银行的竞争状况也最具有代表性。2005 年,外资银行在上海所占外汇贷款余额的市场份额已经高达 54.86%,同时在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受限的情况下,其人民币贷款余额的份额仍然在不断增长,2005 年达到了 4.66%。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三座最发达的城市中,外资银行的网点最密集,中外资银行在这些区域的竞争也将最为激烈。

此外,也应该看到,外资银行网点布局目前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也有政策限制的因素,例如有些内地比较发达的城市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时间晚,另外外资银行的网点扩张也会受到一些非审慎措施的限制。2006 年 12 月 11 日,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以后,在其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成本会有所降低,因此外资银行会加快在其他一线城市甚至二线城市的网点扩张步伐,加剧与当地中资银行的竞争。

建立与国外监管机构之间的定期沟通机制

新《条例》的出台体现了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四个原则:全面兑现世贸承诺;为中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创造法律环境;遵循国际监管惯例;支持和鼓励外资银行在东北、西部和中部发展。这四个原则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监管政策的未来发展大趋

势。就中国目前银行业发展现状而言,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政策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逐步允许国内银行从“分业经营”向“多元化经营”的转变,同时逐步从“机构监管”过渡到“功能监管”。目前在华外资银行实行的是“前台分业”“后台混业”的经营模式,而中资银行仍然是传统的“分业”模式。这无论对于监管者还是国内的金融机构,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允许多元化经营,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需要全面推行多元化经营,实际上这是一个专业化与多元化的选择战略问题。

随着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扩大,其金融创新的步伐也将大大加速,这对监管当局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外资银行的母行往往有相对丰富的金融经验和先进的产品技术,特别是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向纵深进行,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产品逐步丰富完善之后,外资银行的创新能力是不可忽视的。监管当局一方面要鼓励外资银行创新,另一方面要对创新业务实施正确有效的监管。

最后,建立与国外监管机构之间的定期沟通机制,提高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效率。目前中国在华外资银行的商业存在形态还多为分行。外资银行分行的主要监管责任在其母国。随着“法人导向”政策的出台,相当部分的外资银行分行形式将转为子行的形式,而子行的主要监管责任在东道国。

这意味着分行转制后,中国监管当局将承担比以前大得多的监管责任。以前对外资银行分行主要承担流动性方面的监管,而转制为子行后,作为一个独立法人,要接受从法人治理结构到清偿能力到流动性全方面的监管。监管当局要与母国监管当局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把好外资银行的准入关,实施全程监管。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新京报;2006.11.30



易宪容：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时近年底，有人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国内经济已经出现明显回落，这不仅说明宏观调控政策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而且预示着2007年前几季度将持续这种回落态势。更有人指出，对于以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增长率下滑必然会牵动生产增长率下滑，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消费增长率也下滑，因此经济增长率在明年的滑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目前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无需“加码”，相反要采取根本性的逆转政策。

或许，国家信息中心的经济预测报告可能会更可靠些。如，报告认为2007年中国的经济将稳中趋稳，其GDP增长为9.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因此，200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稳中偏紧，并继续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为核心，进一步巩固2006年宏观调控的成果。对此，如果经济能够在其预测的指标内运行，那么中国经济运行一定较为理想。但是，如果现实经济生活运行的制度环境不改变，要达到这种理想的预期是十分困难的。

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仅是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银行信贷增长过快及进出口贸易顺差过大，这些其实都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是现有的制度缺陷导致利益驱动与失衡。而这种利益驱动最便利的载体就是房地产市场快速增长及房价飙升。

目前国内房地产业不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而且房地产业与国内57个产业关联度极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必定会带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说，这一轮国内经济快速增长最大动力就是房地产业，而房价的快速飙升也使整个社会利益向房地产业倾斜。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7%，同比涨幅较高的主要城市包括：深圳12.3%，北京10.9%，厦门10%，成都8.9%，呼和浩特8.4%和广州8.3%等；下降的城市只有2个，分别是：上海2.3%，丹东0.1%。

实际上，国内房价并非仅是少数地方上涨过快。目前的房价统计指标体系是以一手房的平均房价来计算的。这种平均房价不仅不科学、不规范，而且也容易被各地方政府来操纵当地房价变化。从市场的意义上说，用一个地方不同时期的平均房价作比

较，其实是在用不同的东西在比较。只有二手房市场价格的变化，同一东西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价格，这才能有价格涨跌。

即使用目前不合理房价统计指标，一些地方的实际房价同样上涨得离谱了。如在深圳，2006年前三季度整体房价同比上涨19.66%的情况下，福田、南山以及宝安三个区域的住房价格分别涨了5-6成，其中，144平方米以上的非普通住宅，福田区涨幅高达156%。如福田区，在2005年9月底房价为7941元/平方米，到2006年9月底已经涨到了13184元/平方米，1年时间，又暴涨了5243元/平方米，而深圳的南山区及宝安区情况也是如此。

对于国内房地产市场来说，价格机制表面上同样是最为重要运作机制。房地产市场的暴利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进入门槛、技术含量低，从而使国内各类企业都进入房地产市场。从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情况来看，2006年1-9月房地产开发投资12902亿元，同比增长为24.3%，仍然高于2005年的19.8%的4个多百分点。其中商品住房投资同比增长29.5%，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8个百分点。而且房地产投资增长放缓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尤其上海这些特大城市，但是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已经由沿海地区转向内地二线以下的城市。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已为全国一片红。如今年1-8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分别为增长为20.6%、35.5%、31.2%，即东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又开始反弹，而中部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则远远高于2005年的增长速度。

还有，2006年1-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16284亿元，同比增长幅度28.1%，资金总额同比增长了3752亿元。而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增长最快的有国内银行贷款，同比增长为51%（2005年同比增长为10.9%），金额同比增长为1211亿元；利用外资同比增长为35.8%（2005年同比增长为26.8%），金额同比增长为59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为62.8%（2005年同比增长为19.4%），金额同比增长为59亿元；自有资金同比增长为27.7%（2005年同比增长为41.9%），远远低于2005年的增长速度，金额同比增长679亿元；其他资金来源同比增长为22.1%（2005年同比增长为11.5%），



金额同比增长为 1295 亿元,其中定金及预收款(一般是指居民住房预售资金)同比增长为-5.1%(2005 年同比增长为 13.9%),金额同比增长减少了 245 亿元。从这样一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到,尽管今年以来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小,但是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仍然在快速增长。而这种快速增长是在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增长下降及个人住房预售为负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来看,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银行信贷,二是其他资金来源,三是利用外资。从上面的数据来看,今年房地产利用外资增长幅度是较快,但由于往年的基数小,利用外资增加金额的比重仍然十分微小(仅占 1.6%)。因此,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增长主要银行信贷及其他资金来源两个方面。

为什么政府在管住银行信贷的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银行信贷进入房地产市场?而且其增速大于 2005 年的 4 倍以上。这并非国内商业银行不知道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也不是银行监管部门监管不力,而是商业银行利益之驱动使然。无论是已经披露出来的银行基层的窝案还是来自银行高层的贪污大案,无不与大量的银行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有关,无不与国内银行的管理人员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寻租行为有关。银行信贷涌入房地产市场,不仅能够使银行业绩大增,也会让相关的当事人谋其利。

宏观调控对国内银行的信贷紧缩,不仅没有减少进入房地产的银行资金,反之增幅比去年要大。也就是说,房价的飙升、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经济环境不可变,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过热要得到遏制是不可能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要想下落也就困难了。国内投资之所以难持续回落还表现为国内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利润水平不断上扬。比如 2006 年 6 月份,中国工业生产创下 10 年来利润增长的新高,同比增速达到 19.5%;到 10 月份,工业利润的同比增幅从上半年的 28%上扬到前 10 个月的 30.1%。在国内低利率的政策下,企业利润水平上升,更是增加企业投资动力。

同时,国内的低利率政策也是国内贸易顺差迅速增长、国内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及地方投资冲动的根本所在。因为,在低利率政策下,债务人的信贷冲动不可避免,再加上国内银行商业化的信贷规模扩张的冲动,更是给银行债务人的信贷冲动创造先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固定投资增长要减缓是不容易的。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6.11.29

金融新闻

劳合社主席:中国保险需求将急剧增长

英国劳合社主席列文认为中国保险需求将急剧增长

英国劳合社主席列文昨天表示,由于人口结构、经济以及其它因素,中国的保险和再保险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保险需求将会急剧增长。

列文是在英中贸易协会举办的“风险管理研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列文说,中国保险市场正面临着发展的大好机遇。首先,在中国城市,大量人口和财务的集中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些城市多数没有做好防灾减灾的充分准备,而且保险覆盖

率也不够,这就给保险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营运中断保险将是发展较快的业务品种之一。”列文说,在过去的 10 年内,中国非寿险保费年均复合增长 12.5%,同期全球的非寿险保费增长率却只有 3.5%,因此无论未来经济发展怎样,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将为多个险种带来需求的增长。

来源:证券时报;2006.11.29;作者:周荣祥



金融改革将临重大转折 9 大调研预热全国金融会议

中国金融改革将再次迎来重大转折。

11 月中、下旬,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紧张筹备阶段,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方向与措施,经不同层面反复酝酿、多方讨论,最终将形成倾向性或者结论性的意见。

据金融界一位研究人士分析,在即将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改革金融企业的行政级别、确立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方向、做实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可能会重点提及,并将得到充分讨论。

虽然各界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期待已久,各项筹备工作也相当充分,但具体的召开日期仍未确定。目前金融界普遍猜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春节之前召开,当属预期之内。

提前预热

今年 12 月 11 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将结束,中国金融面临着重大转折。因此早在今年年初,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要在今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时国务院曾通知相关部委适时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为筹备这次会议,相关部委成立了 9 个专题调研小组,由这些部委的领导亲自挂帅。比如,农村金融改革调研小组由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负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调研小组由银监会主要领导负责,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主要领导也分别牵头保险和证券改革的调研小组。

此后,由于金融改革的复杂性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性有待观察,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日期有所推迟。“筹备大半年的时间而仍未确定召开的时间,在金融工作会议的历史上还比较少见。”央行一位知情人士认为。

今年 6 月份以来,国务院领导已经多次听取了有关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专题调研汇报和筹备情况汇报。比如,金融监管协调的专题汇报就由中央编制部门领导牵头,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等多个部门进行了汇报。此外,国务院有关领导不久前还听取了农村金融改革的有

关情况汇报,涉农的多个部委和金融机构汇报了农村金融下一步的改革思路和设想。

对于即将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业界充满了期待。

迄今为止这样的会议也只召开过两次。1997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的背景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金融业的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在 2002 年的 2 月 5 日至 7 日召开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会议。而按照惯例,每次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总会有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因此金融界都期待着这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能就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问题都给出明确的说法和改革的方向。

探索“金融机构企业化管理”

据悉,在涉及金融企业的重大改革措施中,有关决策层曾多次提出如何改革金融企业的行政级别。国务院领导曾在重要场合明确表态,金融企业“只有业绩好坏,没有级别高低”。

目前,中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都是副部级单位,这些银行的主要领导都是由中组部管理的“中管干部”。与总行的行政级别相对应,这些银行的省级分行行长都是厅局级干部,地市级分行的行长都是处级干部,县级支行的行长都是科级干部。

“改革行政级别,将是把金融企业完全当成企业,还企业本来面目。”中国银河证券高级经济学家苑德军教授认为,国有银行的改革一直是朝着企业化的改革目标进行的,这次如能改革行政级别,把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将从根本上铲除银行的官本位思想,对银行产生的触动将是深层次的。

业界分析,取消金融企业的行政级别,也有利于理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监管部门有一定的行政级别,被监管者如果也有行政级别,监管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比如,省级银监局的局长是厅局级干部,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的行长也是厅局级干部。一个厅局级单位监管另一个厅局级单位,就有可能产生监管不

力的现象。取消被监管者的行政级别,将有利于加强监管,同时还可以引入金融业的职业经理人,由银行的董事会按市场化原则聘任管理层,培养真正的银行家队伍。

做实“监管协调机制”

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是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调研的议题之一。从 6 月开始,国务院有关部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都作过专题汇报。

统一监管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将最终过渡到统一监管的模式。对于是否需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中央和国务院也考虑过这个提议。但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后,国务院最终决定目前暂不建立超级金融监管部门,而是要做实监管协调机制。

关于这一点,央行行长周小川 10 月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经营和监管是两回事,既可以有分业监管下的综合经营,也可以有综合监管下的分业经营或混业经营。要点不在于机构设置的分合,而在于人才、技能和理念。要早下功夫,培养适应综合业务的监管人才。

至于如何做实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金融界有些高层人士担心,在做实监管协调机制的良好愿望下,有可能产生监管更加不协调的现象。

“监管协调机制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机构?如果没有一个常设机构,就很难把协调机制做实;而如果设立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如何协调?是否需要管人?如果不管人,其他方面就很难真正管得住,而如果管人,这和以前的中央金融工委有何区别?”一位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表示了疑惑。

启动:农行和国开行改革

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方案也是备受金融界关注的焦点。据一位学者型金融官员分析:农行的改革方向是否是“整体改制”,国家开发银行的改革方向如确认向商业化转型,将在何时提出、何时完成转型,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重大改革举措。

国家对农行的改制极为慎重,要求农行要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大框架下论证和设计改革方案,这

也正是农行股改的复杂之处——横跨农村金融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两大难点。直到现在农行的改革方案尚未正式获得批复。

在此期间,有关部门对农行的股改方案反复进行了研究、权衡和论证。按照“改革成本最小、操作风险最低、市场价值和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农行提出了“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改革思路和初步方案。

方案显示,整体改制成功后,农行将是一家具有鲜明特色和强大系统优势的商业银行,以县域市场为基础,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城乡联动,农工商综合经营,本外币一体化,有效地发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金融桥梁作用。

而对于国家开发银行的转型,据上述人士分析,国务院也有了倾向性的说法,即国家开发银行朝商业化方向改革,而不仅仅是定位于目前的政策性银行。

虽然国家开发银行目前仍属于政策性银行,但其业绩远远好于其他商业银行。截至今年 9 月末,国开行表内管理资产达到 20965 亿元,当期和累计本息回收率分别为 100.31%和 99.61%,连续 27 个季度保持国际先进水平。表内不良贷款率仅为 0.76%,连续 16 个季度保持在 2%以内,其中连续 6 个季度保持 1%以内,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实现小幅“双降”。资产减值准备对表内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的覆盖率分别为 277%和 332%。

据悉,对于国家开发银行的转型方案,有关部门可能倾向于“分账管理”,即政策性业务专门设立账户,与商业性业务分开,国开行可以做其他商业银行从事的业务。

但具体如何分账、如何衔接开发性金融模式,目前国开行还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方案,在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开发银行转型方案以前,一切都还存在变数。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06.12.05;作者:孙铭



- ◆ **A Case for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 ◆ **Using Poster Presentations with ESL Students**

MORE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sponse to the need for more research to be done in Business English, a growing field as business transcends borders and cultures in this high-tech age.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merits of using the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through a quasi-experiment conducted on four classes (two experimental and two control groups) of second-year Business Management students at a polytechnic in Singapore. The hypothesis of the study was that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helps the students to retain what they learn for the long-term. To look at long-term retention, students were given a second post-test nine weeks after their common test (first post-test). While the results of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do not prove conclusively that the use of literature based materials helps in long-term retention, they do point positively towards some merits of the use of literature such as facilitating process-oriented learning and helping students develop interpersonal skills, which are essential in the business context. Student comments from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to gather feedback on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seem to indicate the use of the materials incorporating literatur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learning.

Introduction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field of Business English has expanded so rapidly that, according to Hewings and Nickerson (1999), it has become the major branch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St John (1996) reported that the growth of Business English had outstripped that of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and EST (English for Scientific Purposes), yet there appears to be relatively little published research into what constitutes Business English, and its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Hewings and Nickerson (1999: v), two calls have been heard continuously from those involved in training in Business English: the need to “report good practice and share experience”, and the need for “more applied linguistic research into the use of English in business in order to inform teaching”. This paper is a response in particular to the first call to share experience.

Books published in the last ten years aimed at sharing experience with teachers of Business English include



and Johnson (1994), who present strategies for teachers in areas such as needs analysis,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Irigoin and Tsai (1995), who offer creative new ideas for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Donna (2000) who deals with a range of issues from needs analysis and course planning to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nd Hall and Crabbe (1994) whose handbook seeks to help teachers of English for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process of course design. A look at catalogues from major publishers reveals a growing number of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s that teachers can choose from that focus on language skills, such as Barnard and Cody (2000), Grant and McLarty (2001), Johnson (2000), Lites and Thorpe (2001), and Naunton (2000). In the area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many textbooks, such as Bovee and Thill (2000), Guffey (1998), Lesikar, Pettit and Flatley (1999) deal with specific skills, such as writing (letters, memos, etc) and speaking (e.g., making presentations, interviewing for jobs). The textbooks teach strategies and moves to acquire these skills, followed by application exercises. For example, Guffey (1997, p. 288) outlines a four-part plan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write a message communicating bad news that begins with a 'buffer' ("a neutral...opening that does not reveal the bad news"), followed by 'reasons' ("an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for bad news"), 'bad news' ("a clear but understated announcement of the bad news that may include an alternative or compromise) and finally, 'close' (a personalised, forward-looking, pleasant statement).

The role of literature in teaching Business English has been little explored both in published textbooks and research, with only a handful of published works on this topic. These include Duangsamorn (1996, p. 19) who argues for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ability in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Vogt (1998) who suggests using literature in the Business English classroom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other cultures better. Peter (1999) has conducted a quasi-experiment using the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in the classroom and claims that it helps business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in business writing.



So far, none of the textbooks for students and handbooks for teachers available in the market or published research demonstrates how literature can actually be incorporated and used to teach specific business skills such as writing letters, reports, resumes, and giving presentations.

Purpose

This paper seeks to demonstrate how various forms of literature can be used to teach the writing of business letter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merits of using the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and discusses an exploratory study conducted on business students at a polytechnic in Singapore on the effects (including both student response and effectiveness of materials) of using literature in the Business English classroom. The hypothesis of the study was that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helps the students to retain what they learn for the long-term. Before proceeding further, it is important to define terms in the hypothesis such as 'using literature', 'Business English', 'what students learn', and 'long-term retention'.



Definition of terms

Using literature

What is referred to as ‘literature’ in this study does no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literature of that being the ‘finest’, ‘most beautiful’ and ‘best’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a society. Literature at its finest and most beautiful has traditionally not played any major rol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Howatt, 1984; Stern, 1983). 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 literature does not refer to the traditional canon, the English classics or Shakespeare. What is meant by ‘literature’ in this research is, as defined by McRae in his book ‘Literature with a small l’ (1991: vii), “any text, whose imaginative content will stimulate reaction and response in the receiver”. To add personally to that, a good piece of literature text to use in the classroom would be one that is subjective (open to many interpretations), implicit (where the meaning is not so obvious), and which evokes an aesthetic response in the reader (where the reader experiences the text and is affected by it). Most importantly, it must have the potential to engage the reader. Therefore, to engage the polytechnic students, the literature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s both text and audio/audiovisual materials such as a song (listening to the CD and studying the lyrics), an excerpt from a local play made into a movie (watching an excerpt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and studying the text from the book “Army Daze”), and an excerpt from a novel (studying the text).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literature,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this research is fundamentally a study of “language in operation”—how language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such as giving information,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persuading someone; and the different methods by which language operates, such as statement, comparison, understatement, and irony. (Moody, 1971). Some examples of the use of literature to assist in language instruction can be found in Bassnett and Grundy (1993), Carter and Long (1991), Collie and Slater (1987), Duff and Maley (1990), McRae (1991), and Tomlinson (1994a).

The approach taken in using literature in the study is, first of all, experiential. This means that the learners first experience and become engaged in the literature before they go on to analyse it. For example, students may be asked to refer to their own past experiences first before listening to a text, or visualise in their minds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text that is being read to them.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orie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stress the value of experiencing the language in order to acquire the ability to use it (Ellis, 1984, 1994; Krashen, 1981, 1982). Secondly, the approach taken is inductive, where learners discover rules for themselves. Instead of being presented with a model letter and the moves for achieving such a letter, the students are given various letters, asked to analyse them and devise their own strategy for writing an effective letter. Many researchers (Bolitho & Tomlinson, 1995; Tomlinson, 1994b; Willis, 1996) say it is more profitable for the learners to discover things about the language for themselves, rather than being told what the rules are. An excerpt of a lesson using the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to teach writing bad news letters is shown in Appendix 1.

Business English

According to Ellis and Johnson (1994, p. 3), Business English implies the “definition of a specific language





corpus and emphasis on particular kinds of communication in a specific context". In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 the materials developed were intended for a core module i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alled Practical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here the students at the polytechnic received instruction on skills such as letter writing, resume writing and interviewing for jobs, minutes writing and conducting meetings. What was expected by the students and the polytechnic was that at the end of thi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urse, the students would be equipped with skills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English at their workplace.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was limited to letter writing, namely, the writing of good news, bad news and persuasive letters.

What the students learn

Although we have no means of knowing exactly what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what is meant in the hypothesis is the target set for their learning. By using literature, what I hoped to achieve was not just knowledge for the short-term, but ability to use this knowledge in the long-term. That is because through literature, the students learn to pick up different meanings from the way language is used and learn how to use the language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contexts. In using literature, what we are looking at is not simply an "egocentric" approach, where the "personal voice"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but also an "empathetic" approach, where the students, through literature, are able to listen to different voices and respond to these voices, as in writing a bad news letter, to perceive where the customer is coming from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Long-term retention

Psychologists look at short-term memory as information that vanishes in as quickly as 20 seconds if a person is prevented from repeating the information (Kassin, 1995). Long-term learn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capacity to retain amounts of information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Kassin, 1995). This could mean months or even years. Students typically tend to memorise information for a test, and then right after the test, forget the information. Therefore, I would define long-term retention as retention (of information in memory and ability to use this information) even after a test, and this could last for weeks or even months and years. However,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in this study, operationally, nine weeks after a test is used as a benchmark for long-term retention.

Rationale for incorporating literature in teaching Business English

Three reasons are proposed for incorporating literature in the teaching of business students: a) to help students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developing sensitivity and empathy, b) to serve as a powerful motivator, and c) to help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exploit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gained long after the class is over.  

The first reason for the use of literature is that it can help students develop interpersonal skills such as sensitivity and empathy, which are vital in today's global business context. Nieragden (2002, p. 3) recommends





moving on from “teaching linguistic competence” to teaching “interpersonal and (inter) cultural competence” as in the world of business today, shareholder value is directly linked to attention to corporate culture, client orientation and customer service. Hollet (1998: 19)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ble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in effectiv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and knowing what people mean by what they say. She explains that because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in business and “such relationships demand politeness and consideration for face”, we will find that people will not say what they mean. One way to teach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is to use literature. Through literature, students learn how to analyse characters, and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o infer what is not stated (which is implicit) from what is stated (which is explicit). Maley (1989) comments that in literature, readers often have to go beyond what is said to what is implied. According to Tomlinson (1994a), reading literature can help learners to acquire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utterances in which the full meaning is not overt. Through literature texts that look at a range of human emotions and experiences, students can gain a better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and the complexities behind human communic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aders are drawn into different worlds of the characters, and learn to put themselves in someone else’s shoes and see the world through another person’s eyes. This human touch can help students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business people.

A second reason for using literature texts is that they can be a powerful motivator. One of the reasons given by Duff and Maley (1990) for using literatur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is that literary texts deal with matters important enough to the writer to make him or her write about them. They observe that “this genuine feel of literary texts is a powerful motivator, especially when allied to the fact that literary texts so often touch on themes to which learners can bring a personal response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 (Duff & Maley, 1990, p. 6). According to Krashen (1982),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optimal input for acquiring language is that which is interesting or relevant. Using literature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students can arrest the students’ attention and increase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Waters (1994, p. 11) suggests that materials should have “plenty of lively, challenging, stimulating activities capable of motivating learners who lack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use English and who may tend to view ESP as only a requirement rather than in more positive terms”. Especially for the low-proficiency students who may find writing boring, literature can be a good way of 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A third reason to incorporate literature is that it can help students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apply their knowledge over time. In setting out learning purposes for ESP, Widdowson (1983) distinguishes between *competence*, which is the knowledge of language systems and social rules, and *capacity*, which is “the ability to create meanings by exploiting the potential inherent in the language for continual modification and change” (Widdowson, 1983, 8). Carter and McRae (2001, p. 10) recommend using literature to help students go beyond “acquiring basic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to “learning about the language and how it works” because using literature can help develop the “fifth” skill in language learning—the skill of “thinking and processing”. The problem with teaching competence or knowledge, as most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do, is that the students may





achieve short-term knowledge and remember a fixed set of phrases to use and solutions to apply. But in the long-term, they may not have the capacity to exploit that knowledge to solve problems and face transactions which vary day-to-day in the business context. Through literature, students do not just learn a set of moves to write a certain genre of letters, but they learn to discern different meanings from the way language is used and to use the language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the context.

Research Design

To find out whether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helps students to retain what they learn over the long-term, I developed a set of materials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and conducted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four groups of second-year business students at a polytechnic in Singapore.



A total of 65 stude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study, forming two control groups and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The student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classes assigned by the university. I taught a set of one control and on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my colleague taught the other set of one control and on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wo control groups used a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extbook by Guffey (1998), while the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used materials which incorporated the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see Appendix 1 for a sample of one of the lessons).

Instruments

To test the hypothesis of whether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Business English helps in the long-term retention of linguistic and discourse structures, the students were put through three rounds of tests—a pre-test (to ascertain their levels at the start), a first post-test administered five weeks after the pre-test (which was a common test for all second-year students in the polytechnic taking the module on business writing) and a second post-test administered nine weeks after the first post-test (to look at long-term retention). For all three tests, the students were given a choice of two questions, of which they had to answer one. The questions described various scenarios and th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write either a bad news or a persuasive letter or a letter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both. For all the tests, the students wer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polytechnic marking criteria which consisted of format (5 marks), content (10 marks), language (5 marks) and grammar (5 marks).

To examine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was also undertaken.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s of market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were given the questions in post-test 2 and asked to list their criteria for what makes an effective answer. All the student scripts for the second post-test were then analysed to see which ones met at least 75% of the criteria listed by the practitioners. To get student feedback on the literature-based materials, a questionnaire was also administered after the first post-test (see Appendix 2).

Internal Reliability

Ideally, all the test scripts (pre-test and two post-tests) for my colleague's and my classes should have been marked by both my colleague and I. However, my colleague was unable to



mark the scripts for my classes because she was too busy. Despite this, I am confident there was inter-rater consistency. The polytechnic conducts standardisation meetings after each test so that the teachers can agree on what kind of script deserves an A, B, C, and so on. So the marks for the first post-test were determined after the standardisation meeting for the module, and the criteria applied to marking the first post-test were the same criteria used for the pre-test and second post-test. In addition, to ensure inter-rater consistency, I marked script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ost-tests for my colleague's classes. A test was done comparing her scores and mine, which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both post-tests.

Findings and Discuss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and two post-tests were analysed using the t-test and effect-size analysis. The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at I taught will be referred to as Set A and the ones my colleague taught will be referred to as Set B. Table 1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two post-tests and t-test for Set A.

When the mean pre-test scores of 13.13 (out of a total of 25) for control group A and 15.14 for experimental group A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t-test, the result of 3.72 wa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at 0.05 level (35 d.f.). This shows that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on a par to begin with. However, the two groups achieved the same level at post-test 1. The two scores were quite close: the mean score for the control group was 17.21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7.09. As shown in

Table 1

Test results for Set A

	Control A Mean Score	Experimental A Mean Score	T-stat	T-test T-critical (p<0.05, two-tailed, 30 d.f.)
Pre-test	13.13	15.14	3.72	2.042
Post-test 1	17.21	17.09	0.256	2.042
Post-test 2	15.61	17.89	2.61	2.042

Table 1, the t-test result of 0.256 for the first post-test is not significant at 0.05 level (35 degrees of freedom).

To look at long-term reten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 first post-test to the second post-test was compared. The first post-test was the official test conducted by the polytechnic. The second post-test, which I conducted, was administered after a period of nine weeks from the first post-tes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udents did not study letter-writing any more, but moved on to study other aspects of Business English such as job interviews and writing minutes of meetings, and had no opportunity to revise letter-writing materials before the second post-test.

For Set A,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btained a mean score of 17.89 in the second post-test, an improvement from the mean score of 17.09 in the first post-test. However, the mean scores for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slid from 17.21 in the first post-test to 15.61 in the second post-test. As the students in both groups had reached the same level at post-test 1, a slide in results for post-test 2 could be an indication that the students

had begun to forget what they had learnt. A t-test was done to compare the mea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for post-test 2 and i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stat of 2.61 at 0.05 level, 35 degrees of freedom. To see if the gain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trong, an effect size analysis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post-test. According to Lynch (1996, p. 98), “an effect size of 0.5 is considered a moderate effect for the programme, and an effect size of 1.0 is considered strong”. The results showed an effect size of 0.74 which is reasonably strong.

Table 2

Test results for Set B

	Control B Mean Score	Experimental B Mean Score	T-test (p<0.05, two-tailed, 30 d.f.)	
			T-stat	T-critical
Pre-test	14.07	14.56	0.48	2.056
Post-test 1	18.13	17.83	0.29	2.056
Post-test 2	17.89	17.83	0.07	2.056

Table 2 shows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for Set B,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aught by my colleague.

For Set B, the results of the pre-test show both groups were on a par to begin with. Both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 showed improvement from the pre-test to first post-test, and a t-test done to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in the first post-test yield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However, the mean scor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slid slightly, from 18.13 in post-test 1 to 17.89 in post-test 2. A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mean gain for the students from post-test 1 to post-test 2 was zero, i.e., the mean scores remained the same. A t-test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mean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for post-test 2 yield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 effect size analys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post-test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an effect size of 0.11, which translates to a very weak effect of the materials on the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summary, for the set of students I taugh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est results yield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nd long-term retention while for the set of students my colleague taught, the results were not so conclusive and showed a weak effect of the materials on long-term retention. Wha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here is that for both the control groups taught by us, the results of the second post-test were worse than the first posttest. A negative mean gain score from the first post-test to the second post-test is expected as students generally begin to forget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class soon after a test. However,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 taught actually did slightly better on the second post-test compared to the first post-test an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y colleague taught, the results were the same for the first post-test and second post-test. This was after a nine-week interval with no reference to the letter-writing materials.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tudents' grades could perhaps be an indication that the use of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does help them to achieve “capacity” rather than “competence”.



Another interesting point to note is that in the short-term, the standard textbook materials appear to have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than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s the control groups made a greater improvement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first post-test relative to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The materials for the control group are highly structured and are accompanied by the use of the PP- P approach (Present—Practice—Produce). This may have helped the students in preparing and producing for the test. The post-test was graded based on content, format and language. Under content, one of the criteria was whether the students used the strategies and moves taught in the textbook. This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produce “goal-oriented” results, i.e., demonstrate the ability to reproduce strategies that they had learnt in class. Therefor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o studied the textbook would probably have had a slight advantage as the approach of the textbook is also “goal-oriented”. As a result of their better performance in the short-term, the control groups also performed better in terms of overall improvement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second post-test.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post-test 2, the students had a choice of two questions. Both questions required students to write a letter in response to a customer complaint, one regarding bad service at a restaurant and the other regarding bad reception for a hand phone. Ten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s of market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were asked to list their criteria of an effective letter according to the above two scenarios. The respondents sai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tyle of the letter being concise and to the point, they expected the presence of these four items in an effective letter:

1. An apology or a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issu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tter;
2. A brief and short explanation that does not go into too much detail to explain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or expose the company's weaknesses;
3. A pledge that steps are being taken to solve problems or a promise that the problem will not occur again;
4. Attractive and adequate “carrots” such as freebies and discounts to compensate the customer.

All the students' scripts were analysed to see which ones contained the four main criteria listed by the respondents. As very few of the letters in both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managed to fulfill all four of the criteria, the study looked at letters that fulfilled at least 3 of the criteria. Only 5% of the control group of Set A managed to fulfil 3 or more of the criteria mentioned by the respondents, compared to 44%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Set B, 21% of the control group fulfilled 3 or more of the criteria compared to 56%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both sets A and B, there were at least twice as many lett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t contained three or more criteria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None of the letters were graded based on these four criteria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post-tests; they wer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polytechnic's criteria. Yet more lett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found to fulfil more of the practitioners' criteria. One of the reasons could be that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involved exercises to help the students develop empathy and see the problem from the customer's point of view. And it is plausible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naged to retain this





“capacity” for writing to satisfy the reader, as nine weeks after the first test, at least 100% more letters written by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contained three or more of the criteria that constituted an effective letter (judged by practitioner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s.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From the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35 students (out of a total number of 39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experiment) responded to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imed at finding out the students' reactions to the literature-based materials.

What the students liked most

The first question in the survey (see Appendix 2) asked the students to choose the activities which they liked most from the three units taught. The activities included discussion, role-plays, viewing or listening to literature, and analyzing and writing letters. From Table 3, it is clear that the three most popular activities voted by the students were all directly linked to the literature used in the lessons, such as a videotape excerpt from a local movie “Army Daze”, a role-play of a scenario from the novel “Looks and Smiles”, and listening to a song entitled “The Sunscreen Song”. (For an example of how literature is used to help students learn, see Appendix 1). This shows the students highly enjoyed the use of literature.

What the students want included in the materials

When asked an open-ended question of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included in the materials, the students asked for more role-plays, videos/movies and songs (see Table 4). This is perhaps an indication that they want more literature-based materials to be included in their lessons.

Table 3

The five activities that students liked the most

Rank	Activity	Frequency
1	Excerpts from the movie Excerpts from the movie ‘Army Daze’	25
2	Scenario role-play (Karen and Mick at football match)	22
3	Sunscreen Song	20
4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Army daze’ videotape e.g. discussion	17
5	Sorting mail into two bins and telling why the letters are effective or ineffective	17

Table 4

What students want in the materials

Rank	Activity	Frequency
1	Role-play	5
2	Watching videos/movies	4
3	Songs	4

Table 5

The three activities students liked the least





Rank	Activity	Frequency
1	Writing letters	15
2	Role-playing	4
3	Sorting letters	2

What the students liked least

As shown in Table 5, of the activities least liked by the students, the one that leads by a wide margin, is writing letters, followed by role-playing, with only four votes. From my experience and also those of my colleagues in teaching these polytechnic students, we found that generally the students disliked activities in written communication and found them boring, compared to oral communication. The next section will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literature-based materials on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unpopular activity of writing letters.

How the materials helped in learning

When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how the materials helped in their learning, some of them said that they enjoyed the materials and this enhanced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Below are some quotes from the students:

- “brighten up atmosphere, so won't feel bored. Therefore more receptive to learn”;
- “some materials really guided me, making letter writing easy, fun and enjoyable”;
- “some of the ways are very effective and interesting, hence urging you to be in the mood of letter writing”;

These comments seem to support the idea that literature can serve as a powerful motivator,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who are neither confident in the language nor motivated to learn, like these polytechnic students. One student even commented, “I'm more enthusiastic to writing letters now especially refusal letters”. Given that letter-writing is one of the activities least liked by the students, the materials appear to have worked in helping this student overcome his dread of writing letters.

The students also said that using literature helped them to develop sensitivity to the audience. One student said, “It showed me how to present my thought and to convey my messages gently to the other party”, while another commented, “(I) Know how to write appropriately to the theme of the letter”. All the comments from the students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e use of literature-based material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learning.

Limitations

The following are som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1. Given the limited time, only three lessons of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o teach letter writing were developed (spanning a total of 12 contact hours). Although what is being tested in this study is how well the students remember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the materials after a period of time, and no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terial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difference in grades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first post-test, the fact that the approach was only used for a short term of three lessons limits the overall





impact it can have on the students. Had more lessons been developed and used, the study might perhaps have yielded more conclusive results.

2.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is 29% smaller than the total number in the control groups. This is because one of the classes that my colleagues was assigned to by the polytechnic was much smaller than the other classes, with an enrolment of only 15 students compared to an average enrolment of 22 in the other three classes. Furthermore, 40% of the students in this smallest class failed to turn up for either the pre-test or the second post-test, and c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s were conducted during class time. The students were absent for various reasons such as being on medical leave, on industrial attachment or missing class to complete projects for other courses (during the time of the second post-test). Because of the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syllabus,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who missed the tests to take them again.
3. The subjects were not randomly selected but were allocated their classes by the polytechnic based on their majors and foreign language choice.
4. Due to time and logistical constraints, the second post-test was administered only nine weeks later to obtain the results of long-term retention. While nine weeks is a long time considering that the students often forget what they learn immediately after a test, other studies can be done to test the students over a longer period to further validate long-term retention.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the study nevertheless raises some pertinent issues for consideration in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Materials Development

While the findings do not prove conclusively that the use of literature-based materials helps in long-term retention, they do point to some merits of integrating this approach into the teaching of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For example, in the long-term, mor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ble to write letters that fulfill the criteria for effective letters as indicated by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 The Guffey (1998) textbook that the control students used taught different genres of letters—good news, bad news and persuasive—and the moves for each genre. The strategy used in Guffey (1998) for bad news letters is to begin on a positive note, give an explanation first before breaking the bad news and finally, end on a note of goodwill. One of the limitations of using the genre-based approach in teaching letter writing is that in the business world, letters often do not fall neatly into genres. For example, in the second post-test,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write a letter in response to a complaint. This is a combination of a “bad news” letter (not wanting to refund customer’s money) and a “persuasive” letter (getting the customer to continue using the company’s services). The students, however, simply used the strategy they had learnt in writing bad news letters and applied it indiscriminately to write responses to complaint letters.

The moves that the students learnt for effective bad news and persuasive letters were also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Singaporean practitioners expected to see in a response to a complaint letter. In business, the focus is



on keeping the customers and maintaining the bottom-line. Rather than focus solely on product (what a bad news letter looks like) and the strategies used to achieve the product, a focus on the process is just as, if not more,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One respondent, a sales manager, said that before he replied to a complaint letter, he would analyse the situation: will the writer continue to patronise the company or will he or she terminate the company's services, and on top of that, try to generate bad publicity for the company? If the customer appears willing to continue patronising the company, then he w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tell the customer how valuable he or she is. In situations where damage control is necessary, he would simply give in to the customers' demands to satisfy them. Likewise, materials for teaching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should train the students to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izing up the customer and the situation, and to think through how to compose a letter as if they were the ones on the receiving e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tudents need to develop sensitivity and the ability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each unique customer in every different situation, and using the materials incorporating literature can help them towards that e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From the criteria of effective letters listed by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 of marketing, sales,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it appears that what is being taught in the textbook and classroom may be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s really expected in the business world. More research in discourse analysis needs to be done to look at how effective letters (such as good news, bad news and persuasive letters) are written in ways that would satisfy the Asian audience. For example, in the required textbook, Guffey (1998, pp. 173-175) recommends establishing a good relationshi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etter and demonstrates how to do this by affirming the strength of the company and the quality of its products. But boasting about the company was regarded as taboo by some practitioner respondents, who said that if someone were really angry with a company, the person would not want to hear talk about how good the company was. Perhaps this difference in perception is also cultural—Asians consider it impolite to “blow your own horn”. What the Singaporean practitioners were looking out f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sponse letter was an apology or acknowledgement of the issue being complained about. In writing a bad news letter, Guffey (1998) also recommends a good, detailed explanation before rejecting the customer. However, the students did not realise that this cannot be applied to all situations. When the students tried to give detailed explanations of the problem in the second post-test, their letters were deemed ineffective by the business practitioners who did not want to go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problem again; what they wanted was a pledge that positive steps were being taken to rectify the problem. The students were not aware that what they learnt from the textbook might not be culturally appropriate i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live and work. Therefore, more research needs to be done in the Asian context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what is taught in the classroom and what really happens in the business world. As this study only involved interviews with ten practitioners and focused only on letters of response to complaints, there needs to be mor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criteria



for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etters, e.g., complaint letters and sales letters, to determine what students really need to know and learn in the Business English classroom.



Conclusions

In the short-term, the standard textbook materials appear to have had a more positive effect than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s the control groups made a greater improvement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first post-test relative to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In the long-term,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fared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 The mean score of both control groups slid from the first post-test to the second post-test, while the mean score actually increased for on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stayed the same for the other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results do not negate the merits of the textbook for short-term achievement of good grades, the findings do point positively towards the use of literature for process-oriented learning to achieve 'capacity' to exploit knowledge over the long-term. However, the study at this stage is only exploratory. More tests would need to be done over a longer period for more conclusive results, and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both process- and product-oriented approaches in teaching business writing may be worth exploring in the future.

The response of the students to the materials as seen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perhaps an indication of the direction students want the materials to take. The literature used was the most popular activity with the students and it was also what the students wanted to see more of. From the comments given, it appears that materials with literary content helps them to enjoy the lesson, and in doing so, enhances their motivation to learn.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s that the materials were able to get some students enthusiastic about writing letters, an activity which the students disliked the most. Therefore, if the students' reactions are anything to go by, then it seems that there is merit in incorporating the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literature in the teaching of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Appendix 1. UNIT 2: Delivering Bad News

Before you listen

1. Have you ever received bad news before? (e.g. someone refused your request, something bad happened to someone close to you?) How did you feel? In groups of 2 or 3, share with each other your experience.

As you watch (1st clip)

2. Your teacher will show you two short clips from the movie 'Army Daze'. As you watch the first clip, try to put yourself in the shoes of the characters.

After you watch

3. In groups of 3 or 4, discuss how Malcolm and Cpl Ong are going to break the bad news to Krishna about Lathi (Krishna's girlfriend) flirting with 2Lt Heng. Act out the scene.

As you watch (2nd clip)

4. Watch the second clip of the video and ask yourself: How do you think Krishna felt?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if you were Krishna?



*After you watch*

5. In groups of 3 or 4,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if you were one of the boys? Would you have told Krishna about the situation the way Kenny did?
- Do you think the way the boys broke the news to Krishna made him feel better or worse?
- How do you think the news could have been given to soften the impact?

As you 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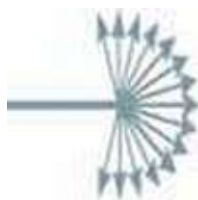
In the exercises above, you looked at how bad news was delivered by 2Lt Heng to Lathi and by the boys to Krishna. How do you break bad news to someone with diplomacy and tact, whil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s? Writing a bad news letter is basically knowing how to say 'no' to someone in a diplomatic way.

6. In the last lesson, some of you have written letters demanding for compensation after using SunTan sunscreen lotion damaged your skin. Your teacher will give you a letter that your classmate has written. As you read the letter, ask yourself: how would I feel if I were the Consumer Affairs Manager?

After you read

7. In groups of 3 or 4, discuss how you would feel if you were the Consumer Affairs Manager and what you would do.

8. Suppose you decided (as the Consumer Affairs Manager) that you will not compensate the customer. That's because you found that the sunscreen lotion that the consumer used had expired a long time ago, which is why using the lotion. In groups of 3 or 4, discuss the scene in which the Manager explains to the customer face-to-face the reason for refusing to compensate. Think about what the manager would say. Act out the scene.



Affairs Manager) that you will not compensate that the sunscreen lotion that the consumer used the customer's face broke out in pimples after discuss the scene in which the Manager

explains to the customer face-to-face the reason for refusing to compensate. Think about what the manager would say. Act out the scene.

9. Suppose you did not have a chance to see the customer face-to-face. Write a letter to the customer, explaining your refusal to compensate.

Compare and contrast

10. Read the letters that your teacher gives you that your classmates have written, refusing to compensate the customer. Compare the letters and in your groups, discuss which one you think will achieve the best effect. Each group will then report their findings to the class.

Looking at other letters

11. Below are four letters (Letters 1 to 4). Which ones do you find effective and which ones ineffective? Give your reasons.

12. Look at the two letters that you find most effective and also at the effective letters that your classmates wrote refusing compensation. In your groups,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Do you find 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letters?
- Is the bad news given in a direct or implied manner?
- Do you see any common forms of language used?





- d) Do you find any similarities or differences in the sequence of the content? See if you can come up with a strategy for writing a bad news letter (e.g. what a bad news letter should contain, which parts should come first etc).

13. Choose any one of the letters (Letters 1 to 4) and re-write the letter to make it more effective.

Appendix 2. Questionnaire survey

Class: _____

Please fill out this questionnaire which will help us to design better materials to help you learn.

Questionnaire on materials used for letter writing

1. Which of the activities did you like most? (You may circle more than one)

Unit 1: The Art of Letter Writing

a. Sunscreen Song

b.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unscreen Song: discussion of song—agreeing, disagreeing with advice, adding your own advice/others

c. analysing language used in direct letters

d. writing activity related to sunscreen products : designing promotional materials (e.g., flyers), writing a sales letter, writing a complaint letter/others

Unit 2: Delivering Bad News

a. excerpts from the video “Army Daze”

b.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video: discussion of video/role-play/others

c. analyzing four bad news letters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d. writing bad news letters

Unit 3: Writing Persuasively

a. Scenario role-play (Mick and Karen at football match)

b. Other activities related to role-play: analyzing language used/discussion of strategies used for persuasion

c. Sorting mail into 2 bins (effective and ineffective mail) and telling why it's effective or ineffective

d. Analysing persuasive letters written in Asian context

e. Writing persuasive letters

2. What activities did you like least?

3. Which activities did you find most useful in your learning to write letters?

1. listening to music (e.g., Sunscreen Song)/watching videos (e.g., Army Daze)/scenario role-play (e.g., Mick and Karen from ‘Looks and Smiles’)





2. discussion
3. role-play
4. analyzing original letters written in the Asian context for effectiveness
5. practice in writing letters

4.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do you find least useful?

5. Did the materials help you in your learning? Yes/ No

6. If yes, in what way?

7.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any of the materials

8.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e included in the materials?

Thank you for filling out this questionnaire.

Using Poster Presentations with ESL Students

Mark Firth

Here is a way to organize students to make and present effective poster presentations on their chosen topics in groups.

Background

After a couple of semesters trying to find ways to have students speak about topics that they generate themselves I came up with the poster presentation method as described below. This particularly works well when you have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in the class as you will find a good range of topics. Alternatively, if all students have the same major you get excellent depth and detail.

Advantages

The advantages of these poster presentations include:

- lots of out of class researching and use of class time for collaboration in groups;
- little or no reading of notes in the presentation;
- and, highly motivated students working towards a final goal.

The project based approach allows for a lot of one-on-one contact time with each student because preparation for each topic takes half a semester to complete and I can visit students individually during the preparation and



practice stages. Finally,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n individual as well as a team score is very fair and students really appreciate this.

I usually also make a listening notebook that students have to complete while they listen to each presentation. After they have heard some 10 groups of pairs they submit to me the listening notebook for assessment worth five percent of their grade. This real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students not paying attention after their own presentations were done.

Procedure

1. Make one copy of the assignment sheet and an assessment sheet for each student.
2. Put students into groups of two or three.
3. Have students brainstorm twenty odd possible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theme and list them all up on the blackboard.
4. Get a leader for each group to write their names next to the topic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study (only one group can do any one topic this way).
5. Have students brainstorm everything they know about their topics.
6. Hand out the assignment sheet and read through together.
7. Get students to research the topic out of class and design posters in class in groups.
8. Have students write their speeches in simple words using the key words and sections on the paper.
9. Coach students in their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10. On presentation day, put posters up around the room with two groups at each station (you will need tape or magnets for this).
11. Have students present to each other, complete listening sheets if you wish, and rotate.

As the students rotate around the room, their presentation progressively improves because they are presenting numerous times. While they rotate, I also move around and assess the students myself on the assessment sheet below.

Notes

I also book a computer room a couple of times for students to do research and type up their poster headings etc. in very large font.

I vary the topics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I am working at but the procedure and format stays the same.

Teachers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rubric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they wish. I usually put two rubrics on one page – one for the individual score and one for the team score. Remember to give it at the beginning so that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they will be assessed.

Assignment Sheet

This semester we will be focusing more on your researching, discuss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There will be two main thematic units of study, these are:

- Unit 1. Health – diseases and disorders.
- Unit 2. Social issues abroad.

For each unit theme,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research a topic **IN PAIRS** which interests you both. You will make a poster showing your research, and make a small





group present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unit.

Assignment 1 – Diseases and Disorders – Poster Presentation Guidelines

Goals:

1. To encourage you to consider and learn about various health problems that exist.
2. To use a broad theme of study to improve English researc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Within the general topic of health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research and present on one specific type of disease or disorder. Your poster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sub-headings and information (other sub-headings are acceptable also):

- **Definition/s:** This should include various forms and degrees of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 **Rationale:**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topic to research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more about it.
- **Treatments:** Conventional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 if applicable. Side affects of treatments.
- **General Information:** Who is at risk by age, location, health ... Use large photos, pictures and graphs where necessary.
- **Societies and organizations:** Groups of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prevention and cure of the disease/disorder.

Assignment 2 – A Social Problem Abroad – Poster Presentation Guidelines

Goals:

1. To encourage you to consider and learn about the social problems that people or communities overseas may face.
2. To use a broad theme of study to improve English researc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In assignment 2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research and present on a social issue/problem that affects people in another country/other countries but is not a major problem in Japan. Your poster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sub-headings and information (other sub-headings are acceptable also):

- **Definition/s:** Define all the relevant terms to the social issue.
- **Rationale:**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topic to research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more about it.

General Information:

- Who is affected by age, location, community, culture, belief ...
-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 History of the problem
- Photos, pictures, graphs ...
- Societies and organizations: Groups of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helping those affected by the issue.

* All written information should be typed (very large, Times New Roman font) and put on to the poster – Key points only, no sentences. Color is encouraged for pictures, graphs etc. Props are also helpful. Be creative.

Conclusion

I particularly enjoy listening to presentations on topics I personally have little knowledge about. The high level of motivation as students are really engaged in their work is always a rewarding and satisfying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and myself.



SIF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 新法解读 ➤ 法治论坛 ➤ 法学教育 ➤ 环球法学 ➤ 法学名家讲坛
法 学 动 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6 年 12 月	第 7 期 [总第八期]

新法解读

银监会：认真履行新职能 保银行业稳健运行

10 月 31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 58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监法》）赋予了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这充分反映了全国人大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与监管的高度重视。中国银监会将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新职能，全力保障中国银行业稳健运行、科学发展。

《银监法》自 200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以来，对于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规范银行业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银行业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银行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的难度日益增大，仅依靠法律赋予的现有监管手段，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本身进行监督检查，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因此，需要修改《银监法》，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外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的权力，以获取有关资料和信息，才能有效防范银行业风险，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一、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有利于及时发现并查处银行违法案件，保护银行及客户的资金安全。

随着银行业务创新和电子化的深入发展，银行业务逐步延伸到经济发展的各个角落，经济犯罪突出表现为银行违法案件。银行违法案件，相当多的属于恶意串通、内外勾结作案，作案手段隐蔽，科技化程度高，如果不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外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取证，而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则很难及时定性并予以查处，有可能扩大银行及客户的资金损失。事实上，由于银行业监管机构没有被赋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的权力，已影响到了对违法案件的发现和查实。

银行业监管机构是具体行使银行监督管理权力

的国家机关，为了保证银行业监督管理权的实现，法律法规已经赋予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等诸多具体权力。这使得银行业监管机构有条件了解银行业金融机构及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基本情况，并掌握相关资料。如果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银行业监管机构就能结合已有的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等权力，依据相关资料及时发现并查实银行业违法案件，为依法处理违法案件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提高查处银行违法案件的效率，从而有效保护银行及客户的资金安全。

二、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有利于防范银行业风险和保持银行业稳定，实现银行监管的目标。





目前,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够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内控水平和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再加上一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导致银企串通套取银行资金、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随着银行收入分配体制、内部考核机制的变革,致使一些银行主动配合企业造假,提高资产分类水平,以达到减少拨备、提高利润、增加奖金的目的。上述现象大大增加了银行风险水平,已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银行业监管机构虽然负有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的责任,但如果仅依靠法律赋予的现有监管手段,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本身进行监督检查,很难发现和查实上述现象。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后,银行业监管机构可以结合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在发现管理疏漏和金融风险可疑线索时,可以及时对客户、股东等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真实情况,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所在,分析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并可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主动、及时、妥善采取处置措施,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合法、稳健运行。

三、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符合发达国家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也是借鉴国内相关监管机构成功经验的要求。

国外许多发达国家为了及时发现银行违法案件,防范银行风险,纷纷赋予银行监管机构对相关当事人、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并获取必要信息、资料的权力。如,美国法律规定,货币监理署作为联邦主要的银行监管机构,有权向客户发出传票,要求银行客户提供相关资料,并进行面谈;有权对银行关联方进行调查和处罚;有权对提供中介服务的主体,如律师、评估师、会计师等进行调查和处罚。又如,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规定,金融服务局(金融监管机构)有权要求与被监管者相关的机构和个人提供文件、信息和资料;对拒不配合的,监管当局可要求治安法官介入,或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相关调查权是监管机构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手段。

此外,我国现行《证券法》、《税收征管法》、《海

关法》以及《审计法》等法律也都规定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有关单位和个人相关调查权。如,《证券法》第一百八十条赋予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可以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证券交易记录、登记过户记录、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可以予以封存。上述规定在实践中,对查处证券犯罪、防范证券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既符合发达国家银行监管的发展趋势,也是借鉴国内相关监管机构成功经验的结果。

四、明确规定相关调查权的适用条件和对象范围,谨防滥用相关调查权。

为了谨防相关调查权的滥用,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次修改《银监法》,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的同时,坚持“既要保证监管需要,又不能无限扩大”的原则,明确界定了相关调查权的适用条件和对象范围。

相关调查权的适用条件为:银行业监管机构只有在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时,经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才能行使相关调查权,采取相应调查措施。其含义是:

第一,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相关调查的触发条件是,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检查对象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检查活动包括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和行为,也包括查处金融违法行为;检查目的是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问题和查清相关的金融违法行为。

第二,对有关单位和个人相关调查,不是针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行为进行检查,而是为了通过有关单位和个人查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问题而做的辅助调查。

第三,相关调查需经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批准。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的职责,相应地进行相关调查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包括银监会、银监局、银监分局,检查由哪一级机构进行,其相关调查即由哪一级机构负责人批准。



相关调查权的对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类：一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关联紧密的民事主体，通常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客户、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主体；二是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市场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士等。

对相关调查权规范行使的约束：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有关人员滥用相关调查权的，可以按照《银监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赋予银行业监管机构相关调查权，对于防范银行业风险和保持银行业稳定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brc.gov.cn> 时间：2006-11-02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银行业全面对外资开放

吸收公众存款没有限制

2006 年 11 月 15 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根据该《条例》的规定，中国将全面履行入世的基本承诺，面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注册后将获得完全的人民币零售业务资格，还将获得从事银行卡业务以及咨询服务的业务。

《条例》将自 2006 年 12 月 11 日起施行。2001 年 12 月 20 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此次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本地注册的外商独资银行成为政策鼓励的导向，根据该条例第 29 条和第 31 条的规定，对于包括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在内的完成本地注册外资银行，其业务范围中相比于外资银行分行多出了“银行卡业务”、“资信调查和咨询服务”这两大业务。

在最关键的人民币零售业务方面，虽然本地法人银行和外资银行分行均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职能，但法人银行方面没有任何限制，而外资银行分行则规定只可吸收 100 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存款。

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王兆星表示，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5 年内开放中国的企业和中国居民的人民币业务，目前这个规定与我们对人民币开放的承诺是一致的。另外，这也完全符合世贸组织允许的审慎性原则。在风险监管方面，外资银行分行不如在当地注册的法人银行，在发生风险的情况下，国内存款人的风险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由于正处于中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前夕，新条例的多项规定都拓宽了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业务的空间，并将享受到更多便利及“国民待遇”。

根据新《条例》，外资法人银行获得了几乎和所有中资银行一致的业务范围，业务范围大大拓宽，即使是外资银行分行也可以吸收 100 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存款，保证了其人民币资金来源。此外，根据《条例》第 8 条的规定，外资银行营运资金的门槛也从最初的 6 个档次最多 5 亿元，调整为现在两个档次，金额也大大降低。

对于需要从外资银行分行转制成为法人银行的，该规定给出了充分的便利，不但允许设立专门的周转资金的分行，审批上也是一路绿灯。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的批文就是通行证，对他们的审批，本地注册所需要的资本金将是一路绿灯”。

目前，汇丰、花旗、渣打等主要在华外资银行都已明确表示，将完成在中国的“本地注册”。

文章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http://www.cacs.gov.cn> 时间：2006-11-17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公布后 有关问题的公告

(银监发〔2006〕82号)

国务院已于 2006 年 11 月 11 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将于 2006 年 12 月 11 日起施行。为配合《条例》的施行,中国银监会于 2006 年 11 月 24 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现就《条例》、《细则》施行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06 年 12 月 11 日起,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外资银行可以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将人民币业务服务对象扩大至中国境内公民;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没有地域限制。

二、已获准经营非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无需批准、在更换营业执照后,可将业务范围扩大至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具体操作程序是,外国银行报送由其董事长或者行长(首席执行官、总经理)签署致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函,外国银行分行凭中国银监会出具的确认函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其他外国银行分行可按照《条例》、《细则》的规定申请经营《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人民币业务。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可按照《条例》、《细则》的规定申请经营《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人民币业务。

三、《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的注册资本或者营运资金未达到《条例》、《细则》规定的,在维持现有客户对象、业务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现有注册资本或者营运资金可以保持不变。如发生变更股东、扩大客户对象或者业务范围、增设网点等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条例》、《细则》有关注册资本或者营运资金的规定增资。

四、外国银行分行改制的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以及《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75%”的规定。

五、外国银行分行改制的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以及《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项“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10%”的规定;在宽限期内,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对 1 个企业及其关联企业的授信余额最高不得超过其资本的 25%。《条例》施行前原外国银行分行已经签约的、并转入外商独资银行的贷款可以在合同期内不适用于此项规定。

六、外国银行分行改制的由其总行单独出资的外商独资银行,应当按照中国银监会的规定,建立独立、完整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未能建立独立、完整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应当在获准开业后 2 年内符合法规要求。

七、《条例》、《细则》施行后,外国银行代表处适用于《条例》、《细则》,不再适用于 2002 年 6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资金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



不得设立代表处,《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代表处、中外合资银行代表处的监督管理参照《条例》、《细则》执行。外国银行将其在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的,该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的代表处可以保留不变,已经设立的总代表处应当在改制后的外商独资银行开业时完成关闭手续。其他外国银行总代表处应当在2007年6月1日前关闭,其职能转入该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被指定为管理行的外国银行分行。

八、《条例》施行前设立的为社会服务的非企业集团内独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应当尽快完成改制或者关闭手续。中国银监会对其存续期间的管理参照《条例》、《细则》中有关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规定执行。

九、中国银监会根据《条例》、《细则》的相关规定受理外资银行各项申请。外资银行在《条例》施行前提出的申请仍然有效,但需要按照《条例》、《细则》的有关规定补充相关资料。

十、《条例》施行前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或者同时设有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应当参照《条例》、《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银监会的要求,调整在中国境内营业性机构的形式。

十一、外资银行尚未达到《条例》、《细则》新修订的其他有关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在2007年8月1日前符合规定。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brc.gov.cn>

法治论坛

中国需要世贸组织的一场官司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入世以来第一场货真价实地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争端已经不可避免;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路途上,我们也欠世贸组织一场官司。

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中国又一次领略到了退让换来对方得寸进尺的滋味。围绕我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的争端发生后,虽然中方努力争取通过双边磋商途径解决,并主动推迟实施这项管理办法,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仍然再次向世贸组织要求设立专家组。

一、中国入世以来尚未单独提起任何诉讼

中国即将迎来入世5周年。在5年里,中国在世贸组织的表现极为“温柔敦厚”,除了2002年与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共同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之外,中国尚未单独提起任何诉讼。在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没有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成员活跃。对贸易伙伴声称要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我们迄今也全部是通过双边协商结束。然而,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双边途径和多边途径中,双边途径固然有高效的优势,但问题是通过这条渠道的磋商可能要较多地立足于对方的贸易规则,而不是相对更加公正的世贸组织规则,而我们当初向公众宣传的入世最大优点之一,恰恰是借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遏制





不公正的对华贸易摩擦,宣传最终都是要兑现的。而且,如果我们表现出竭力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争端、尽可能避免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偏好倾向,无异于给了对方一个讹诈我们的把柄,在国内也无助于巩固国民对政府维护国民合法权益的能力和决心的信念。

二、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政策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就这场争端而言,中国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指责我国汽车产品进口管理办法的欧、美、加应充分意识到,自由化并非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的基本目标,而是实现其基本目标的手段,促使发展中成员经济社会发展才是其基本目标之一,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也为此赋予有关成员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中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只不过是运用了这项合法权利而已。

进一步具体分析,尽管对方指责我国关于整车特征进口零部件的规定有向企业施加“当地成分”要求的意味,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上述规定并非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无理要求。

1. 原产地规则通常按照增值程度计算原产地,在中国国内工厂用构成整车特征零部件组装成的整车,其国内增值程度也不足以按照原产地规则认定其为中国国内生产的整车。换言之,对构成整车特征的零部件总成按照整车税率课征进口关税完全合理。假设美国对欧洲豪华整车课征高关税,对零部件税率较低,如果我国企业在美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设立组装厂,进口构成整车特征的欧洲豪华车零部件安装上4只轮子后向美国销售,美国有关部门肯定会指责这种做法。

2. 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禁止强制性要求外资企业“购买或使用国内产品或任何国内来源的产品”,禁止强制性要求外资企业“购买或使用的进口产品限制在与其出口的当地产品的数量或价值相关的水平”,但我国无论是新《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还是《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都没有向外资企业施加上述要求,仅仅是堵塞进口税收管理的漏洞而已。

三、打贸易官司应追求实际利益而不是表面胜利

当然,打官司有胜有负,尤其是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我们在应用世贸组织条款方面的熟练性显然比欧、美差很多,甚至可能出现有道理却输官司的情况。但是,在贸易争端、特别是发展到诉诸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裁定的争端中,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争端裁决的胜利,而是实际的利益:出口市场、国内产业的发展……争端裁决的胜负与实际利益的得失并不完全重叠,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谈判中追求实际目标而不单纯追求表面胜利。

一种情况是贸易伙伴违规限制我国出口,如果诉诸世贸组织或者区域渠道,我们胜诉的概率较高,但是可能会旷日持久,致使我们赢得“面子”却输掉“里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确定不至于激励对方持续挑起贸易限制的道德风险,我们就应当选择周期相对较短的双边渠道解决,达成的协议可能表面上没有让我们大获全胜,但我们从中获得的利益比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后在世贸组织终裁获胜要多。

另外一种情况是我国为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提升国内产业结构而对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实行限制,遭到贸易伙伴反弹,诉诸世贸组织。鉴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过程旷日持久,且败诉方无需向胜诉方赔偿,在适当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发掘这一特点,即使在争端解决中最终败诉,也达到了为保护本国市场赢得足够时间的目的,国内产业在这段时间内可以成长起来,立足于国际化竞争了。

此次汽车零部件贸易争端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但即使我们最终由于对相关法律运用不够熟练而导致有道理却输官司,漫长的诉讼过程也已经足够让不少内资汽车零部件厂商成长起来了。所以,我们社会公众不宜抱着上世贸组织打官司必须胜诉的心态,而对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不必要的压力,迫使其担心在世贸组织败诉而竭力谋求双边渠道解决争端,反而给对方创造了讹诈我们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实现我们的实际利益。

文章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http://www.cacs.gov.cn> 时间:2006-11-06



国际公法对 WTO 的作用

李鸣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法律作为一种方法及本文目的

WTO（世界贸易组织）从字面上看，是指一个关于贸易的国际组织。但本文所述 WTO 的含义更为宽泛，它不仅是指一个贸易组织，根据语境，还意味着一个调整各国、各地区之间贸易关系的体制，一个世界贸易体制。

研究 WTO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或方法，例如政策的角度、经济的方法。WTO 肯定是一个贸易政策问题，而且是国际社会共同贸易政策问题。这个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或市场开放，使国际社会的普遍成员受益。为什么贸易自由化会达到这样的目的？这又是经济学问题。古典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分工的学说表明，跨国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生产力的效率和价值的普遍提高，从而实现各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WTO 正是这种理论的实际应用。

然而，政策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法律需要政策的内涵，并为政策的目的服务。政策需要以法律形式体现，合法性不仅是政策的基础，而且为政策建立了稳定的预期。经济也不能脱离法律。经济学原理需要形成制度或规范，通过保护和约束社会成员取得实际效用。

因此，对 WTO 来说，无论其政策内涵或经济学原理如何，也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法律都是重要因素。WTO 作为一个世界贸易体制，归根结底是要起作用的。它如何起作用？这是一个法律问题。研究 WTO，法律不可或缺，法律同样可以作为一种方法。

本文从法律上研究 WTO。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国际公法对于 WTO 的作用或影响，或者说，是 WTO 对国际公法的依赖关系。国际公法对 WTO 的作用可能反映在许多方面，本文将择要讨论，旨在说明问题。

二、WTO 是国际公共秩序的一部分

WTO 作为一个世界贸易体制，是国际公共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公共秩序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它要解决的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和平与安全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空间制度问题、金融管制问题。这些问题都具有跨越国界的性质。WTO 主要涉及国际间自由贸易问题，它通过关税减让等各种市场开放措施，达到自由贸易的目的。WTO 从起源到今天，始终是一个以国家为主的国际体制。这一点是法律上讨论 WTO 首先要明确的。

建立世界贸易体制的设想，早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根据自己互惠贸易的经验以及对贸易保护主义危害的认识，主张建立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 ITO）。建立世界贸易体制实际上是重建战后国际（公共）秩序的一部分。战后国际秩序还有两个重要部分，即国际政治体制和国际金融体制。这个秩序的发起者是协约国，美国扮演了重要角色。国际政治体制通过一系列会议，特别是与布雷顿会议大致同期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得以确立，最后体现为 1945 年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布雷顿森林会议虽然提出世界贸易体制设想，但它是各国财政部长的会议，解决的是国际金融体制的问题。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体制由此建立。1945 年，美国以及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继续推动国际贸易组织的筹备工作。美国邀请一些国家谈判缔结一项关税减让的多边协定。联合国也呼吁召开国际贸易组织的制宪会议。从 1946 年到 1948 年，各国政府在伦敦、纽约、日内瓦和哈瓦那分别举行了四次会议，完成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的起草工作。1947 年的日内瓦会议，还就关税减让的多边协定进行了谈判，并且起草了关于关税义务的一般条款。这两部分构成了所谓的关贸总协定（GATT1947）。

然而，由于某些国家国内法的原因，ITO 没有成立，GATT 缔约方遂通过签订一个《临时适用议定书》，使 GATT 发生了“临时”适用的效力。GATT 因此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贸易体制。在 GATT 存在期间，其缔约

方从最初的 23 个增加到 128 个(1994 年),除香港等个别地区外,均为国家。GATT 缔约方主要是各国政府,经历了东京、乌拉圭等回合的谈判,在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达成协议,发起并于 1995 年成立了 WTO。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加入了这个组织。WTO 现有成员 140 多个,绝大多数都是国家,此外还包括欧共体、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几个非国家实体。

WTO 之所以接纳这些非国家实体,是其宗旨所决定的。WTO 是一个贸易体制,主要考虑由关税分割的不同市场的准入或贸易自由流动问题。由于欧共体国家关税统一而形成了单一市场,欧共体本身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贸易自由化问题,它成为 WTO 成员也就顺理成章。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情况类似,它们不仅是单独的关税区域,尤其台湾和香港,还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贸易方,实现全球贸易的自由流动,需要考虑它们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为 WTO 所接纳。它们在 WTO 中的地位也非常清楚,这就是“单独关税领土”。WTO 接纳这些非国家实体,并不从根本上损害 WTO 体制的性质。

WTO 的历史发展表明,它是以国家为主的国际体制,国家是最重要的参与者。WTO 作为一个贸易体制,是国际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它和国际公共秩序的其他组成部分,例如国际金融体制甚至国际和平与安全体制,只有内容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异。

三、条约是 WTO 建立和效力的依据

WTO 作为国际公共秩序的一部分,与其他国际体制一样,离不开国际公法,离不开国际公法的作用。国际体制的参加者主要是国家,国际体制内发生的关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国际公法调整的对象,国际公法主要就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国际公法的性质,决定了它对于各个国际体制的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并且最明显的,表现在对于国际体制的建立和效力方面。

国际体制无论体现为组织,还是体现为文件或协议,都依赖于国际公法意义上的条约。建立国际组织需要制订组织约章,组织约章从公法上讲就是条约,就是多边条约。而不建立组织的国际体制,更是条约问题,参加体制的各方需要用而且只能用其订立的书面协议来确定相互关系,这种书面协议就是条约。更重要的是,任何国际体制的建立,都是为了解决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换言之,国际体制要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就需要依靠国际公法包括条约的约束力。国际公法之所以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约束的效力。这种效力来自于国家的承认:国家承认国际公法具有约束的效力,愿意接受国际公法的约束。国家的这种承认早已成为国际公法上的,一项确定原则,即“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国家参加条约就必须遵守条约的规定,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国际体制通过国际公法的约束效力而发挥实际作用。

WTO 的历史发展,与条约的作用密不可分。如前所述,1944 年到 1948 年,国际社会曾经讨论建立 ITO,后以 GATT 代之,并在 GATT 基础上发展了 WTO。那么为什么 ITO 未能建立?为什么 GATT 能够成功?为什么 GATT 能够发展成为 WTO? 仔细分析,都是条约问题。

ITO 是一个国际组织,它需要通过条约建立。而条约的缔结又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主要是签署或批准。只有经过这样的程序,条约才能生效并对当事方产生约束的效力。签署是国家行政机关主要是对外关系机关的事情。谈判代表达成协议,由有权的行政当局代表国家对协议的内容表示同意,这就是签署。批准则是国家立法机关的事情,是立法机关对协议内容表示的同意。批准程序是现代国家体制在国际公法上的反映。由于条约涉及到在国内法上的地位,包括作为国内法在本国的实施,为了保证条约获得本国法的地位并在国内贯彻落实,立法机关对条约的批准成为必需。立法机关的批准还意味着国内社会广泛参与国际法的制订,或者说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因为立法机关通常是普选产生的。笼统地讲,重要的条约特别是一般性多边条约(包括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都需要批准。条约是否需要批准由缔约国决定,缔约国可以在条约文本中规定本条约是否需要批准。国内法也可以对本国需要批准的条约做出规定。签署和批准在国际公法上是有意义的。如果条约无需批准,签署就意味着国家对承受条约约束而表示的同意。如果条约需要批准,则批准才具有此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签署仅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对条约文本的认可。

ITO 宪章因涉及参加国际组织,在参与起草的一些国家国内法看来需要经过批准。然而,由于当时国内政治气候的原因,美国国会拒绝批准。美国国会的这一态度,导致了 ITO 的流产,因为缺少了美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的参加,该组织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条约的批准程序阻碍了 ITO 的建立。

GATT 之所以能够替代 ITO 而发挥作用,则是条约签署的效果。1947 年日内瓦会议上起草的 GATT,从美国国内法来看,只要是作为关税减让及限制阻碍贸易措施的协议,而不涉及成立国际组织,是无需国会批准的。美国行政当局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出于对国际贸易秩序特别是各自利益的考虑,强烈希望 GATT 尽快实施。于是,它们制订并签署了《临时适用议定书》,使其成为迅速生效的条约。更重要的是,它们借该议定书适用 GATT 内容,扩展了条约的效力范围。

理论上讲,有关缔约方直接签署 GATT 并使其生效并非不可行,但至少有两个法律的原因促使它们采用《临时议定书》的方法。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法。美国行政当局签订关税减让协议乃是根据国会法律的授权,而当时的授权是临时性的,即有关协议对美国的约束不能超过一定期限,美国行政当局只能签订一定期限的协议。另一个原因是,删除了成立国际组织条款的 GATT,在其他一些缔约方的国内法上仍可能需要批准,签署《临时议定书》可以避免拖延 GATT 开始适用的时间。

为了绕过国内批准程序,有关缔约方在《临时适用书》中还做了一个特殊规定,这就是“祖父权”条款。按照该议定书的规定,GATT 的第一部分最惠国待遇和关税减让义务,以及第三部分程序条款,是该议定书当事方即 GATT 缔约方必须履行的。而第二部分构成了一种例外。该部分规定的一些重要义务,例如关税手续、配额、补贴、反倾销以及国民待遇等,不是缔约方必须履行的义务,缔约方享有所谓的祖父权,即它们有权继续适用在其成为 GATT 缔约方时已经存在的国内立法,即使此等立法与第二部分义务相冲突。“祖父权”条款解决了大多数 GATT 缔约方行政当局同意适用 GATT 而产生的国内宪法问题,使它们得以直接签署《临时适用议定书》。

GATT 通过《临时适用议定书》对其缔约方发生了约束效力。这种“临时”的条约效力不断地续展,一直到 1995 年 WTO 正式成立。GATT 的事实存在和成功运行,与条约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WTO 的正式建立依赖于 1994 年马拉喀什协议,它被称为“WTO 宪章”。WTO 宪章被视为新条约而不是旧条约或 GATT 的修改。这意味着 WTO 是 1995 年正式成立的国际组织,接受该宪章及有关协议的 GATT 1947 缔约方以及欧共体都是 WTO 的创始成员方。为什么该宪章被作为新条约对待?因为作为旧条约需要修改 GATT,这不仅仅是增加有关设立国际组织条款的问题,还意味着要经过 GATT 复杂的修改程序以及加入程序。而这些已经没有必要了。重要的是,GATT 缔约方已就建立一个贸易组织及全面适用 GATT 等问题,包括废除 GATT 中的“祖父权”条款,达成了一揽子协议,新条约能够使这些成果迅速生效,新条约成为选择。新条约不仅能够反映新的协议成果,又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性。

WTO 宪章通过附件的形式,与 WTO 成立之前的各轮贸易谈判成果,特别是 1994 年修订的 GATT 连接在一起。这些附件本身就是独立的条约,它们在 WTO 宪章的“伞”下又连成一体,构成了 WTO 条约体系。这样,尽管 WTO 宪章只有区区 16 个条款,并且基本是建立国际组织的规定,但它通过条约之间的连接,继承并发展了 1947 年 GATT 以来一直运行的世界贸易体制。

由此可见,世界贸易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和运行,条约是法律上的决定因素。正是条约,为 GATT 缔约方和 WTO 成员规定了关税减让等各项义务。也正是在条约基础上,WTO 才最终成立。根据“约定必须遵守”原则,承担有关义务的国家和地区必须信守条约的规定。条约成为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有效手段。世界贸易体制通过条约发挥着调整全球贸易关系的实际作用。

四、影响 WTO 的国际公法领域

WTO 的建立和运行依赖于条约。但在国际公法上,条约并不孤立地存在,它与国际公法一些重要问题或领域有着密切联系,并深受这些领域的作用或影响。这些领域通过条约也深刻影响 WTO。

第一个领域可以说是国际法的渊源。国际公法上有两个主要渊源即造法方式,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际习惯。条约是当事方的明示同意,以条约方式产生的规则统称为协定国际法(条约规则)。习惯是被

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国家实践,以习惯方式产生的规则统称为习惯国际法(习惯规则)。条约和习惯存在着互动关系。由于条约特别是一般性的多边条约具有编纂已有习惯等功能,条约规则不仅可以建立在习惯规则之上,习惯规则也可以通过条约规则体现。更重要的是,受“条约不及第三国”原则的限制,条约只对当事方有约束的效力,而不能约束非当事方,条约规则只是国际公法上的特别法。而习惯规则不同,它来自于国家的一般实践,属于国际公法的一般法,适用于国际社会的一般成员。条约和习惯效力范围的差异,导致了在许多情况下协定国际法对习惯国际法的依赖,就像国内契约对一般法律的依赖一样。

条约的渊源性质以及和习惯的关系,完全适用于WTO的情况。WTO条约,包括WTO宪章及其涵盖协议,属于协定国际法范畴,是主要关于贸易问题的条约规则。这些规则可以说构成国际公法的一个专门领域(可称之为“WTO法”)。但是,WTO法如同其他条约规则一样,受到条约性质(不及第三国)的限制。它需要习惯国际法,受习惯国际法的作用或影响。

还以前述条约的缔结程序和效力为例。有关条约的签署或批准之所以能够生效,之所以对当事方产生约束的效力,是因为国际公法的一般法或习惯法是这样规定的。条约当事方可以约定本条约签署或批准生效后,其国内立法也可以规定需要批准的条约,但从根本上讲,起作用的是习惯国际法。正是习惯法给予签署或批准以法律意义,条约才得以生效。而生效的条约必须遵守,毫无疑问,乃是“约定必须遵守”这一古老习惯作用的结果。

关于条约的缔结程序,有一个国际条约加以规定,这就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的签署或批准的法律效果以及“约定必须遵守”原则,由该公约分别规定。该公约及相关的规定,可以说明习惯国际法对于WTO的作用。其一,公约从形式上看是条约规则,只能约束当事国,公约关于条约签署或批准的规定也只对当事国有约束效力。而WTO一些成员并没有参加该公约,公约作为协定国际法不适用于它们。那么,为什么1995年WTO条约需要经过批准的程序?为什么批准后便有约束的效力?显然是习惯法的作用。在条约缔结和效力方面,支配WTO成员条约关系的法律是习惯国际法。其二,如果从WTO的历史来看,习惯法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在ITO宪章和GATT1947的年代,并没有条约法公约。当时支配条约缔结和效力的法律就是习惯法。正是习惯法有关规则的作用,才有了GATT和今天的WTO。

习惯国际法对WTO的作用,反映在WTO的许多方面。如果将WTO视为一个条约体系,可以说习惯法的作用贯穿于WTO的始终。

第二个领域是条约法。条约主要是国家依国际法规定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国际公法是支配条约的法律。具体地讲,条约的缔结、解释、适用(效力)、修改、失效等问题,都要按照国际公法有关规定进行。国际公法的这些规定统称为条约法,即关于条约的国际法,类似国内的合同法。支配的法律是区分条约与国内契约的重要标准。一项国际协议之所以被视为条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受国际法的支配,或具体讲,受国际法上的条约法支配。国内契约不是条约,因为支配的法律是国内合同法。

条约对WTO的作用,从本质上讲是条约法的作用。有关条约的签署或批准之所以有约束的效力,因为条约法这样规定,因为“约定必须遵守”是条约法在内的国际公法久已确立的原则。条约法对WTO的作用,不仅体现在WTO条约的缔结和效力问题,还应体现在它的解释、适用、修改、失效等一系列问题。WTO条约在这些问题上都应当遵循条约法的规定。这是条约的应有之义。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于WTO条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该公约被认为是对有关习惯规则的编纂,因此,尽管WTO一些成员不是其当事方,该公约的规定仍可以作为WTO条约的支配性法律。从实质上讲,支配WTO成员条约关系的是有关的习惯规则,此等规则借条约法公约对WTO成员产生约束的效果。

WTO条约的一些规定,反映了条约法的要求。最典型的是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定。WTO《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书》第3条第2款规定,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按国际公法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来阐明这些协议中的现有规则”。这个规定从理论上讲似乎是多余的,因为WTO条约的支配性法律就是也只能是国际公法的条约法,条约法有关规则肯定适用于WTO条约的解释。然而,它确有一种强调的作用,它加重了条约法对WTO条约应有的意义,也有助于纠正将WTO条约视为契约的错误认识。此外,它还清楚地说

明了习惯国际法对 WTO 条约的实际作用。它甚至还揭示了条约与习惯的某种关系。什么是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就是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因为它是对已有习惯的编纂。

条约法作为支配 WTO 条约的法律,贯穿于 WTO 的始终。WTO 与条约法密不可分。WTO 不仅建立在有关条约的义务之上,而且建立在条约法的基础之上。

第三个领域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具体讲,是国际法在国内的效力问题。WTO 条约义务无论如何产生,也无论如何解释,最终是需要 WTO 成员贯彻实施的。这些义务的实施不仅是条约法问题,还涉及到 WTO 成员境内的法律。

从国际法来看,国际义务在国内的实施问题是比较简单的。国家承担了国际义务,无论是条约义务还是习惯义务,都必须忠实履行,因为“约定必须遵守”。从这个原则出发,国际法形成了一个确定的规则,即各国不得以其法律包括宪法为由违反国际义务。换言之,国家有义务使其法律与国际法保持一致。国家通过国内法违反自己承担的国际义务,并对他国造成损害,要承担国际责任。简言之,国际法只要求国内法的服从:只要国内法满足了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要求,国际法不再过问。

为了履行国际义务,各国的国内法发展了两种实践,一是“采用”,二是“转化”。“采用”通常是指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将国际法包括条约视为本国法的一部分,直给予它在本国国内适用的效力。“采用”更多是针对习惯国际法的。“转化”是指国家通过自己的立法将国际法转变成为本国法,然后予以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机关直接适用的是本国法,国际法只能通过本国法在国内发生效力。对于这两种实践,国际法都是承认的。因为国际法只管国际义务是否得到履行,而不问它们如何在国内履行,这是各国自己的事情。

上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完全适用于 WTO。WTO 成员有义务遵守 WTO 条约的规定,有义务使其境内的法律与 WTO 条约的规定保持一致。至于说它们采用哪种实践,属于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在这方面,它们不仅要考虑自己对待条约的一贯态度(主要表现在宪法或法律的规定),还要考虑 WTO 义务的内容。

从内容来看, WTO 义务更适宜“转化”。WTO 义务旨在规范或约束政府的行为,削减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以及保护知识产权,都是政府的事情。WTO 义务主要是政府承担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也是政府的。WTO 一方违反义务,对他方造成损害,他方有权提出求偿要求。WTO 的法律关系是政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转化”的方式能够达到约束政府行为的目的。WTO 成员完全可以通过将自己的法律与 WTO 义务保持一致,限制政府的行为,满足履行国际义务的要求。在 WTO 成员违反了 WTO 义务的情况下,救济的方式也是清楚的:受害方可以在国际上追究违约方的责任。WTO 条约本身似乎也倾向于“转化”的方式,因为它强调了 WTO 成员的法律要与 WTO 义务保持一致。各国、各地区适用 WTO 义务的实践也表明,“转化”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方式。

谈到“转化”,又涉及到它的性质。“转化”首先并且本质上是国(境)内立法行为。这一点应该明确。“转化”是用国内法表达国际法,是保持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一致;国内直接适用的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如果承认 WTO 义务更适宜“转化”,那么,这种义务在 WTO 成员境内的实施问题,本质上就是各成员境内立法的事情,各成员的立法机关承担了履行 WTO 义务的主要责任。

由此可见, WTO 不能脱离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及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关系到 WTO 义务的有效实施,是 WTO 的重要法律方面。

第四个领域是国际责任。国际责任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法为国家规定了义务,国家应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国家违反了义务,对他国造成损害,就发生国际责任问题。关于国际责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一直致力于起草国际公约,有关的公约草案现已由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但还未进入缔结程序。因此,有关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定基本上是习惯规则。不过,有关的公约草案,特别是《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旨在编纂关于国际责任的习惯规则,它们对于确认有关习惯规则的存在或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国际责任的国际法规定,也应该适用于 WTO。WTO 条约为其成员创造了义务,这种义务从性质上看,与国际法的其他义务,例如外交关系法、海洋法所创造的义务是一样的,都是法律义务。违反 WTO 义务,如同违反国际法的其他义务,都面临责任问题。此外,在 WTO 框架下,并没有专门的责任制度。而 WTO 成员违反 WTO 义务,特别是对其他成员造成损害,又必然会发生责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国际法标准加以处理。国际法关于国际责任的规定,提供了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关于国际责任,国际法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谁的什么行为将导致国际责任?国际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它们肯定也是责任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可能导致国际责任。但国家是抽象的,它需要一些机构和个人来代表,国家的行为实际上是这些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个人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最主要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将导致国家的国际责任。明确这些问题对于 WTO 成员来说非常重要。WTO 义务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境)内体制,各个机构特别是立法机关起到重要作用。它们所具有的代表性,使其违反 WTO 义务的行为面临政府承担责任的后果。

关于国际责任,国际法还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即责任的形式或法律后果。确认责任后,紧接着就是以何种形式承担责任。传统上,国际法规定的责任形式主要有停止不法行为以及赔偿、恢复原状等。这些应该说都适用于因违反 WTO 义务而引起的责任。由于 WTO 义务的履行对境内体制的依赖,要求修改国(境)内法以停止不法行为似乎成为 WTO 的重要救济方式。

国际法关于国际责任的一个发展,表现在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导致的责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些习惯规则。而在 WTO 条约中,也有不违反 WTO 义务的责任问题。这与国际法责任制度的发展完全吻合。在确认因不违反 WTO 义务而导致的责任时,有关的习惯规则,如果有的话,也应该是可适用的法律。

国际法责任制度,是对国际公法各个领域包括 WTO 都适用的制度,是一个统一的制度。它主要规范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导致的责任,同时也规范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某些行为而引起的责任。这个制度支配着 WTO 的责任问题,两者密不可分。

国际公法对 WTO 的作用或影响,还反映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争端的解决。WTO 的目的是促进国际自由贸易。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无非是两种:武力或和平(合作)。武力强迫市场开放,中国历史上的鸦片战争为典型事例。WTO 是一种和平的方式。实际上,它的发起也包含了对二战原因的反思。从这一点讲,WTO 甚至可能具有某种避免使用武力或战争的效用。无论如何,WTO 是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自由贸易问题的,它体现了国际公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

WTO 还专门建立了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 WTO 的一个特色。但该争端解决机制不可能脱离国际公法。它为和平解决争端而设,它本身也是条约的结果。更重要的,它要根据 WTO 义务裁判,而裁判时必须根据条约法加以解释和适用,必须根据国际责任制度确定有关的责任,必须考虑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及实践。它适用的法律,不仅包括 WTO 条约,还应包括国际公法的其他内容。WTO 从争端解决方面看,更离不开国际公法的作用。

人权也是一个方面。人权是国际公法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的领域。人权国际法的发展对国际经济组织及其原则提出了挑战。就 WTO 而言,它所奉行的国际贸易自由的原则,被认为同尊重人权的原则存在着某种固有的矛盾。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国家雇用童工生产出口产品,从人权法上看是违法的,但从自由贸易原则来看并无违法之处,雇用童工与自由贸易无关。国际公法不同领域的原则发生抵触。假如进口国以违反人权标准为由设置贸易壁垒禁止有关产品进口,那么,这样做是否符合国际法呢?换言之,自由贸易原则是否要受到人权原则的制约?欧洲法院的一些案例已经倾向于人权原则优先,也就是说,已经开始用人权的标准检验贸易的规则。尽管欧洲的经验似乎还未扩展到 WTO,但其影响已经产生。无论如何,人权对 WTO 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总之,国际公法的一些重要领域,都对 WTO 产生作用或影响。这些作用或影响根源在于 WTO 条约,在于 WTO 条约义务。正是 WTO 条约及其义务,建立了 WTO 与国际公法这些领域的联系,导致了这些领域对

WTO 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这些领域的作用或影响, 又充分说明了 WTO 对国际公法的依赖关系。由 WTO 条约构成的 WTO 法, 只不过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方面或领域, 只不过是协定国际法的一个部分。它同国际公法的其他领域及协定国际法的其他部分一样, 根植于国际公法的土壤里, 运行在国际公法的环境中。

五、总结及结论

WTO 是“公”的秩序或体制, 国家是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参加者。WTO 内的关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有组织的或体制化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国际公法调整的对象, 国际公法成为 WTO 之必需。条约是国际公法的重要工具, 它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条约通过为当事方规定权利和义务对它们产生约束的效力。WTO 依赖于条约而成立并发挥着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实际作用。条约在国际公法上并不孤立地存在, 国际公法不同领域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通过 WTO 条约对 WTO 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WTO 对国际公法存在着依赖关系。

这种关系说明了什么? 它首先说明了 WTO 的法律基础。这是 WTO 的基本法律问题。WTO 的法律基础不是国内法。国内法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重要贸易方的国内法, 可能深刻地影响 WTO, 但这种影响只能透过国际法或在国际法的限度内发生。WTO 的法律基础不是国际私法, 因为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 尽管它也可能影响 WTO。WTO 的法律基础也不是欧盟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法律, 这些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的法律可能也影响 WTO, 但像国内法一样, 其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并受国际法的限制。WTO 的法律基础更不是自然法或道德法。WTO 建立在其条约基础之上, 支配 WTO 条约规则的是国际公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WTO 的法律基础是国际公法, 它包括 WTO 条约规则, 也包括国际公法的有关原则、规则和制度。

这种关系还说明了法律原理的重要性。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归根结底, 体现的是国际公法的原理。正是国际公法的原理, 构成了 WTO 的法理支撑。WTO 不过是这一原理在国际贸易领域运用的实例。这一原理适用于 WTO, 就像古典经济学原理创造 WTO 一样。国际公法原理作为法律的分析工具, 对于 WTO 的研究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来源: 东方国际经济法律网 <http://www.eastwestlaw.com>

法学教育

哈佛对厦大: 针尖对麦芒

陈安教授, 一个严谨的学者、一个谦虚的国际名人。

我能讲英语, 你能讲中文吗?

25 年前, 陈安教授曾应邀到哈佛大学讲学两年; 其后, 又以“亚洲杰出学者”的名义, 应聘担任美国俄勒冈州西北法学院客座教授。他多次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欧盟总部)、瑞士(联合国分部)、德国、英国等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讲学。

你知道吗? 这样一位用英语在国际上讲学的人物, 他来自闽东北穷困的山沟沟, 当时“中学英语考试可以考 100 分, 但是实际水平只有 20 分”, 陈安自己评价说。

陈安教授初到哈佛, 一度讲的是解放前的山沟沟英语, 甚至连“中国式英语”都谈不上, 外国人经常听不懂。在哈佛大学讲坛上, 一个旁听的美国教授当众嘲笑他。陈教授用英语反问他: “我能讲英语, 讲一点美国式英语, 尽管讲不好; 但是你能讲中文, 会讲中国的北京话吗?” 那位教授脸红了, 他承认: “我



不会。”后来，那位美国教授对陈安教授尊敬三分，路上见到老远就打招呼：“嗨！陈教授，你好！”

经过发奋图强，到美国讲学的第二年，陈安教授再站上哈佛的讲台时，英语已经非常流利。1982年秋，他做了一场演讲：《是进一步开放，还是重新关门？——评有关中国吸收外资政策的几种议论》。他的雄辩说理，精辟阐释，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心。讲演结束后，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声音，一位台湾留美研究生挤到陈教授身旁，说道：“佩服，佩服，外国人给你鼓掌，而且鼓这么久，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有份，觉得很体面。”

哈佛“大权威”与厦大“小人物”的“前哨战”

陈安到哈佛讲学，缘于他与哈佛大学权威教授的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

1981年春，哈佛法学院柯恩教授来厦大访问。在一场座谈会上，柯恩教授批评道：“外国人来中国投资有顾虑，因为中国政府不尊重外国人的财产，会随便没收。”

尽管对方来自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又是全球知名的学术权威，还是哈佛法学院副院长，而陈安老师当时只是个副教授。但他根本没想到“身份”的差别，立刻展开了辩论，“我认为你说错话了。”

陈安当时只会讲点“蹩脚”英语，还好柯恩教授会一点中文。陈安就夹杂着中文，向柯恩教授详解中国法律：“在中国，任何外商，只要遵纪守法，不触犯刑法和海关法规，他的财产绝不会被没收。”

柯恩教授脸红了，他辩道：“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有可能将外国人的财产拿走呀！”陈安知道他讲的是“征收制度”。他反问道：“难道美国没有征收制度吗？”他引用美国的许多例子，反问柯恩教授：“美国人在美国本国都不能保证财产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被征收，何以到中国来就要求享受绝对不被征收的特权？”

美国人素来坚持“在真理面前没有权威”。柯恩教授对陈安老师产生了兴趣。座谈会一结束，他立刻走到陈安面前：“我打算邀请你到哈佛讲学，讲中国的法律，讲你的思想。”

陈安应道：“我必须讲我的观点。我除了会讲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外，还会讲美国在中国的不光彩历史。”柯恩教授直点头：“当然，你的知识，你的观点，对我们很有用。”

陈安又说：“但是，我没钱，我一分美元都没有。”柯恩教授很爽快：“你的费用我们全部承担。”

果然，四个月，柯恩教授就发函来了：“请你马上去办出国手续。”

一个英语“蹩脚”的中国教授，就这么传奇般来到哈佛大学，当了两年的高级访问学者兼讲学教授。随后又经多年刻苦钻研，成了一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研究的领头人。

权威教授鼓励学生不畏权威

陈安教授当年不畏惧权威。如今，他自己成为一个权威，依然鼓励他的学生不畏惧权威。

在陈安老师的课堂上，学生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话，发问或质疑。学生说对了，陈教授从善如流；学生讲得不对，他与学生平等地热烈辩驳。“其实，学生的挑战，确能帮助我深化思维。”陈安老师说。

陈教授对自己的文稿，也鼓励学生质疑。前天，有一个学生指出他的一篇文章初稿用语欠妥，陈安教授立刻进行核对，原来是自己漏删了部分句子，他对学生连连表示感谢。“你帮助我消灭了一个暗存的‘特务’，避免了我在读者面前出洋相。”

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领域，厦大已经在全国领先。而陈安教授又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端。

1946年进入厦大法律系，陈安教授成为厦大人已经60年。他曾是厦大法学院的前院长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自1993年至今，四度“连选连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

陈安教授的论著，颇具中国特色，影响全国乃至全球，国家商务部曾来函评价“陈安教授是新中国国





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国际法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安教授认为，他的成绩应该归功于整个国际经济法的团队。归功于敢于开展争鸣，不畏权威；勇于接受学生挑战，从善如流。

来源：厦门大学 <http://alumni.xmu.edu.cn>

环球法学

美国刑事诉讼一审程序

众所周知，美国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对抗式，法官和陪审团作为案件的裁决者，不主动调查证据，传唤证人及对证人询问，而处于一种消极、超然的地位，负责听取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所作的陈述，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各自的证人和证据向本方进行询问，并向对方证人作反驳性的询问，法官和陪审团分别就案件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承担司法裁判职能，以下将根据这些特点就美国的一审程序作一简要分析。

一、法庭审判正式开始前的程序

（一）罪状认否程序

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可以做出三种答辩：有罪答辩、无罪答辩和不予争辩的答辩。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经法官查明答辩系出于被告人自愿的，对于已经认罪的指控即不再进行正式审理，而直接进入判刑程序。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官应当确定开庭日期，准备正式审理。在正式的法庭审判开始前，法官需要就一系列的程序事项进行必要的准备，如对于控辩双方可能提出的排除某一证据、要求对方展示证据等方面的申请，法庭应尽可能在开庭之前解决。控、辩双方也需要做一系列准备工作，如调查走访证人、收集证据、开示证据等，有的准备工作可能还需要法院参与或者由法院就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裁定，如审前动议、审前会议等。

（二）挑选陪审员程序

在美国因被告人不认罪而需要进入正式审理程序的案件，通常由陪审团进行审理，除非被告人放弃陪审团审判，法院在第一审程序时必须召集陪审团。为了组成一个公正的陪审团，联邦和州的法律规定了两种程序机制：一是随机的初选程序。随机挑选的陪审员经过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必要的调查与反馈程序之后产生一份名单，书记官根据这个名单准备候任陪审团的名单，然后通知这些人到庭。二是严格的“庭选”程序。到庭的候任陪审员经法官告知案件的性质和双方律师对陪审员之后，必须在法庭上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能成为真正的陪审员。经过上述程序筛选后，候任陪审员的人数达到法定的陪审人数时，本案的陪审团就正式组成了。

二、法庭审判正式开始后（在这里，我将仅就陪审团组成后的法庭审判程序而言，大体上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一）开场陈述

这是指在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向法庭所作的第一次陈述，其陈述在各司法系统是一致的，即检察官先陈述，辩护律师后陈述。

检察官的开场陈述是为了告诉陪审团指控的性质、案件的发生经过，简述支持控诉的证据。目的使陪审团更好的了解案情。





辩护律师的开场陈述则说明主要的辩护要点,总的意图是使陪审团对控方的案件产生疑问,说明被告人无罪。辩护律师出于诉讼策略考虑,也可以放弃作开场陈述。在少数州,也允许辩护律师等到控方证人作证结束以后、辩方举证开始以前作开场陈述。

控辩双方做开场陈述时,应当清楚、简要地说明本方案件的基本立场,以明确下一步举证的方向。因此,双方所陈述的案情必须有相应的可采证据支持,所提到的证人和证词必须在庭审中兑现。不得涉及缺乏可采证据支持的事项以及被告人的性格、特征,也不得使用争论性或高度情绪化的语言。否则,法官可以应对方的异议或者依职权予以制止,并在必要时对陪审团提出相应的忠告。

（二）起诉方举证

在开场陈述之后,起诉方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以支持控诉,包括出示物证和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作证之前,应当宣誓或以其他方式保证如实回答提问。首先由起诉方进行直接询问,目的是使证人说出了了解的案件事实,展示证据。直接询问中不能提出诱导性的问题。

然后,由辩护律师发问,这称作交叉询问,其目的在于暴露证人作证的缺陷和不足,向陪审团揭示证人的不可信。在辩护律师交叉询问之后,起诉方还可以进行再直接询问,以重新聚集被交叉询问推翻的证据堆,恢复证人的可信性,澄清证人证词中的模糊之处。

辩护律师也可以再交叉询问,继续攻击证人证词的真实性以及证人本身的可信性,再直接询问和再交叉询问可以反复进行数轮,直到无可再问或没必要再问,但各管辖区均规定了再直接询问和再交叉询问的范围,限制进行再直接或再交叉询问的机会。在整个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期间,双方律师都必须遵守证据规则,如果触犯了一项证据规则,无论是询问的方式,还是证人回答问题的方式。反方都可能反对,陈述反对的理由,然后提问的律师可能简短地说明正当理由或以更详细地解释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或回答问题应该经法官允许。然后法官决定证据规则是否被触犯。

总之,交叉询问的规则相当复杂,其过程往往非常冗长,但美国诉讼法理论高度评价这套证据调查方式,认为它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最佳法律装置。

当起诉方出示了所有的证人和证言并认为这些证据已充分地证明罪行,起诉方就歇诉。审判到了这一阶段,被告方常规地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并没有出示支持罪行各个要件的证据。惟一的公正裁决只能是宣告无罪。一些情况下,若起诉方准备不充分,审判时潦草地出示证据或案件确实存在问题,直接动议裁决就被接受。结果被告人被宣判无罪而审判马上停止,然而,大多数案件,这个辩护动议如辩护方常规地提出动议那样,常规地受到拒绝,只有当辩护方申请没有得到法官批准时,庭审才进入辩方举证阶段。

（三）辩方举证

对辩护方传唤作证的证人,同样由辩护方和起诉方进行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刑诉中,被告人既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也不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因此,除非被告人希望作证。否则,不要求被告人在法庭上提供证言。

（四）总结辩论

证据调查之后,由控辩双方作总结辩论。起诉方首先作辩论发言,按照对己方最有利的观点,对证据进行总结和辩论,由辩护方作辩论发言,对起诉方的辩论发言作出问答,陈述于被告方有利的事实和理由,揭示对方举证中存在的矛盾和疑点,强调法律要求控方举证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才能给被告人定罪,否则应裁决无罪,起诉方在辩护答辩后可以就其中的争论点予以反驳,无论起诉方还是辩护方进行辩论发言,都不允许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发表个人的评断,根据双方的举证和辩论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控罪行,是陪审团的神圣职责和权利。

（五）法官指示陪审团

由于陪审员是法律的外行,在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主持庭审的法官要对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内容包括:陪审团的职责和义务;与案件有关的法律;由证据引起的争议;解释有关法律术语的确切含义。除此





之外,许多州授权法官对证据作出评论,但一些州却禁止这样做。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特别是辩护律师,还可以请求法官作出特定的指示,对此法官必须决定是采纳还是拒绝,或者作必要修改,甚至为此法官要召集进行非正式的磋商。

(六) 陪审团评议

在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由法官指定陪审团长或告知陪审团选出一名陪审团长和一名副团长,然后全体陪审员进入评议室进行评议,由陪审团长主持。陪审团评议秘密进行,内容保密,不准任何人进出评议室。而且不管评议结果如何,此后不能对评议活动进行法律调查。关于陪审员在审判期间或者评议期间是否需要集中住宿、与外界隔离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各地做法也不一。有的允许陪审员回家过夜或者度周末,许多州将此问题留给法官裁量决定。

(七) 陪审裁决

尽管陪审团的人数各司法系统不完全相同,但普遍要求必须一致裁决,只有路易斯安娜和俄勒冈两个州不要求一致裁决。如果经过长时间的评议,陪审团仍然不能得出一致结论时,法官可以宣布“误审”,解散该陪审团。对于这样的案件,检察官可以重新起诉,由法院另行召集陪审团重新审判。

陪审团就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作出裁决后,回到公开法庭,由陪审团长向法庭宣告裁决结果。如果是无罪裁决,法官必须接受,宣布将被告人当庭释放。如果裁决有罪,法官可以命令将被告人押回监狱或取保释放以等待课刑。至此,正式庭审过程就此结束。

来源: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 作者:韦成

法学名家讲坛

世界知识论坛:对话“当代福尔摩斯”李昌钰

时间:11月9日下午3:00

地点:世界知识出版社多功能厅

主持:沈国放

嘉宾:李昌钰博士



李昌钰 1938年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幼年丧父,随母举家赴台湾。1959年毕业于台湾中央警官学校,1965年放弃在台北警局与马来西亚某报社的职务,携夫人到美国留学,在纽约半工半读了10年,相继获纽约市立大学刑事科学系学士、纽约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受聘为康州纽黑文大学刑事科学助理教授,三年内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进而成为终身教授并出任刑事科学系主任。1979年出任康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1998年出任康州警政厅厅长,2000年从厅长职位上退休,继续主持康州刑侦工作。2001年受聘成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刑事科学技术实验室名誉主任、纽约州警政厅总顾问。震惊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肯尼迪暗杀案、克林顿性丑闻案、9.11事件后法医勘查……这些重大案件都经过他的手,而办这些案件也更彰显出他科学办案、明察秋毫的功底。

警察能够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吗?在李昌钰博士口述、邓洪博士撰写的《神探李昌钰》一书中,李博士自己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也回答了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很高兴能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今天我要讲的是：Sharing my life experience（分享我的人生经验）。我从警已经快48年了。我是哪一个地方出生的，有没有人知道？（有听众回答“江苏”）江苏哪个地方啊？（有听众回答“如皋”）如皋。谁说的？好，有奖！（笑声、掌声）我手上的这个警徽不是纯金的，是14K金的，但是在美国已经卖到39美元了，所以你们要好好留着。答对问题就有奖（扔警徽给听众，听众欢呼）。

我在如皋出生，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台湾。我父亲去世早，我母亲一个人抚养了我们13个兄弟姐妹，是很伟大的母亲。人家问我“最怕的人是谁”，我说“怕我妈妈”；别人问我“最尊敬的人是谁”，我也说“是我妈妈”。当时我们家境不好，念不起普通大学，我就去投考警官大学。（指着大屏幕上和同学合影的相片）哪一个是我啊？（有听众回答“比较帅的那个”）对！比较帅的那个。（笑声）谁讲的？（听众回答“我讲的”）哪个小姐说我帅的？有奖！（扔警徽，笑声）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对刑侦很有兴趣。我毕业的时候22岁，成了（台湾）最年轻的警官。我们破了很多案件。那时候我们怎么破案呢？没有指纹也没有DNA，就是把嫌犯抓起来，看看他招不招。要是没有人招，我们就把他们带到后面的房间，敲敲打打，每个人也就招了。后来我们知道，这样做不但残忍，而且很多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

1965年的时候，我和我太太两人去了美国，当时身上只有50美金。我很快发现，在纽约、在美国并不是满地黄金，美国其实到处都是垃圾。在美国要Opening the door（打开命运之门），只有两条路。第一，你出生的家庭姓洛克菲勒或者肯尼迪。第二就是好好用功。我不姓洛克菲勒，也不姓肯尼迪，我只好好好用功。大家看看这张相片。那时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工作，半夜了我还在做研究。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一边念书，一边工作，周末还要在餐馆端盘子。钱还是不够，就去教功夫。因为我在警官大学毕业，学过功夫。美国人最好骗，扎一根黑带子，装个样子，他就吓坏了。（笑声）看这一张照片，半夜我还在打报告，用的是一个玩具打字机，当时是19美元买的，很多年后这个打字机被人收藏去了，大概三年前拍卖了4000美元。我太太说我真是傻瓜，我问为什么，她说你那时就该买一百架打字机，现在4000美元卖了我们不就赚很多钱了吗？（笑声）

我总算要毕业了，但是在美国什么东西都要花钱。连自己的Commencement（毕业典礼）都要交钱。我没有钱，所以只好在家里毕业，自己照相留念。（笑声、掌声）我当时念书很快，从硕士毕业到博士毕业只念了一年，破了学校的记录。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是我当时的导师，也是我的领导，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十年，当他的研究助理。毕业以后，我就到康州（康涅狄格州）纽海文大学做助理教授。（指着相片）这是我第一届毕业的学生，现在他们俩都是世界上著名的鉴识家，都成为中心主任了。看我那时候多年轻，很帅是吧？

很快地，在三年之内，我成为终身教授和系主任，也打破了学校的记录。有一天，大概是1979年，康州州长打电话请我吃午饭。去了以后州长告诉我，康州的警政制度也是主要靠刑讯，抓了犯人就打，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很多案件变成悬案、冤案。所以州长希望我当州警政厅第一任鉴识中心主任。当时我在纽海文大学，年薪已经是35000美元，那时已经是很多了。我起先是不想去的，但那时候没有一个中国人当行政主任，所以我妈妈说“你就得替中国人争口气，钱少一点没关系，去做”。我回去跟太太说“好消息，从今天开始你应该叫我主任啦”。太太问我薪水拿多少钱啊，大家猜多少钱啊？一万九。所以我太太就说“算啦，还是去教书，你不要去做主任啦”。但我还是去了。人的运气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坚守理想。不要老是想靠着运气。一定要有理想，永远不要说“不”，要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你才能成功。中国有个成语叫“知难而退”，假如每个人都退，那世界永远不会有今天了，是不是？所以当时我知道鉴识中心条件很差，我们就有一个理想，希望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中心，几年之后就落成了。现在我们的鉴识中心已经世界知名。有记者报道说这件事情背后是有一个人的，就是我，在推动，

但我认为真正成功一定要有一个 team (团队),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做成的。我很幸运, 在我的鉴识中心有很多优秀的高级化验员和我一起工作。每次到现场, 都有很多优秀的刑侦人员和我一起工作。

虽然我后来当过警政厅长, 但我一生对做官最没有兴趣了。我喜欢在实验室、在现场工作。1997年, 康州新任州长希望我当警政厅长, 我不愿意。但是州长很聪明, 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妈。(笑声) 那天我回家看到我妈妈很不开心, 就问她为什么。我妈妈就说: “人家看得起你, 你就要好好做。” 我说: “您知道他让我做什么啊?” “当然知道, 中国人有哪一个当厅长的, 美国虽然是个平等的社会, 但是有个 Glass City, 看不见的玻璃之城, 有色人种再怎么优秀, 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上不去了。所以我们打破这个 Glass City 是很重要的。” 当时我是鉴识中心主任, 1997年的年薪是一年 15 万美元, 你们知道厅长一年拿多少钱吗? 我回家告诉太太: “好消息, 现在我变成州里的最高警官啦。” “那拿多少钱啊?” “七万五。” 当然我还是很幸运, 有很多优秀的警官跟我一起工作。

但做了两任之后, 我实在不想做了, 我很想做第一线的工作。我就跟州长说: “你给我的 20 个 projects (计划), 我通通完成了。前面 11 个警政厅长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也完成了。现在你可以让我回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吧?” 他说当然不勉强, 但一定要选一个继任人。我选谁呢? 美国的警政厅长通常都是白人, 又高又大, 200 磅以上, 我是最矮的警政厅长。我选的继任人是一个地方法院院长, 他比我矮。(笑声) 所以在康州历史上我不是最矮的警政厅长(笑声)。

我不当警政厅长, 回去当鉴识中心主任, 薪水变成一年 18 万美元, 更多一点了。我就想要退休, 没想到中央政府和很多地方政府说, 李博士, 我们请你来, 每年给 20 万、25 万、30 万, 行不行? 搞得我好像股票, 价格越来越高。州长很聪明, 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妈。(笑声) 听说我要走了, 我妈妈就说: “走了干什么? 留在这里。” 所以现在我退休了三次, 还是留在康州, 是惟一在康州替六任州长做过事, 一直没有退休的人。现在我给大家讲我成功的秘诀:

第一, 你要确立人生的目标。每一行每一业都需要很多优秀的人才, 今天我很高兴, 因为来了很多年轻的同学听我的演讲。你们在成长的时候应该想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要走外交路线, 还是走科技路线, 还是跟着别人去做生意。不管是什么, 都要定一个目标。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不会觉得枯燥, 别人逼你做的事, 做了心里也不痛快。我一天工作至少 16~18 个小时, 人家问我累不累, 我说不累, 很高兴。很多人看我一天到晚笑嘻嘻, 就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心情愉快。心情怎么才能愉快呢? 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再累也不会觉着累。

第二, 人要有强烈的欲望, 期望自己能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不要以金钱作为自己的宗旨, 否则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而且会非常痛苦, 因为总有人会比你富有, 总有别人的公司比你的大。人生下来就不带一毛钱, 走的时候也带不走啊, 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常常有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死了后, 我们去调查, 棺材还没有盖上, 儿子女儿就已经雇杀手、请律师, 每个都在争, 老爸死在那里没人问。社会的犯罪根源就是一个“钱”字。很可惜, 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越来越差。

第三, 要运用潜在的意识, 建立合理的判断, 不断进行自我改进。更重要的是有效利用时间。我们一个人一年有多少小时啊? 3285 个小时。不管你是总书记还是在街上拉车的, 不管你是校长、教授还是学生, 时间都是一样的。你能不能向你的朋友说: “哎呀, 我的时间实在没有了, 你能不能借我两个小时?” 你能不能把时间放到银行里面, 明天拿点利息? 你今天没有用完, 想明天用, 可不可能? 都不可能。所以时间很重要, 应该努力利用。我这个人坐飞机、上厕所都在看书。

通常一个案件的侦查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是现场保全, 第二是收集物证, 第三是检验物证, 第四是找寻疑犯, 第五是动机分析, 最后是抓人起诉。这几个步骤是分工合作的, 并不像电影里面, 一位大明星从头做到尾。社会大众有时候不了解, 认为我们是警察, 也是现场人员, 也是检验人员, 也是去抓人的, 也是法官。

我一生处理了很多案件, 在世界各国处理了大概 7000~8000 件案件, 有很多案件都涉及名人。

除了有钱的案件,很多重大的政治案件常常变成世界命案,比如肯尼迪遇刺案件。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吃过午饭,做过演讲后,坐车回去,路边一幢房子的六楼窗口,有人“砰”地开了一枪。凶手被抓了,但是现场没有处理好,验尸的时候没有发现到底是一枪还是两枪,到底是一个杀手还是两个杀手。这个问题43年了还没有搞清楚。1998年国会通过一个特别法案,邀请我去做咨询顾问,重新调查。但是因为当时现场没有弄好,现在即使用最新的科技也没有办法重新调查了。

再看看这个案件。Vincent W. Foster 是克林顿总统最亲近的顾问和老同学,权势极大。1996年有一天,他的尸体在公园里被发现,嘴里被打了一枪。那时候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是谋杀,有人说是自杀,还有人说他与希拉里有一手,总统正好经过,听到声音,拿了特警人员的枪,打死了他的好友,又把尸体抬到公园去。国会成立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写信给我说:“李博士,能不能帮帮忙?”我答应了。后来重新调查,去了现场很多次,终于证明这是一个自杀的案件。

你们看这些照片——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在工作,其他人在袖手旁观。(笑声)为什么我还要亲自工作?很多领导是坐在办公室开开会、喝喝茶就行了,但是我必须亲临现场,因为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一定要自己看过证据,那才是证据。

这个案件(指着图片)发生在瑞士。瑞士很少有凶杀案,但这次有一个大学女生在宿舍里被谋杀了。那边的警察局长赶快打电话给我:“李博士,能不能来欧洲帮帮忙?”我说:“很忙,很忙,没有时间,欧洲很多专家,请他们。”他说:“一定要请您。”我说:“美国也有很多专家,请他们。”他还是说:“一定要请您。”我说:“没有时间。”他说:“那我们等你。”我说:“那至少等一个月。”“这尸体还在现场,能不能马上来啊?”(笑声)“不行,不行。”结果一回家,我看到太太在收拾行李,我就问她:“你收拾行李干嘛?”她说瑞士的警察局长请她去瑞士度周末,免费吃巧克力。(笑声)结果怎么样?我只好跟着去了。(笑声)

一到现场,(指着图片)大家看到没有,尸体大腿上有三滴血,这些血叫做垂直型滴血。人死在地上,她的血不可能从上面滴下来。那这些血是谁的?是嫌犯的。但是很多时候,由于法医没有受过训练,到了现场马上就把尸体翻过来。我问他:“翻尸体干什么?”他说:“我看看她的脸。”“人死了也不会爬起来跑掉,你急着翻尸体干什么?”(笑声)“我要看看前面有没有伤口。”我说:“等到了验尸中心再看也不迟啊。”假如尸体一翻,这三滴血就找不着了。尸体翻完后再放到尸包里面,脸朝上,这三滴血还是看不到。到了验尸中心要用水冲洗尸体,这三滴血不就没了?

几十年来,每个地方都翻尸体,我问他们翻尸体干什么,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答案。直到前几年,英国苏格兰场请我去演讲,我还问过这个问题。鉴识科学或者说法医学是从哪里起源的?(有听众回答:“中国。”“《洗冤录》。”)对,《洗冤录》是全世界第一本法医书。领奖!(抛过去奖品)但是现代的法医起源于英国。英国伦敦的法医 Peter 是我的好朋友,我问他:“Peter,为什么你们一到现场就要把尸体翻过去?”他回答不出来。英国人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就老是说一个词:tradition(传统)。传统教我这么做,就是说老师教我这么做,老师的老师也教他这么做,所以大家都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法医都是殡仪馆老板,他们需要给死人化妆,让死人看起来好看一点。假如脸向下,脸上就会出现尸斑,这样化妆后还是很难看。第二天朋友家属去告别式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怎么这么难看?”殡仪馆的老板就没有生意了。所以他们一到现场,就会把尸体翻过去,这样尸斑就到下面去了,脸上就好看一点。没有科学的原因,也没有科学的原则。所以做鉴识科学,好的传统要继续,不好的传统一定要改。通过这三滴血,我们找到DNA,通过资料库搜寻这个DNA,17分钟就破案了。

(指图片)这个案件发生在东欧。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打内战,死了很多人,出现了万人冢。联合国、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合作,要鉴定这些死者的身份。我们有五个人去了。指挥官领我们到万人冢,告诉我们说这些尸体都和手榴弹、地雷埋在一起。我们本来是四个白人和一个中国人,一听这话,变成五个白人了——脸都吓白了。(笑声)每个人都看着我:“李博士,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挖挖挖!”但是很危险啊,挖错可就牺牲了。沈大使,那今天你就得请别人来演讲了。(笑声)跟我一起去的有个麦克



博士，他是纽约市的一个法医官，有 280 磅，是我的老朋友。他当时说：“博士是现场之王，大家听博士的，博士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就告诉他：“麦克，你太重啦，要是走错一步，踩到地雷，我们都完了。”（笑声）我叫他赶快坐下，他说“对对对”，马上坐下了。（笑声）两分钟后我叫他到旁边去坐，他就起来了，坐到旁边去，我就开始挖他刚刚坐过的地方。（笑声、掌声）我又让他再一次坐到旁边去，我继续挖他刚才坐过的地方。七八次以后，他说：“你在干什么啊？”我说：“280 磅，坐下去站起来都没事，说明什么？很安全嘛！”（笑声、掌声）他说中国人真聪明，我说我是中国人里面最笨的一个。（掌声）

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大家都知道吧？那年 1 月 22 日。通常我早上五点多就上班了，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都不接电话。这一天秘书告诉我：“博士，华盛顿有请。”我说：“告诉他们，很忙。”5 分钟后，他说：“国会有请。”我说：“国会？还是很忙。只有我妈妈的电话我接，连太太电话都不接。”秘书说：“不是你妈妈，国家需要你。”我说：“为什么不早点讲啊？”我拿起电话就问：“国家需要我干什么？”（笑声）“请博士到华盛顿来一下，有件案子想请博士看一看。”我问是什么案件，对方说：“不能讲的案件。”我再问：“是什么不能讲的案件？”对方回答：“不能讨论的案件。”我还以为是国家机密，不能讨论，华盛顿也没有人知道。结果到了华盛顿一下飞机，七八个记者拿着摄影机在那里等着。一看到我，他们都大喊“李博士”。我说：“我不是李博士，我是邓洪，从洛杉矶来的。”（笑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是李博士。”第二天，报纸上就登了这幅漫画，（演示漫画）画的是李博士在白宫的地毯上找证据。这像不像我啊？我长得这么难看吗？（笑声）后来我就去白宫了。（指着图片）这件衣服上就是克林顿的精斑。你看，多好啊，做鉴识科学家还可以去白宫逛逛。有几个人能见到美国总统的精斑啊？（笑声）

很多人说我是生活艺术大师，问我为什么可以这样。我说：工作中找乐趣，劳动中找闲情，信仰中找真爱，身心和谐，寓教于乐。很多外国杂志、中国杂志都拿我做封面，很多电视也做我的节目。很多人叫我现场之王，甚至有叫我包青天、福尔摩斯的。我从警 40 多年，得了很多奖，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很多人都说我是 The Glory of Chinese American（美籍华裔的荣耀）。这些奖章有些是真金的，有些是假金的，这个是祖国颁发给我的外国专家奖，是真金的，我因为做过鉴识科学，很快就验出来。（笑声、掌声）最“差”的是印度，请我去演讲，说是给我最高的奖，去了以后给了我一个纸牌（演示图片——其实是个参会者的身份卡），大家说是不是很不好看？（笑声、掌声）

（生活艺术大师？太太未必这样看吧？可惜演讲时太太并不在场，没法问。李博士的太太宋妙娟是马来西亚长大的华侨女子，1961 年在台北求学时，有一次到台北警察局办理签证手续，办事的警察就是李昌钰，由此开始了他们令人羡慕的爱情。李博士通常每天工作都在 15~20 小时左右。早上 5 点钟起床，先阅读一些法庭及相关科学文献，6 时上班。下午 5 点下班后，开始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晚上还要赶去大学讲课。多年来，李博士一直坚持早睡早起的习惯。李昌钰说，要想成功必须充分利用时间。李昌钰吃饭很快，太太说他像个吸尘器，坐下来三分钟就把饭“吸”完走了。他睡觉也比别人少一半时间。）

人的一生其实并不长，我一辈子也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热烈的掌声）人一定要有一个 Team Work，要有一个团队和你一起工作。我很幸运，我太太和我结婚 43 年，是很好的伴侣。最后，我要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勉语：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进步，要在艰苦中见其光辉；人生要在和谐中求发展，要在努力中见其希望；人生要在安定中求付出，要在锻炼之中见其庄严；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要在活跃中见其弘愿。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成功！谢谢大家！

来源：新华网- 世界知识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sjzs>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6 年 12 月

第 7 期[总第七期]

本期要目

-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切实促进教育公平
- 大学生就业难：是观念陈旧还是制度缺失？
-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历史流变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切实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部部长 周济

教育动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摆在突出位置，提出了新形势下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和重大举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深化教育改革，实现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一、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普遍提高的社会。教育是培养人的崇高事业，在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通过加快教育发展，切实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

促进教育公平，保障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教育公平是

人发展起点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历来被看作是人们发展提高、缩小社会差别的重要手段。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公益性原则，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对保障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教育发展，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进程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是把我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教育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得到切实巩固和提高，农村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加快；高等教育实现了又快又好发展，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成为人力资源大国。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的教育发展仍不能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良好教育的强烈需求,还不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城乡、区域、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实施素质教育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深化,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需要提高,一些关系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教育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全局,加快教育发展和改革,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们对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强调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把我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教育发展的基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认真贯彻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努力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高质量高水平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强化政府保障责任,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在农村并逐步在城市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国家制定义务教育办学基本标准和质量标准,政府统筹资源配置,确保每一所学校都能达到基本标准,配有合格教师和校长,成为合格学校。全面扫除青壮年文盲,重视特殊教育,积极发展学前教育,稳步发展普通高中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努力使劳动者人人有知识、个个有技能。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

导向,转变办学思想,深化教学改革,增强主动为经济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加大政府的投入和统筹力度,加强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切实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推动东西部合作和城乡合作办学,促进农村普、职、成“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

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保持高等院校招生合理增长,注重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创业能力。把提高质量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重点,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加快创新型人才培养。推动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建设、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紧密结合,提升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继续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繁荣和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加强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

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为依托,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重要手段,统筹全社会各种学习资源,建设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实现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与继续教育相互衔接,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有组织学习与自主学习相互补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环境和氛围,使我国成为人人皆学之邦。

建立健全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机制和制度。提高对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教育投入,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要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全社





会进一步关心支持教育,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共同发展教育事业。

推进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通过教育体制与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创新,增强教育发展的活力。改进管理教育的方式,努力提高教育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理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全社会参与和支持教育的新体制,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形成政府办学为主、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形成公平、公正的教育法律制度环境,重视保障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

三、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在教育培养目标上,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其基本内涵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面向全体学生,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我们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工作的主题,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抓住关键环节,实现重点突破。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提高师生思想道德素质。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公民道德教育为基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增强学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改进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增强针

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形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品质。倡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实践观点。加强班主任和辅导员工作,建设高素质德育工作者队伍。

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重视基础知识的扎实掌握,强调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着力于分析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倡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应继续加以发扬。同时要更新教育观念,不断改进培养模式和教学的内容、方法,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倡导启发式教学和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新知,养成勤奋学习、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把加强体育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强健学生体魄,全面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保证学校具有基本的体育设施,确保学生每天有一小时体育锻炼活动。

提高师资特别是农村师资水平。教师是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担任教师,建设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加快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把师德建设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强化教师的思想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倡导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职业精神,培养大批既有学识魅力、又有人格魅力的人民教师。注重培养选拔具有先进教育理念、较强管理能力、德才兼备的校长,造就一批教育家。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推进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把实施素质教育贯穿于教学工作全过程。以工学结合为重点深化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改革,重视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培养。





深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教学改革。把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作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坚持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实行就近免试入学制度,实施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高中招生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立多样化的学生选拔机制。改革完善研究生招生选拔方式,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融合,形成全社会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实施素质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要完善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措施,学校要承担起实施素质教育的主体作用,社区要发挥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家庭教育更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关键是各方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各方面都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正确的教育质量观,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和考试分数的倾向,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改革社会用人制度,改变过于偏重学历文凭的观念,注重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建立有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的机制和社会氛围。

四、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长期以来,教育在缩小城乡、区域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群体受教育的机会存在着较大差别。促进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决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把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摆到我国教育政策的重要位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教育公平,是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历史过程,我们将为此不懈努力。

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坚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国家财政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

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建立遍布乡村学校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形成面向全国农村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统筹区域教育,实现各地区教育协调发展。加快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步伐,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支持,大力推进东部对西部、城市对农村的教育对口支援以及职业教育的对口协作,积极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努力缩短东、中、西部的教育差距。统筹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认真解决中小学择校问题。加大对农村和城镇薄弱学校的改造力度,不断改善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努力办好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一所学校,缩小学校间的差距。大力促进区域内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办学质量。

健全教育资助制度和助学体系。继续做好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使公办学校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学习机会。义务教育阶段要进一步推进“两免一补”政策,全面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非义务教育阶段要完善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鼓励社会捐资助学。健全公办高校入学“绿色通道”制度,扩大国家教育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政策覆盖范围,建立和完善勤工助学机制,建立和完善大学毕业生到国家需要的艰苦地区、艰苦行业工作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机制。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保障女童和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规范管理,从严治教。大力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建立健全有教育系统特点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规范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坚决制止教育乱收费。依法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发扬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加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继续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实现招生公





开、透明、公平、公正。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建设和谐校园。努力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文明,创造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认真化解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维护学校稳定。加强安全教育,增强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建立安全机制,切实做好校园安全保卫工作、卫生管理工作。加强学校内部管理,推进校风、学风

和制度建设。以人为本,爱护学生,关心教职员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努力建设平安校园、健康校园、文明校园,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让学生放心,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放心。

来源: 教育部网站 2006-12-1

大学生就业难: 是观念陈旧还是制度缺失?

现在大学生的培养并不是总量过剩的问题,不管是从发达国家还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验看,我国大学生总量并不多。更进一步说,大学生就业难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社会相关制度结构性缺陷所致。

大学生“就业难”本已成为牵动社会公众神经的敏感议题,近日教育部发言人就名校生养猪发表的“媒体转变观念说”和“原创性说”,更加引发媒体和公众的深评热议。

首先要厘清三层次概念:一是大学生整体就业难还是个别大学生就业难?二是为什么名校生非要去养猪卖肉或陪聊,而不从事其他更需要专业训练的工作?三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目前,不管是教育部发言人对媒体的呼吁,还是媒体和公众的激烈反应,多少有点让人感到过于感性,或者说诘问错了对象,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性分析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制度性缺陷和深层结构性矛盾。

个别名校大学生养猪卖肉既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该校学生就业的整体状况,更不能反映目前高校毕业生的总体就业水平,就像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劳动力总会存在失业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谁也不能保证每个大学生如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分配就业,或者一定找到“体面”的工作。个别学生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体面工作“秀一把”其实没有什么,但如果社会对待该事太当真或无限放大那就大有问题了。

我们认为,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分析,社会和家庭花费了大量资源培养一位(名校)大学生,却从事并不需要更多专业训练的养猪(如果从事养猪研究或开发养猪技术那就另当别论了),除非它能带来高额回报,否则怎么都想不出来它的“正外部性”体现在哪里。如果他寻找的是比原来预期稍差的单位再通过工作中努力达到满意的职位会如何?如果真有能力 and 毅力考研后再就业又会如何?如果他不是去养猪而是从事养猪业的市场分析又如何?我们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源力争建立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希望培养相关领域的“精英”,即使出现极少数养猪卖肉的人们也会理解,但将养猪卖肉当作是很“原创性”的工作,还要人们转变就业观念,不知那些纳税人会怎么想。

现在大学生的培养并不是总量过剩的问题,不管是从发达国家还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验看,我国大学生总量并不多。更进一步说,大学生就业难不仅是观念问题,更是社会相关





制度结构性缺陷所致。实际上,大学生就业问题更多的是劳动就业部门或劳动力市场作用的领域,大学教育其实只是整个人力资源开发系统的一个环节,从一般意义来说,教育部门只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就业需要提供合格的产品——毕业生,而不是包办大学生的供—产—销全过程。

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教育部门应摆正自己的位置,更多地关心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如果学生不能达到培养要求而出现就业总量或结构性问题,则应该从教育是否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教育本身人才培养层次和结构进行反思,从精英教育—专才教育—技能教育的分工体系是否合理进行反思,从专业结构设置与就业结构相关性上进行反思,从与劳动就业部门联动建立大学生的就业预测和预警机制上进行反思,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过程必经的阵痛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供求脱节进行反思。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热炒,而是冷静的思考和积极的办法。解决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还是应该从大学生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着力。一方面是改善大学生供给的质量和结构,另一方面是增加对大学生的就业需求,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使产业升级,提供更多适合于大学生的就业岗位,才能减少名校学生去养猪卖肉现象,提高全社会人才的整体效能。

来源:羊城晚报 2006-12-5

西北民大首推学业预警制度 不合格将被警示三次

郭 涛

“大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发生学业不合格等问题时将会被紧急提示或预先告知并通知家长,警示学生学习状态。”西北民族大学近日出台《本(专)科学生学业预警制度的暂行办法》。据悉,这种制度在省内高校中尚属首例。

学业不合格 将被警示三次

据悉,该办法由该校教务处负责对该学年所修读总课程(或学分)二分之一的同学提出警示,而警示分为期初预警、期中预警和期末预警三个阶段。

期初预警,即每学期开学两周内,各学院应将上一学期不及格课程门数(学分数)达三分之一(含)以上的学生名单通知其班主任(导师)及任课老师,班主任(导师)、任课教师应及时加强对学生的督促和辅导。

期中预警为期中统考后三周内,各学院应将学生期中考试成绩交各班班主任(导师),对不及格课程门数达二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学院应对学生提出警示。

而每学期期末考试后,学院应及时将本学期成绩通知学生家长;学校对本学期不及格课程(或学分)累计超过所修读课程(或学分)二分之一的学生向家长提出期末预警,并请家长配合学校督促学生认真对待功课和学业。

校方:决不让学掉队

“一些学生平时挂科没在意,到最后‘小病成大病’,因红灯过多而面临退学。实行学业管理预警,对被预警的学生要从各方面进行帮助,加强‘爱心、信心、耐心’的教育,激



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促使他们朝好的方向发展,尽量使被预警的学生在学习上不掉队。”该校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在介绍这一制度的出台初衷时如是说。

学生:预警制度很人性化

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西北民族大学语言文化传播学院的一名史姓同学说:“以前吧,学生学习成绩怎么样,家长也不知道,即使有不合格的课程,自己也不太重视。这个办法出台后,首先对于学生自己来说,在接到警示后,自己就有心理压力了,这样才能更好地去改正。同时,对于那些有困难的同学,老师进行帮扶的行为也很人性化。”

来源:西部商报 2006-12-5



一、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就业只是教育的副产品

由于目前就业形势的严峻,一些人觉得上大学得不偿失,后悔上大学。也有人认为教育到了功利化时代,如果穷人“不为功利上大学”,是不是有点残忍?由就业问题,人们自然延伸到一个根本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由于各人的话语背景不同,对教育目的的看法也各有侧重。当我们面对青少年的不良品行时,我们自然要求教育培养合格的公民(参见2005年6月24日工人日报评论《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养合格公民》);当我们面对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时,我们要求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适合市场需要的就业能力。当然前者的论述偏向于基础教育,后者更着眼于高等教育。

除了根据现实问题思考教育目的外,人们自然也从以往一些教育家的论述中寻求答

案,例如最近新华网转载的发表在河南日报上的评论《什么是教育最终的目的》中就引用了一些教育家的观点(以下称“郭文”)。郭文的立意是正确的,但为了避免对其中所引用的观点所产生的误解,特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补充和澄清。

由于教育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论述,都有相互矛盾的方面,这就需要我们注意教育家提出某一观点时的具体背景,辩证地看待教育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罗列到一处,可能会使实践者无所适从,甚而至于带来一些误解。而且,我们有必要把教育目的划分为国家的、宏观的和个人的、微观的,宏观的目的具有全局的指导意义,所以对它的表述应尽量全面一些(如“德智体全面发展”之类),微观的、个人的目的可能要实用、功利化一点,例如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学生,其个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脱离农村、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将来能就业自不待说,但用这些话语去概括国家的教育目的,显然不妥(尽管我们的教育要为满足这样的个人目的服务)。如果我们不从层次上加以区分,笼统地说“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学生就业”,就会貌似合理,实则危害教育本身。因为我们要探究教育的“最终目的”,而不是各类学校各类专业培养的具体目标。笔者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促进个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中,社会的



和谐发展不仅是通过个人的和谐发展来实现的，它又为人的和谐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至于就业目标，虽然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迫切解决，但不能成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它只是教育的副产品。

二、目的的实现需要职业（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有机结合

教育的最终目的确定了，并不等于目的实现中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我们不妨先从郭文中的观点说起：要解决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学校要考虑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需要培养学生实用的能力。于是斯宾塞的教育观点在此是有用的。郭文中又提到另一种观点，“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制造社会工程的“零件”；大学是提供精神资源的地方，而不是训练技能的场所”。学校“忽视德育教育及品格塑造的倾向，使得教育严重背离了当初的目的。”看来只注重实用技能的培养，是要把人变成机器零件。这也就是马克思当年反对的机器生产对人的异化。那么，学校教育要为就业作准备而变得实用呢？还是要为人性的完善着力呢？这是教育要考虑的两个重要目的，也是人们认识和实践往往产生冲突的地方。

目的的实现需要通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来实现。人格的完善需要人文教育，需要“德育及品格塑造”。在高校不时也会刮过一阵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倡导通识教育的旋风。但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在功利性的市场竞争中可能会遭遇尴尬，学生、学校都会迎合市场的需要而学习，为将来的生存而选择实用的易于混饭吃的学科。学生会舍弃自己的天性所好，学校会舍弃人文学科而注重经济、实用技术等跟市场接近的学科。而这正好违背了人格的全面发展、人性的完善这一教育目的，正好违背了郭文中所引的教育家的主张。迎合市场也是有风险的。有时候市场是无情的，当你预计社会将需要更

多的经济管理类人才时，众多院校纷纷上马的此类专业很快使此类人才饱和。有人说是数量太多了，有人说是质量出了问题。在过分追求就业率的要求下，一些高校为所谓的就业率造假，也是被逼无奈。

看来大学要在把人培养得全面一些的同时，又要使学生具备就业能力。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人文和实用结合，如何使品德健全而又有实际的就业能力？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在有些人看来，恐怕要把大学或者变成实用专科学校，或者变成空谈务虚的场所。

现实问题会向我们既有的理念和教育模式提出挑战。我们认识到大学生的“精神成人”的重要性，试图防止跟马家爵类似的大学生的出现。但是，在我们让学生去探究某些高深的学问和学会充满人文情怀的同时，大学生突然意识到这些并不能帮助他们谋到一个饭碗。这委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以将来的严峻事实来看眼前的课堂，恐怕大学生再也难以静心坐在那里去思考、陶冶什么“人类的灵魂”。在做人和做事之间，做人是首要的事情，人首先是人。但是准备好了做人而又无事可做，做人的标准也难以维持下去。有事可做而没有更好的能力或对事业本身更好的理解，不能从普遍的人性去理解所作的事情，就不能乐于所从事的职业。这也是我对教育（职业教育）要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所作的理解。

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专事于某一职业技能学习或自然学科探究的人，其品行发展反而显得和谐，是他的思想认识达到一定高度，还是他无暇去考虑、实践那些非份之想？我们不得而知。相反，只有人文理论的空谈而不能专事于一实际事务者，倒因思想浮躁而显出一些品行不端来。脱离了某一职业（或用更高尚的词“志业”）的单纯的人文教育或品行教育也很难达到其理想的效果。可见，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也有相通的方面，处理得好，可能相得益彰，所谓“职



业是文化之根；文化乃职业之果”。人类知识所分化出的各种学科本来都是为人类自身服务的，偏向一隅会给人类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单纯从发展经济（提高 GDP）来考虑问题，就会给环境以致命的破坏。推进科学技术而不考虑它们用于何处，就会毁灭人类自身。这一问题存在主义学者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有深刻的论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要“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

就就业来说，没有专精的技能难以就业，但有时过分狭隘的专业学习又不能保证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所以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就业问题除了教育结构不合理外，还有许多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在里面，不能因就业问题就影响到教育促进人和社会和谐发展这一最终目的。

当然，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院校中的大部分恐怕要承担职业教育的重任，非此举不足以解决就业问题。于是在做人做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工程技术）的冲突与和谐问题将会继续成为有关高等教育目的争论中的热点问题。看来我们不得不走中庸之道，问题是这中庸之道如何走？有待各位继续探讨，也期望高校有相对和谐的实践出来。

来源：光明观察刊 2006-12-4

10 所高校来了千余“洪战辉”

贫困生签下“诚信助学贷款协议书”，并表示将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学业。

“终于可以凭自己的劳动而不是纯粹依赖好心人的救助完成自己的学业了。”昨日，来自甘肃酒泉的中南大学 2006 级文学院特困学生段德虎高兴地说。他是首位获得“长沙大学生勤工俭学诚信助学贷款”的学生。生活费无着落的他，昨日获得了一个勤工俭学的岗位，并将通过勤工俭学还贷。

今日是国际志愿者日。昨日，由团市委主办，长沙市青基会和长沙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创建的长沙大学生勤工俭学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来自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商学院等 10 所高校的 1000 余名同学成为协会首批志愿者。他们将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经济困难，同时还将拿出一部分勤工俭学获得的薪酬捐赠给“长沙大学生勤工俭学自强互助基金”，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孤儿彭赛因家境贫寒曾一度辍学，去了一家包子店当学徒，在学习和面、蒸包子的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梦想，一有空就扎入书堆，终于，彭赛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昨日，彭赛饱含深情地告诉记者：“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而不是受他人的馈赠，我活得更充实。”

据悉，昨日有 6 家单位成为长沙大学生勤工俭学爱心基地，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了 100 多个营销、策划等勤工俭学岗位。为保障贫困学子的合法权益，协会还为参加勤工俭学的大学生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并聘请了法律顾问。团市委书记邱继兴表示，长沙大学生勤工俭学



志愿者协会就是要突破公益慈善事业传统的筹资捐赠救助模式,创新发展出具有“造血”功能的管道式爱心互助模式,培养贫困受助学生自强自立、爱心奉献的高尚品德。昨日,中国男孩洪战辉也来到同学们当中,出任长沙大学生勤工俭学志愿者协会的名誉会长,并勉励所有贫困学生和他一起行动起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明天。

来源:长沙晚报 2006-12-5

把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

薛 涌

最近有报道说,温家宝总理召集有关专家座谈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已经被列入中南海的议事日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计划投入140亿元发展职业教育。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远远不够。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迅速进行战略转型,把重心转移到建设一流的职业学院。

现在,我国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使大学之间难以平等竞争。同时,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就业率仅百分之七十几,不仅比不上美国等发达国家95%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甚至比不上国内一些地区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我们的大学战略目前还不太适合中国的经济结构。我曾经指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生比例高,主要是因为人家是白领经济,制造业外流,服务业高科技崛起,需要的是坐办公室的劳工。中国如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典型的蓝领经济,需要的是技术工人。

而如今,一些大学盲目升级:普通的本科生学院大建研究生院;中专大专院校争先恐后地改成大学。结果,学生毕业出来,没有足够的白领工作,工厂却找不到熟练的技术工人。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办高等教育,使一些大学为了争夺国家拨款,把心思用在学校的“外装修”上,比如请明星教授,建博士点等等,为的是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显示出自己的重要,很少考虑学生的就业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把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建设一流的职业学院呢?我们不妨从一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谈起。有些人谈到美国模式,说高等教育的实力就体现在研究性大学上。不错,美国大学生在人口比例中甚高。不过,人们很少注意到,美国的大学生,有45%在社区学院就读。这种社区学院,基本上是两年制,最多授予副学士,和我们的技校、大专非常接近,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

美国的制造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左右,有将近80%是白领占优的服务业,却有大量培养技工的社区学院。布什政府在面临制造业外流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时,一个重要的应对之策就是加大对社区学院的投入,使失业的工人能够得到重新培训。





中国的服务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几，低于由蓝领所构成的制造业。面对这样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就业市场，中国的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至少要占大学生的60%以上。而如今的情况，则是大学生遍地，高级技工严重短缺，造成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浪费。

近年来，政府的教育投资，当属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长最快。根据我所找到的数据，2002年国家对于大学投入高达733亿元。这些钱基本都花在四年制的大学上了。相比之下，“十一五”期间给职业教育的140亿按年平均下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的拨款比例，恰恰说明了职业教育的极度弱势地位，必须及时改变。

中国未来几年高等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把进城的几亿农民工训练成世界最优秀的产业工人。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完成这一使命，就要靠职业教育。因此，政府应该有一套长远战略，将部分大学解散重组，使之转化为两年制的职业学院，形成中国的社区学院体系。这样，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教育成本，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也使高等教育更适合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学生毕业后迅速就业。

来源：新京报 2006-12-5

江西高校首现“菜单式给予”素质教学

蔡福津 李东生

日前，江西理工大学依据“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要求，在江西高校中首推“菜单式给予”素质教学，为广大学生开辟“第二课堂”，从多方面努力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力求为广大学生在四年本科学习中打造一张“素质毕业证”，深受学生欢迎。

据了解，该校在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调查后，在素质拓展培养中着力构建“大学生素质拓展项目服务超市”，为大学生开设“两课教育”、“文明修身”、“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援助”、“技能培训”等素质培养训练项目。这些项目以学期为单位，按照学分制实施，每位学生修满6个素质学分方可毕业。在素质拓展计划中，每个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制定“素质拓展训练个人套餐”，然后在“素质拓展项目服务超市”中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的素质拓展训练项目，此素质拓展计划实施模式即为“菜单式给予”素质教学。同学们通过BBS网络自主报名，有计划地参与活动。学校再由相关部门汇总信息，随时调整活动方案，确保所有活动顺利进行。

该校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负责人介绍：该校开展“菜单式给予”素质教学模式，是为进一步整合深化教学主渠道以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各种活动，为大学生政治思想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科技学术创新与创业训练、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的综合素质“打分”，并达到实现培养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十大素质目标：正确的价值观、高尚人格、科学精神、实践技能、心理素质、健康体魄、审美情趣、个性特长、集体精神、创造性精神。

来源：中广网 2006-12-5



摘要: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是一个历经二百余年发展历史的专业化职业。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本文以标志性文件为依据,对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的发展阶段进行重新划分,同时介绍了诸如招生、住宿、社团活动等学生事务具体领域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梳理了“学生事务”概念自身及其理论基础的历史流变,以深入理解和把握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学生事务,历史研究

在美国,“学生事务”(student affairs)是与“学术事务”相对的概念,一般“用来描述校园内负责学生课外教育,有时也包括课堂教育在内的组织结构或单位。”“学生事务”通常涉及“课外”、“学生活动”、“住宿生活”和“感情和个人问题”等,其主要目的在于规范、指导和服务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一、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发展阶段

关于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历史阶段,存在许多不同的见解。有的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征将高校学生事务的发展相应地划分为:“诞生期”(殖民时期~19世纪)、“青春期”(19世纪~20世纪)和“成熟期”(20世纪至今)三个阶段。”有的结合美国历史的发展将其分为:“成立与早年史”(1636年~1850年),“多样化”(1850年~1900年),“现代发展”(1900年~1945年)和“进一步扩张”(1945年至今)。还有的根据学生事务本身的阶段性特征将其分为:背景和渊源——替代父母制(殖民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独立和分析——学生人事工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战前),复兴和变革——学生服务(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专业化的奠基——学生发展(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动态和前瞻——SLI计划(20世纪90年代至今)。

事实上,这些学者们的不同提法并不矛盾,有的是起始时间不一,有的是研究角度不同,而同一时间段内所指称的事件和特征

基本一致。笔者结合美国自身发展的历史,以标志性事件或文件为分割点,将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混沌期: 1636年哈佛建校~1776年美国独立

美国最早的哈佛、耶鲁、威廉和玛丽学院主要是模仿英格兰的办学风格,采取寄宿制。学校规模小,学生年龄普遍偏小,因此学校代替父母行使监管职责顺理成章。由于采取的是寄宿制,教师不仅承担着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根据宗教信条,对学生的言行进行严格的监督,此外同伴之间的监督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应该说这一时期学生事务和学术事务是融为一体的,不存在独立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

2. 萌芽期: 1776年美国独立~1890年学生事务专职人员诞生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高校的培养目标由培养传教人士转向了各类专门人才及合格的公民。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一些特别助理来管理学生事务,这些特别助理的集合也就是现在校长办公室的萌芽。另一方面,由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学生对教学方法、学校纪律或学校饮食等方面普遍不满,学生骚乱频频。19世纪中叶,“课外活动”的概念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社团活动和体





育活动在学生中备受欢迎,为控制学生的行为,学生事务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凸现。

与此同时,德国教育模式的引入使大学教师开始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无暇顾及学生事务,这为学生事务从学术事务中分离出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870 年哈佛大学任命格尼(Ephraim Gumey)教授为首任大学学监,除教学外,主要负责协助校长开展纪律管理的工作。1891 年哈佛大学又任命布里格斯(Le Baron Russell Briggs)为学监,在以往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咨询任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专职学生事务人员,标志着独立意义上的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诞生。

3. 形成期: 1890 年学生事务专职人员诞生~1937 年《学生人事宣言》颁布

各大学纷纷效仿哈佛大学的做法。如 1901 年伊利诺斯大学任命克拉克(Thomas Arkie Clark)为男生学监(Dean of Men)。进入 20 世纪后,教员逐渐卸除了学生人事管理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学生委员会

(student council)和其他学生管理组织。至 1915 年,至少有 123 所大学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无监视的考试制度(honor system)。在职业指导运动和心理学测验运动的影响下,学生人事运动蓬勃发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开始逐步走向专业化的道路。1918 年后,学生人事运动已经获得全国范围内的认同和专业地位,这一职业越来越自觉、自信且影响也越来越广。这时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出现了学生事务实践者准备项目,1914 年与文学硕士学位联合颁发了第一个“女生顾问”的专业学位,1929 年琼(Esther Lloyd-Jone)获该领域的第一个博士学位,1932 年该项目开始招收男生。据美国大学人事协会 1994 年的统计,全国共有硕、博士项目 83 个。

1937 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出版了《学生人事宣言》(The Student Personnel Point View),强调高校应关注学生全面的发展而不仅仅只是智力的训练,这标志着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在美国高校地位的确立,学生事务

管理进入“学生人事”时代。该宣言是 200 余年历史积累的结果,奠定了当代学生事务管理的哲学基础和指导思想。

4. 发展期: 1937 年《学生人事宣言》颁布~1968 年“明日高等教育工程”出台

1949 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与 1937 年《学生人事宣言》同名的指导文件。该文件要求美国高校树立起学生服务意识,为学生发展提供包括环境适应、学业指导、医疗保健等一系列的最佳服务,学生事务管理进入“学生服务”时代。但随着学生和学校之间消费关系的发展,“学生服务”观念的市场气息也不断加重。

1961 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开除违纪学生之前必须开听证会,此后最高法院一系列裁决赋予了学生更多的成人自主权。”1967 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全国学生协会和 NASPA 等组织的多方代表共同起草了一份《学生权利和自由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Student Rights and Freedoms),作为学生事务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问学生事务管理者们的角色由以往权威的纪律管理者转向学生的合作教育者。在理论方面,受心理学和咨询理论的影响,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确立了“以服务促发展”的主题。学生人事工作人员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包揽一切的“保姆”,其根本目的是以服务促发展,促进学生的成熟和发展。

5. 多元扩展期: 1968 年“明日高等教育工程”出台~1994 年 SLI 理论的提出

将学生发展理论推向学生事务工作实践的是 1968 年美国大学人事协会(American College Personnel Association)推出的“明日高等教育工程”(The Tomorrow's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该工程于 1972 年发表了布朗(Robert D. Brown)的《明日高等教育中的学生发展: 回归学术》(Student Development in Tomorrow's Higher Education: A Return to the Academy)。该项目不仅强调学生发展,而且提供了一个





操作性模型把学生发展与学校各项工作相联系。该模式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 目标设定 (2) 评估 (3) 变革的程序策略 (4) 评价。在学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学生事务管理专业化的发展日臻完善。

尽管多年来学生事务管理已获得社会的认可，被视为高等教育使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直至 1979 年学生事务专业协会才呼吁应建立自己的专业标准，随后建立了一个协会间组织，也就是后来的高等教育标准促进会 (Advancement of Standards in Higher Education, 简称 CAS)。1986 年 CAS 出版《CAS 标准及指导方针》(CAS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为高等教育中的 19 个职能部门提供指导和策略建议。此外，各种专业协会和专业期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6. 突破与创新期：1994 年 SLI 理论的提出至今

尽管学生事务管理的专业化意味着其独立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与学术事务的割裂。事实上，要实现促进学生发展的目标，学生事务与学术事务的紧密联系至关重要。1994 年学者们将二者的结合点落于“学生学习”之上，提出了 SLI 理论 (Student Learning Imperative: Implication for student affairs) “学生学习是当务之急——学生事务的含义”。这成为当前人们实践、质疑并反思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新基础。而该理论的实践与反思的结果如何正是本研究将关注的重点。

应该说，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日益专业化的趋势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们的共识。“美国高校学生工作产生于现实需要，发展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成熟

于百年积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从定位模糊到职责明确，已成为一个职能多样化，工作标准化，人员职业化，研

究学术化，理论综合化，运行高级性的专业领域。”

二、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具体领域的演变

1. 招生

美国高校招生工作历经了从“守门人”到“推销员”的演变过程。从 20 世纪 30 年代高校招生指导主任的设立，到 70 年代“守门人”到“推销员”双重角色的扮演，再到 80 年代之后所谓的“营销时代”的招生，美国高校的招生工作完成了从“守门人”到“推销员”的过渡。

2. 新生入学指导

最早的新生入学指导源于 1888 年的波士顿大学，当时主要关注的是学生如何适应大学生活，而非具体的学术科目。1911 年里德学院 (Reed College) 为新生开设了名为“大学生活”的课程，并配给了相应的学分，随后华盛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也启动了类似的项目。这些课程主要包括“如何使用图书馆，如何学习，如何参与校园活动，大学的目标……”这一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915 年到 1916 年间全国开设这一课程的机构仅有 6 家，10 年后就增至 82 家。一战后，学生人事专家将入学指导纳入到其管理的职责范围之内。20 世纪 30 年代，在威廉森 (E. G. Williamson) 的指导下，明尼苏达大学开设的新生入学指导项目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个人生计、家庭生活、职业指导和社会公民指导。这一时期的指导已远远突破了“适应大学”的原始目标，到 1951 年有学者甚至提出“入学指导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而应该是一个始于高中终于大学毕业的持续动态的过程。”显然，这一理念已经突破了新生这一对象范围，且所涉及的范围也大大拓宽。尽管这一理念至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对当下的实践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 住宿

域 外
高 教



早期的美国大学采取的是寄宿制的学院生活方式,19 世纪受德国大学的影响,学生被认为应该对自己的饮食起居负责。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影响下,美国高校开始关注学生住宿生活,并对住宿生活的功能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到 20 世纪各高校掀起了兴建宿舍楼(residential hall)的热潮,但二战后人们认为宿舍限制了学生自由,因此这股热潮一度冷却。不久之后由于经济的原因,学生们又不得不返回宿舍,学校宿舍再度紧缺。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学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住宿生活的功能更加凸显,成为学校教育性计划和对学术提供支持服务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4. 健康服务

殖民时期的学生健康被视为是学生个人的事情,而非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责。直至 1859 年阿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聘任爱德华·希契科克(Edward Hitchcock, M. D.),才出现美国第一位为学生提供健康服务的卫生教授。19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些简易的医务室专门负责照看生病的学生。19 世纪末盛行的各种体育项目将“医疗队伍”引入校园,本来专门负责治疗运动员的医疗队伍实际上为普通大学生的健康带来了更大的好处。20 世纪初,部分大学拓宽了健康服务的范围,更加关注治疗、预防和健康教育。一战后,联邦政府投入大量经费资助大学完成性病教育和预防的研究,同时也为校园内的军事单位提供更为广泛的健康服务。1920 年美国学生健康协会(American Student Health Association)(后改名为美国大学健康协会,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成立,但这一时期的大学健康项目发展十分缓慢,仅限于教育职责。1954 年明尼苏达大学健康服务主任波恩顿(Boynton)首次增设“健康教育员”的职位,开创了强调预防性健康技术的新纪元。20 世纪 60 年代后出现了新的健康需要和权利,因此大学健康服务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同时更为关注自我照顾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5. 社团活动

最早的有组织的学生活动源于传统的大学生年级结构,低年级学生总是受高年级学生的欺侮。随后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争夺”(rush)的制度化活动,低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之间举行诸如摔跤之类的比赛,以争取各自的特权。这一习俗一直保留至 20 世纪。随后出现的“课外活动”概念反映了学生身体、思想和个性全面发展的要求。早期的“课外活动”包括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及校园出版物,其中最早的“希腊字母”组织是 1776 年成立的 Phi Beta Kappa,最为著名的文学社团是 Lionian 和 Brothers。但出于信仰方面的顾虑,当时校方并未给予支持。19 世纪初,以希腊文命名的兄弟会在各大学纷纷成立,但由于这些社团的活动多是生活享乐,因此仍然遭到了校方的强烈反对,1840 年前后,许多大学试图清除学生社团,但成效不大。直至 1860 年代学生活动突破了文学讨论的范围,开始参与体育竞技、戏剧表演等活动,同时学生社团也逐渐脱离校方控制,成为自我保护的团体。19 世纪末至一战期间,以推广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学生社团在各大学陆续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学生社团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公民素质。20 世纪 20~30 年代,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学生社团由重视生活享乐和人际交往开始转向关注社会问题。二战后,由于大学生更为关注个人学业,社团活动沉寂一时。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社团在反战、反种族歧视等运动中表现活跃,引起广泛关注,至今已成为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6. 学术指导

最早的学术指导源于 19 世纪 20 年代的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1870 年哈佛校长艾略特任命了哈佛大学第一位负责学生纪律、发展及选课管理的院长,学术指导初现端倪。1876 年霍普金斯大学产生了教师参与的大学生学术指导系统。二战后,由于大学生学业问题严重,学术指导再次引起关注。随后,“学术事务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Academic Affairs



Administrators) (1971 年)、“全国学术指导协会”(National Academic Advising Association) (1979 年) 这些专业组织的相继成立表明学术指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参与学术指导的人员也由专业教师扩大到学生事务管理中的相关人员。

7. 咨询

殖民时期美国高校没有独立的咨询人员,咨询工作由教师承担。一战后,受帕森斯、斯科特、卡特尔和桑戴克等心理学家的影响,心理咨询逐渐被用于职业指导,进入大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范围。1960 年至 1980 年这一社会动荡期恰恰是心理咨询迅速发展并得以巩固的时期,其范围也扩大到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80 年代之后,心理咨询在高校进一步扩展,并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可以说,美国高校大学生的咨询经历了职业指导到关注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再到学生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这一历史变迁。

8. 就业指导

殖民时期,美国高校的学生都是被直接分配到当地教堂担任神职人员。20 世纪初受心理学发展的影响,第一个独立的就业安置办公室于 1919 年诞生于耶鲁大学,主要负责开展入职匹配的职业指导工作。二战后,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就业安置和教育咨询项目”(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Educational Counseling Program)。但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六、七十年代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有所下降,直至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才有所回升。随后受类型学理论、发展性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信息加工理论等的影响,美国的就业指导理论完成了一个从入职匹配的职业指导到关注全人发展和终生发展的生涯指导历程。

三、美国高校“学生事务”概念的演变

1. 内涵

自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独立以来,“学生事务”概念历经了一个从“学生人事”

(student personnel) 到“学生服务”(student service) 再到“学生发展”

(student development) 的变迁过程,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这些概念所表达的内涵也有所不同。20 世纪初学生事务与学术事务相分离初期,表示学生事务及其管理特征的是“学生人事”,20、30 年代是这一概念使用的高峰期。二战后,随着学生多样化需求的增加,“学生服务”成为影响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的基本主张,它要求学生事务管理要以服务学生为宗旨,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学生服务”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20 世纪 70 年代,“学生发展”的概念被频繁使用,它“既是一种理论基础,又是关于高等教育目的的哲学,是学生事务领域得以存在的理论依据。它是人的发展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运用。”

2. 外延

不同历史阶段“学生事务”的外延及管理范围,也有所不同。19 世纪中叶前的“学生人事工作始终将强调的重点放在课外活动的宗教性及对学生私人生活的调查之上”。到 20 世纪初,学生事务进入“人事”时代,1919 年任职西北大学校长的心理学家斯科特(Scott)定义人事工作为“集中强调学生的个性和他当前的需要及兴趣,不应当把学生仅仅看作是学位的申请者,而是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我们服务的并且是为了生活而必需发展和训练的个体。”斯科特所强调就是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以使它们能够进入适当的工作领域,因此当时的“学生事务”几乎等同于“指导”。直至 20 世纪前半期,欧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重点都在于学生行为的控制和福利方面的工作,诸如纪律、职业指导、健康、资助及住宿等,这反映了“学生人事”的特点。

进入“学生服务”时期后的学生事务范围明显扩大,包括:“招生录取、注册记录、学术咨询、健康服务、食宿服务、学生活动、经济资助、就业安排、个人咨询、特殊诊断(包括阅读补习、学习习惯、演讲与听力)和特殊服务(包括新生入学教育、老生顾问



服务、外国学生项目、婚姻咨询、宗教活动)”。
 阴 1966 年美国教育、健康、福利部提出高校学生服务管理的职能是:招生、入学、非学术记录、咨询、纪律、测试、财政资助、外国留学、幼儿园服务、医疗服务、住宿、已结婚学生住宿、就业、学生社团、学生活动、体育、宗教共 17 块。进入 90 年代之后学生事务管理包括“招生、财政资助、注册和记录、住宿和饮食、学生活动、个人和学术咨询、入学指导和特殊的学生支持服务”。

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早期的学生人事工作者们也怀抱着促进学生发展心愿,而所谓“学生发展”的新概念也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做法。”但一个新概念的出现确实反映出时代发展的特征和趋势。

四、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理论基础演变

1. 哲学流派

影响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哲学思想有四种,包括理性主义、新人道主义、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侧理性主义认为教育的本质仅仅是开发智力,因此学生工作的指导方针就是为学生智力的发展创建一个良好的氛围,而“家长式”的管理方式恰恰符合理性主义的方式。新人道主义认为高等教育除了开发智力之外,还应该满足人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需求,这为学生工作开设学生教育的第二课堂奠定了基础。实用主义则强调通过实践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要求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学生事务,这恰恰促进了学生事务的进一步发展。存在主义认为学生应对学习和自己的发展负责,学生工作由控制学生行为转向了帮助学生成长,并有意识地直接帮助学生学习,课堂学习和课外活动日渐融合。

2. 价值信念

贯穿于学生事务发展始终的是个体价值。尽管大多数人认为早期的学生事务管理与学术无关,是一些价值无涉而仅仅进行管

理并提供服务的部门机构,但事实上大部分负责学生事务管理的学监都是教师或学者,而且相信学生是有价值的平等的个体。随着学生事务的进一步发展,作为个体的学生越来越受重视,“完整的个体”、“独特的个体”、“经验的个体”、“负责的个体”这些都成为学生事务管理者基本的价值信条。而这些价值信条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学生事务中的标志性文件,包括 1937 年和 1949 年的《学生人事宣言》,1954 年的《作为深层教学的学生人事工作》(Student Personnel Work as Deeper Teaching),1968 年的《Hazen 报告》(The Hazen Report),1972 年的《回归学术》(A Return to the Academy),1975 年和 1977 年的《明日高等教育——第二阶段》(Tomorrow Higher Education, Phase II),1987 年的《学生事务透视》(A Perspective on Student Affairs),1994 年的《合理的期待》

(Reasonable Expectations),1996 年的《学生学习当务之急》(The Student Learning Imperative),1997 年的《良好实践的原则》(Principles of Good Practice),1998 年的《强有力的合作》(Powerful Partnership)和 1999 年的《趋势研究》(The Trends Project)。

3. 应用性理论基础

引导美国高校学生事务具体领域不断“促进学生发展”的应用性理论共有三种,包括:(1)认知理论,主要研究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以皮亚杰、佩里和柯尔伯格为代表;(2)社会心理理论,关注个人和“生活周期”(life cycle)的发展,以艾里克森等人为代表;(3)人与自然互动理论,关注学生生活的生态平衡,以穆斯、霍兰为代表。而在此基础上,组织和管理理论则帮助人们理解诸如资源分配、决策、人事管理、领导等过程,对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推动学生事务管理活动不断走向专业化。

来源:《比较教育研究》2006 年第 10 期